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NZAI-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5061/5600.1

NOV 18 1959

中國語文

ZHONGGUO YUWEN

9

1959

1959年9月号(总第87期)目录

反右傾,鼓干劲,以实际行动来迎接偉大的国庆十周年(社論).....	(401)
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把文字改革工作繼續向前推进.....	吳 玉 章 (403)
鼓足干劲推广普通話.....	章 愨 (405)
对普通話教学成績观摩会的兩点願望.....	陈 望 道 (407)
推广普通話工作的巨大成就.....	徐 世 棠 (408)
記第二次全国普通話教学成績观摩会.....	秋 甫 (415)
談談傳統戏曲中的用詞問題.....	馬 連 良 (418)
应该重視电影語言技巧的繼續提高.....	吳 青 (419)
土話与普通話.....	老 舍 (421)
讓曲艺語言在推广普通話中起桥梁作用.....	白 凤 鳴 (421)
試論成詞的客觀法則.....	郑 林 曦 (422)
汉語拼音文字的正字法問題.....	周 有 光 (428)
論划分連詞的几个問題.....	黃 盛 璋 (431)
关于“划分連詞的几个問題”的討論.....	黎 錦 熙 (434)
說“差一点”.....	朱 德 熙 (435)
汉語詞汇史随笔(四).....	郑 奠 (436)
也談“不当家花拉的”(附俞平伯《不当家花拉的》).....	吳 曉 鈴 (438)
語言学中的一些理論問題(导論).....	白 水 譯 (439)
書刊評介	
杰格捷列娃:《欧洲語言学說簡述》.....	梁 振 (443)
梁东汉:《汉字的結構及其流变》.....	管 燮 初 (444)
語言学名詞解釋(十二).....	北京大学語言学教研室 (446)
語文筆記	
关于《經詞衍釋》的最初刊本.....	余 明 象 (438)
編者的話.....	(427)

社 論

反右傾, 鼓干劲, 以实际行动 来迎接伟大的国庆十周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这个伟大的节日的前夕, 我們語文工作者跟全国人民一道, 响着我們党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 正在轟轟烈烈地深入展开厉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 为完成和超额完成 1959 年的生产和建设计划而斗争。我們語文工作者不是直接从事工农业生产的, 但是厉行节约、提倡储蓄、节减开支、勤俭办一切事业等方面, 我們也应该尽我們应有的责任来贯彻执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依照中央所指示的反右傾、鼓干劲、实事求是的精神, 把工作做好, 为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繼續跃进, 贡献出我們全部的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語文工作, 特别是文字改革、汉语规范化和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文字这三方面, 有了很大的进展,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当前文字改革的三个任务是简化汉字, 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关于简化汉字, 到目前为止, 已經推行了四批, 共五百一十七个简化字, 还要加上由于简化偏旁的类推而得到简化的一千三百多个字。这些偏旁类推的简化字, 因为制铜模需要时日, 还没有在书报上全部出现, 但是已經在书写、油印、胶印和部分铅印刊物上推广了。此外, 还有一千另五十五个异体字被精简了。简化字本来早已为人民大众所使用, 但在历代统治阶级的歧视下, 简化字被称为俗字, 从来没有得到合法的地位。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下, 简化字才得到合法的地位被用来代替繁体字, 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推广普通话是从 1955 年 10 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作出决定后开始的。根据十八个省市不完备的统计, 已經有一百八十万中、小学教师学习过拼音字母和普通话; 师范和中、小学生約有一千一百多万名已經学习过和正在学习拼音字母和普通话。特别要指出的是, 普通话的推广已不限于学校, 也不限于少数大城市, 而是逐步深入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中去了。这是去年大跃进以来, 推广普通话的一个新的进展。福建大田县吴山乡首先在群众中推广了普通话。接着, 福建的若干县, 广东的佛山、潮阳两专区, 江苏的昆山、新沂, 安徽的歙县, 江西的婺源, 辽宁的开原, 黑龙江的哈尔滨、拜泉, 吉林的榆树, 河北的保定、河间, 山东的鄒平, 山西的万荣等等地方也在群众中推广了普通话。据初步估计, 这些地方参加学习拼音字母和普通话的群众大概有一千一百多万人。这些成就远远超过解放前四十多年“国语”运动的效果。

結合着推广普通话, 还有汉语方言初步普查的工作。这项工作是从 1956 年开始, 由教育部、

社 論

反右傾, 鼓干劲, 以实际行动 来迎接伟大的国庆十周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这个伟大的节日的前夕, 我們語文工作者跟全国人民一道, 响应着我們党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 正在轟轟烈烈地深入展开厉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 为完成和超额完成 1959 年的生产和建设计划而斗争。我們語文工作者不是直接从事工农业生产的, 但是在厉行节约、提倡储蓄、节减开支、勤俭办一切事业等方面, 我們也应该尽我們应有的责任来贯彻执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依照中央所指示的反右傾、鼓干劲、实事求是的精神, 把工作做好, 为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教育事业的继续跃进, 贡献出我們全部的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語文工作, 特别是文字改革、汉语规范化和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文字这三方面, 有了很大的进展,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当前文字改革的三个任务是简化汉字, 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关于简化汉字, 到目前为止, 已经推行了四批, 共五百一十七个简化字; 还要加上由于简化偏旁的类推而得到简化的一千三百多个字。这些偏旁类推的简化字, 因为刻制铜模需要时日, 还没有在书报上全部出现, 但是已经在书写、油印、胶印和部分铅印刊物上推行了。此外, 还有一千另五十五个异体字被精简了。简化字本来早已为人民大众所使用, 但是在历代统治阶级的歧视下, 简化字被称为俗字, 从来没有得到合法的地位。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下, 简化字才得到合法的地位被用来代替繁体字, 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推广普通话是从 1955 年 10 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作出决定后开始的。根据十八个省市不完全的统计, 已经有一百八十万中、小学教师学习过拼音字母和普通话; 师范和中、小学生约有四千一百多万名已经学习过和正在学习拼音字母和普通话。特别要指出的是, 普通话的推广已经不限于学校, 也不限于少数大城市, 而是逐步深入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中去了。这是去年大跃进以来, 推广普通话的一个新的进展。福建大田县吴山乡首先在群众中推广了普通话。接着, 福建的若干县, 广东的佛山、潮阳两专区, 江苏的昆山、新沂, 安徽的歙县, 江西的婺源, 辽宁的开原, 黑龙江的哈尔滨、拜泉, 吉林的榆树, 河北的保定、河间, 山东的鄒平, 山西的万荣等等地方也在群众中推广了普通话。据初步估计, 这些地方参加学习拼音字母和普通话的群众大概有一千一百多万人。这些成就远远超过解放前四十多年“国语”运动的效果。

结合着推广普通话, 还有汉语方言初步普查的工作。这项工作是从 1956 年开始, 由教育部、

各省市教育厅局組織当地高等学校进行的。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負責培养方言調查干部，編輯調查表格，并担任技术指导。从1956年春季开始，教育部和語言研究所联合举办普通話語音研究班，培养各地选派的推广普通話和調查方言的干部，从第一期到第七期，一共有毕业學員一千一百一十五名。这些毕业學員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各地推广普通話和調查方言的骨干。到目前为止，各地已写出方言普查报告一千一百八十九份，学习普通話手冊三百一十六本。

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主要是結合着推广普通話来进行的。換句話說，推广普通話同时推行了汉语拼音方案。这里需要补充的有两点：第一，去年二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會議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后，山东、河北、河南、辽宁、吉林、黑龙江这六个省用拼音字母給汉字注音，进行注音扫盲試点工作，証明用拼音字母給汉字注音，确实能够帮助文盲和半文盲認識汉字，巩固和扩大扫盲成果。現在还有别的北方話地区，也在进行着注音扫盲試点工作。第二，拼音字母已經被用来在若干商品的包装上注音，在路牌和車站牌上注音，打旗語，打电报，作聾哑人用的手語工具，等等。

这几年来，汉语规范化工作主要是在語音规范化方面。推广普通話事实上促进了語音规范化。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中国科学院設立了普通話审音委员会，并且已經发表了两批异讀詞审音初稿。詞汇和語法规范化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跟汉语拼音方案有关系，特别是跟分詞連写有直接关联的，就是現代汉语构詞法的研究。語言研究所曾經分析了現代汉语詞汇里三万多个詞，写成了《汉语的构詞法》的报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同志也进行了分詞連写的理論研究，而且在編印拼音讀物的工作中积累了一些实际經驗。还有許多热心文字改革的人們也研究了与构詞法有关的問題，发表了意見。

为了帮助普通話教学，語言研究所正在編写以确定普通話詞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詞典，并預定在国庆十周年定稿。

在帮助少数民族創制和改革文字方面，从1956年开始，普遍展开調查各民族的語言、方言和拟訂文字方案的工作。到1958年8月，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已經帮助僮、布依、苗、彝、侗、哈尼、傈僳、佤、黎和納西十个民族創制了拼音文字，并协助傣、拉祜和景頗三个民族改革了文字。为了配合文字的推行和試行工作，另外編印了各种課本、政策文件等讀物，并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了报纸。正在編写的还有若干少数民族語言和汉语对照的簡明詞典和語法綱要。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文以及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和居民学习当地通用的民族語文，并且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語言和汉语間的翻譯工作，現在正进行着少数民族和汉语的对比研究。經過調查研究的少数民族語言当然远不止此数。到現在为止，已經在十六个省、自治区，調查了僮、布依、侗、傣、水、黎、毛难、仡佬、苗、瑤、仡佬、藏、羌、彝、傈僳、哈尼、拉祜、納西、白、阿昌、景頗、土家、佤、蒙古、达斡尔、烏孜别克、撒拉、裕固、錫伯、鄂溫克、鄂倫春、赫哲、京、塔吉克、畚等四十多个民族的語言。并且已經編写了总数有一百五十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語言簡志》，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以上所述是，我們語文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在文字改革、汉语规范化和少数民族語文研究这三方面所做的工作和所获得的主要成就。在其他方面，例如有关現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以及一般語言学問題的研究討論，語言学干部的培养，我們的語文工作者，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教师和同学，也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但是我們深深感觉，跟我們国家各項事业飞跃前进的形势比較起来，我們所做的工作还是很不够的。讓我們大家依照八届八中全会所指示的反右傾、鼓干劲、实事求是的精神，积极进行文字改革、汉语规范化和少数民族語文工作，积极展开語言学上各种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来迎接偉大的国庆十周年！

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把文字改革工作 繼續向前推进*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 吳玉章

这个会议开得很好，檢閱了成績，交流了經驗，座談了工作，收获很大。这个会议之所以开得成功，是和我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市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以及市文字改革协会等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分不开的，我在这里代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和团中央向上海市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自从去年第一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績观摩会以后，我曾經跑了許多地方，其中有东北三省、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湖北、上海等省市，最近又在陝西、四川視察了两个多月的工作。我每到一地，除了听取各地关于推广普通话和扫除文盲工作方面的汇报以外，还視察了許多学校、工厂和人民公社。从汇报和視察的情况看来，各地在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拼音字母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这些成績主要是：

(一)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已經不只限于学校范围，而是走出校門，开始向社会推广。从去年福建大田吳山乡首先推广了普通话并取得成功的經驗以后，許多地区也都开展了这项工作。例如：福建的許多县，广东的佛山、潮阳两专区，安徽的歙县，江西的婺源，江苏的昆山、新沂，河北的保定、河間，辽宁的开原，山东的鄒平，山西的万荣，黑龙江的哈尔滨、拜泉等等，都先后开展了学习普通话的运动，并且出現了很多好的單位和事例。例如：广州东山食堂，职工一百多人，原来80%的人听不懂普通话，以致影响了工作，鬧出不少笑話。因此，职工迫切要求学习普通话，在党的支持和领导下，开展了学习普通话和学习拼音字母的运动，現在已有80%的职工学会了拼音字母和基本上会說普通话。上海新成区飲食业一千多名职工，在今年1月我来上海时就已經基本上学会了普通话；該区交通部門的售票員，一直坚持說普通话。这样的例子很多。

(二)各地都訓練了大批教师，根据十八个省市不

完全的統計，中小学教师有一百八十多万人受了拼音字母和普通话語音的訓練，仅四川一个省就訓練了十七万多人。这就为进一步教学拼音字母和推广普通话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大部分中小学和师范学校都教学了拼音字母和普通话。小学一年級学生学会拼音字母的估計有两千万人。小学生学习拼音字母，对于他們学习汉字帮助很大。出現了这样的事情：孩子們掌握拼音字母之后，老师还没有教的課文，自己把它学完了。以前，一年級小学生很少可能閱讀課外讀物，現在一年級生依靠拼音字母的帮助，可以大量閱讀注音讀物。我在春節期間，曾收到一些一年級小学生的信。他們才入学不到半年，还不能用汉字写信，是用拼音字母写的；写的話都是他們心里想說的話，而且写得很流利。一年来小学生学习拼音字母的成績是很不錯的。

(四)有些地区，如山东的平原，河北的保定、定县，山西的万荣，黑龙江的拜泉等地方，都进行了注音扫盲的試点工作，并取得了成功的經驗。經驗証明，利用拼音字母帮助扫盲，效果良好，并为推广普通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事实証明：汉语拼音字母，对于学习普通话，統一汉字讀音，扫除文盲，和提高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都是好工具。

从这次大会来看，也可以看出推广普通话的成績是显著的：

(一)这次普通话教学成績观摩会比去年第一次观摩会質量是提高了，这从得奖的比例上就可以看出。去年到会代表一百四十一人中参加观摩表演的一百二十七人，得奖的六十九人，得奖人数占54%。今年到会代表一百八十四人中参加观摩表演的一百三十四人，

* 本文系在第二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績观摩会上的講話，轉載自195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题目是本刊編者加的。

得奖的九十六人,得奖人数占72%。这也说明了教学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在普通話和拼音字母的教学上創造了许多經驗。如江苏无錫幼儿园教师呂无忝,采取适合儿童游戏的方式教儿童学普通話。上海市盧灣区的小学教师武令仪在开学前先进行家庭訪問,了解儿童語言的特点,开学后根据儿童語言特点教学普通話,并且經常变换教室环境,以适应儿童学习普通話的需要。浙江杭州華藏寺小学教师張瑛,通过朗讀教学普通話。这些都是很好的教学經驗。当然还有许多教师創造了许多好的經驗。

(三)从表演来看,充分說明方言地区的人学习普通話虽然比較困难,但是只要努力,是可以学好的。如广东潮阳农民代表陈映菁,原来不会說普通話,去年秋天开始学习拼音字母,并利用拼音字母学习普通話。由于学习努力,在短时期內就熟練地掌握了拼音字母和基本上学会了普通話。这次观摩会上得了工农群众奖的第一名。安徽歙县岔口公社陈桂兰,已五十多岁,去年脫盲后才开始学习普通話,经过勤学苦练,夜里睡在床上也进行練習,現在基本上学会了普通話。既然老年人经过努力可以学会普通話,由此可見,一般青壮年,只要有决心,有毅力,一定可以学会普通話。

另外,从云南、广西等地来的少数民族代表,普通話也学得很好。少数民族都能学会普通話,那末汉族自然有更多有利的条件来学好普通話。

学习普通話,說好普通話,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改变一种語言习惯,是需要一个艰苦努力的过程的。不过也不能把学习普通話視為畏途。我們既要在战略上藐視它,又要在具体学习时重視它。

上面是講的一年來推广普通話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一些主要成績,但是在这項工作中也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問題。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1)在中小学和各級师范学校中,推广普通話的工作发展得还不平衡,教师質量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2)教师的質量一般說还不够高,受过拼音字母和普通話語音訓練的教师数量也还不能滿足推广工作的需要。

(3)北方話区的注音扫盲工作,已經收到成效,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并总结經驗,以便逐步推广。注音扫盲的逐步推广,不仅为扫盲工作开辟了捷徑,而且为推广普通話打下了基础。

(4)推广普通話的机构还不健全。有的省市,虽然成立了專管机构,但沒有發揮充分作用。有的省市教育厅、局已經設立的普通話推广处、科,現在已合并

到其他部門,甚至連專职干部也精簡了。不少县、市則根本无人管。这对于推广普通話工作的开展是不利的。

根据以上情况,我想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這項工作,提几点意見,供同志們考虑,并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向省、市委及教育、文化两厅、局汇报,轉达我的意見。

(一)关于推广普通話工作的方針,我認为“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这一方針,在今后仍然是适用的。各省、市、自治区,應該根据这一方針,結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出自己的规划。

(二)关于机构問題,我認为應該健全起来。首先應該充分發揮省、市、自治区推广普通話工作委員會的作用。此外,在条件成熟的地区,也可以考虑成立文字改革协会,吸收一些热心于文字改革的人士参加工作,使文字改革工作成为一項群众性的工作。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后,它和推广普通話工作委員會的分工問題,我認为推广普通話工作委員會是一个行政机构,主要負責审查与通过本省市推广普通話工作规划,并檢查工作;而文字改革协会,則是群众团体,它不但可以組織群众学习拼音字母和普通話,同时还可以組織群众进行注音扫盲,組織教师进修普通話,編輯出版拼音小报和注音讀物,等等。其次省、市区教育厅、局,應該确实起到作为推广普通話工作委員會日常办事机构的作用,这就必須配备一定数量的專职干部。各地派在北京普通話語音研究班結业的學員,分配作其他工作的,應該讓他們归队。各县、市教育科、局,也應該有人管這項工作,至少有一位兼职工干部管。

(三)进一步提高学校教学拼音字母和普通話的質量。提高教学質量的关键,首先在于提高教师的質量,各省、市、自治区,應該抓紧訓練教师这一环节。訓練教师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如采用广播講座,巡回教学,集中訓練,业余进修等方式。总之,各省、市、自治区,要根据本省、市、自治区的具体情况,訂出計劃,在一定時間內,把所有中、小学、师范学校和幼儿园教师逐步訓練完畢。首先是訓練語文教师。

(四)加强小学的拼音字母教学,并充分利用拼音字母来帮助識字和学习普通話。小学教学拼音字母,要从一年級开始,这是我們大家一致的意見。小学其他年級也應該教学拼音字母。中学和师范各年級,也應該加强領導,制定规划,教好拼音字母,利用拼音字母学习普通話。特別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将来都是作人民教师,更應該学好。

(五)在北方話地区要在经过試点的基础上逐步推

鼓足干劲推广普通话*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章 愨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央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现在开幕了，这次观摩会能够在上海召开是因为得到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积极支持，首先让我代表大家向上海市委和市人委表示衷心的感谢！

推广普通话工作是从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通过决议以后开始的，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四年了，在这个期间，在党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和同志们的努力下，推广普通话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四十多年“国语”运动的效果，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情况和成绩，我们已经陆续报道过，这儿不重复了。

今天我想着重地谈一谈最近一年来推广普通话的成绩。这一年来，在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的鼓舞之下，推广普通话工作获得了新的进展。主要的特点是普通话已经从学校推广到社会和人民群众方面了。福建大田县吴山乡，在1958年上半年，就在人民群众中推广了普通话。吴山乡的成功经验促使大田县在全县范围内推广了普通话。福建、广东、江苏等省，在不同范围内，也在一些县里推广了普通话。其他个别地方，如山西万荣、安徽歙县、江西婺源，也在人民公社的一定范围内，推广了普通话。山东、河北、河南、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在使用拼音字母给汉字注音，进行扫盲试

点，巩固扩大扫盲成果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在人民群众中推广了普通话。

在人民群众中推广普通话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其中主要的有五条。第一条经验是党委的重视和领导是做好推广工作的主要关键，基层党委的带头更是十分重要。如上海市新成区第一书记非常重视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字母，并亲自带头推行，使该区在部分里弄和饮食行业的试点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又如吉林四平市四位市委书记和三位市长，以及市委与各级领导亲自带头，组织了两个学习班，坚持学习，效果很好。又如江苏新沂县第一书记除亲自掌握推广工作外，还带头学习拼音字母。自己担任小组长，带头用普通话作报告，县委左、耿两位书记亲自抓钢铁工地的学习，自己编教材，编拼音快板，并且在每次开会之前，抽出一部分时间，检查到会人员学习拼音字母的效果。由于书记挂帅，干部带头，推广工作就能够顺利地展开。例子还有很多，这儿不多举了。

第二条经验是充分动员群众，通过生动的事例，说明讲普通话的好处，启发群众学习普通话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有些地方采取对比的方法，启发群众说出

* 本文系在第二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上的开幕词；转载自1959年8月11日上海《文汇报》——编者。

行注音扫盲。已经进行了试点的，要注意巩固工作，总结经验，并逐步推广。还没有进行试点的，应该首先做好试点工作。总之，这项工作要积极推动起来。

(六)要设法解决注音读物，因为这是学好拼音字母和普通话的物质基础。如果不保证一定数量的注音读物，学会拼音字母后，也会回生。这样，拼音字母的帮助识字和学习普通话的作用，也就不能发挥。解决注音读物问题，当然中央有关出版机关要负责解决一部分，但不可能解决全部需要。因此，主要还应该依靠各省、市、区自行设法解决。而且还应该很好地作好发行工作，保证读物的供应。现在上海已经制成几种注

音汉字铜模，并已把样品分送给各位代表。各省、市、自治区、县市需要时可以订购。另外，我还要建议印一些基本的注音读物，特别是一些群众要普遍学习的重要文件，加以注音，供大家学习。这样就学习了政治，又学习了拼音字母，还练习了普通话，一举三得。

同志们！文字改革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它是当前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大跃进服务的。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完成党的这项任务。全国人民，首先是文字改革战线上的同志们，要继续鼓足干劲，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把文字改革工作继续向前推进。

会说普通话的苦处,对比讲普通话的好处,效果也很好。经过动员群众后,可以开展群众性的互教互学运动,发动党团员带头学,带头说,带头教;学生回家分片包干教家人;亲教亲,邻教邻,夫妻互教,子女教父母,等等。

第三条经验是密切结合生产、结合生活,做什么,学什么,碰到什么学什么。田间学,地头学,工地学,边劳动,边学习普通话。

第四条经验是结合扫盲和业余教育,所有民校、夜校一律用普通话教学。这条经验在北方话地区特别适用。但是要注意到在扫盲阶段,重点要放在识字,普通话的要求要放低,等到认得一定数量的汉字,然后把普通话的要求逐渐提高。

第五条经验是召开评比会和现场会议,总结和交流经验,推动工作。

在学校方面,这一年来,推广普通话的主要特点是,随着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广泛地使用了拼音字母来教学普通话。在这以前,教学普通话是用注音字母的。拼音字母拼音准确,比注音字母优越,在推广普通话和语文教学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就。

第一,学会拼音字母,学生们能够大胆讲普通话。许多教师反映,学生们学会拼音字母后,能够准确地读出汉字的音,学普通话有了正音的工具,就能够大胆说普通话了。

第二,拼音字母能够加速儿童们认字的速度,提高阅读的能力。如黑龙江拜泉县三道镇小学一年级学生吴颂珍学会了拼音字母后,不单是顺利地学会了语文课本第一册所有的汉字,还认识了语文课本第二册的361个生字。在北京,我们听到不少家长说,他们的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学会了拼音字母后,能够很快地阅读少年儿童出版社和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的注音读物,认识了很多汉字。

第三,拼音字母能够帮助儿童拼写词句,用来替代不会写的汉字。这样,儿童们在认得一定数量的汉字以前,能够运用拼音字母写便条、写信、作文,等等。这对于发展儿童们表达思想的能力,有很大的好处。

总而言之,这一年来,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都获得了新的进展。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为了支援和协助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为了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来自辽阔的祖国各地的劳动人民、工程师、科学技术人员和文化教育工作者,分布

在全国各工矿企业、各工地、各机关、各团体一同工作,一同生活。由于方言的分歧,言语不能畅通,使共同工作、共同生活受到一定的影响,这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不利的。推广普通话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很明显,推广普通话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因而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方针是“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当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对推广普通话的要求,我们要鼓足干劲来推广普通话。但是由于我国地广人多,各地情况和条件不同,特别是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情况和条件不同,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普通话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此,推广普通话既要大力提倡,还要根据不同对象,不同情况,有重点地推行,以便逐步普及。大力提倡就是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来宣传推广普通话跟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关系和讲普通话的好处,并采取各项措施来鼓励讲普通话。从对象来说,儿童和青少年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第一,因为他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第二,因为他们容易改变口音,容易学会普通话。从学习的场所来说,各级各类的学校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因为学校的学习条件好。学校又以小学、中学、师范学校为重点。从教学方面来说,语文教学是重点。从行业来说,交通、运输、邮电和商业各部门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

推广普通话还要根据不同对象,提出不同的要求。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要求要高,但是对社会青年的要求可以比在学校的青年低。对壮年的要求可以比青年的要求低。对中年以上的要求还可以更低。对老年人就不要提出要求了。对教师也要根据年龄和所担任的功课提出不同的要求。对青年教师的要求要高,对壮年和中年以上的教师的要求可以低些。对语文教师的要求要高,对其他各科教师的要求可以低些。对广播员、电影演员和话剧演员的要求要高,对其他一般行业的工作人员的要求可以低些。

关于推广普通话的速度,对不同年龄、不同对象,不同条件,也要有不同的要求。应该鼓足干劲,加快推广的速度,但是也要实事求是,能快的就快,不能快的可以慢些。这样以落实的精神来对待推广的速度,对整个推广普通话的工作,还是有利的。

这次观摩会的目的是通过观摩表演、交流经验、座谈工作,来促进今后的工作,特别是明年的工作。希望同志们大家努力,把这次观摩会开好。预祝大会成功!

对普通話教学成績观摩会的兩点願望*

上海市文字改革协会筹委会副主任 陈望道

第二次全国普通話教学成績观摩会今天在上海开幕,讓我向大会、向代表同志們表示热烈的祝賀。

我想在这里順便說說我个人的几点願望。

第一,希望通过观摩会能够引起更多的人更加重視文字改革工作。当前文字改革一共有三項重要任务:(一)簡化汉字。簡化汉字的笔画和字数,使教学汉字、使用汉字更加便利。(二)推行汉语拼音字母,使大家便于用来为汉字注音和学习普通話。(三)推广以北方話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話。使汉语进一步統一,更加便于交流經驗、传达思想,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推广普通話需要有正确的方針、步驟和措施,这在1955年10月間的全国文字改革會議上已經詳細討論过,而且作出了決議。推广普通話还需要有千千万万干部、千千万万的积极分子。在去年的第一次全国普通話教学成績观摩会上,我們已經見過許多代表,今天我們在这次会上又見到許多代表。通过各位代表,我們可以想見,推广普通話的千千万万积极分子正在全国各地努力不断取得胜利。这是一件大事,而且是极好的大事,希望能引起更多的人更加重視文字改革工作。

第二,希望通过观摩会能够引起更多的人从事文字改革的科学研究,从事祖国語文各个方面的科学研究。我們有沒有可能希望推广普通話的积极分子中涌现出許多語文科学的研究工作者来呢?从五四运动以来語文学界的历史事实看来,是大有可能的。科学研究开始于积累經驗,記錄經驗,然后整理經驗,总结經驗,終至确定范疇,闡明規律。只要我們把文字改革工作的点滴經驗記錄下来,点滴經驗都总结起来,作好科学研究的第一第二两步,就可以希望多少得出第三步的結果来。从推广普通話的积极分子中涌现出語文科学研究工作者来,是大有可能的。只要积极分子能够充实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論的基本修养,能够充实語文科学的基本修养,記錄經驗,总结經驗,又能够細致深入就有可能。我希望积极分子有条件的,要在这方面能够有所努力,为我国的新的語文科学开拓新的境界。

总之,我不仅希望观摩会自身胜利成功,还希望观摩会对于語文工作的各个方面有些促进作用。就是除了会內的成功以外,还有会外的成功。

* 本文系在第二次全国普通話教学成績观摩会开幕式上的講話。

〔附〕第二次全国普通話教学成績观摩会得奖代表名單

1) 小学学生 一等奖三名: 于虹(江苏)、張建子(广东)、肖厚智(湖北); 二等奖七名: 王予玉(陝西)、何舒(四川)、馬淑华(河北)、金咸樞(上海市)、呂佩英(辽宁)、李澤安(广西)、苏洪升(河北); 三等奖: 彭敏敏(江苏)等十八名; 以上共二十八名。

2) 中学、师范及幼师的学生 一等奖二名: 鄧怡玲(四川)、徐守进(山东); 二等奖五名: 徐玉秀(上海市)、黎長川(安徽)、李秀珠(云南)、張嵩蓮(陝西)、曹衛光(河南); 三等奖: 李少俠(江苏)等十八名; 以上共二十五名。

3) 小学教师及幼儿园教师 一等奖二名: 孔祥美

(山东)、唐家玖(江苏); 二等奖五名: 呂无忝(江苏)、王致凡(辽宁)、楊丕霞(黑龙江)、秦會嫻(上海市)、唐貴琳(北京市); 三等奖: 刁克(吉林)等十名; 以上共十七名。

4) 中学教师和民校教师 一等奖一名: 程士华(安徽); 二等奖三名: 于吉相(黑龙江)、金蓮稷(江苏)、楊金玉(山东); 三等奖: 鍾繼武(黑龙江)等六名; 以上共十名。

5) 工农群众 一等奖一名: 陈映菁(广东); 二等奖二名: 王士俊(山西)、楊益飞(江苏); 三等奖: 李至峰(上海市)等十三名。以上共十六名。

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巨大成就

——迎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

徐世荣

我們祖国解放十年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飞速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已經形成了一个蒸蒸日上、和睦无間的大家庭。我們在工作、劳动、学习和生活中再也不会局限于狭隘的圈子了，需要互通声气，精誠团结，交流經驗，通力协作。在这种形势下，汉民族共同語言从来沒有象現在这样迫切需要的了。

現在随着1958年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全国人民已逐步走向文化革命的高潮。汉民族共同語——普通話更是人人都切身地感到需要。我們的党一向十分重视語言問題。十年来党領導着我們做了許多語言方面的工作；并且发动了群众，依靠了群众。党的领导和群众的需要正是合拍的。

推广普通話工作的正式提出，以至成为文化革命的重要一环，虽然只是近三四年的事，可是它的成就已經大大超过了解放以前四十年的“國語統一运动”。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国庆十周年，这里我們單就普通話的推广工作方面来談一談它的巨大成就。

一 两个會議明确了汉語的规范

首先應該回忆一下那些关键性的大事。

1955年10月15日至24日在首都举行了“全国文字改革會議”。这个會議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联合召开的。會議除了討論了改革汉字問題，通过“汉字簡化方案”外，更热烈地討論了汉民族共同語的問題。并一致認為大力推广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話，是适合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的。推广普通話也将为汉字的根本改革准备条件。會議作出关于推广普通話的三項決議是：

建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首先对全国各地小学、中学、各級师范学校分別作出指示，大力推广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話；并且指示各地教育行政部門有計劃地分批

調訓各級学校語文教师学习普通話。关于部队推行普通話，建議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

建議在全国各省市設立推广普通話的工作委员会，組織社会力量，特别是广播电台和文化館站，大力提倡学习和使用普通話。

建議中国科学院和各有关高等学校合作，进行全国方言調查，編写普通話的教材和参考書，以便利各方言区人民学习普通話。

紧接这个大会之后，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了“現代汉語规范問題学术會議”。會議認為：为了充分地發揮語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交际作用，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能更加順利地进行，为了提高人民文化生活的水平，为了給汉語拼音文字的实施准备条件，以及为了有效地发展民族間和国际間的联系和团结，都必須使汉民族共同語即普通話的规范进一步明确起来。會議經過討論，对于普通話和规范化的涵义都得到了一致的認識。重要的決議中有：組成普通話审音委员会，确定常用詞汇的語音。委员会可以接受广播电台和电影、戏剧部門的諮詢，帮助解决正音上的問題。有关部門共同拟訂两年內完成汉語方言初步普查的計劃，以帮助推广普通話为目的，进行調查，并且編出各地区学习普通話的手册。

这两个大会是推广普通話的“发軔”，关系很大，由此才明确了汉語规范，明确了語音标准，更明确了推广普通話的方針、步驟——推广普通話，首要的是推广北京語音，并且應該“大力提倡，重点推广，逐步普及”。由1955年底，这个历史性的运动就蓬勃开展起来。

二 向語音规范化进军

从1955年底开始，四面八方，各个部門，紛紛开始向汉語规范化——更主要的是語音的规范化进军。

首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在1955年11月初，发出了“关于在軍隊中推行汉字簡化、推广普通話

和实现語言规范化的通知”。通知說，这一工作“有助于發揮我軍高度集中统一的战斗力量，…兵員来自全国各地，我軍的部队又走遍全国各地，我們和全国人民亲密相处，部队首先学好，做好，就可以对人民群众起很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应当把推广普通話作为一項政治任务，使全軍逐步养成学习普通話、使用普通話和傳播普通話的習慣和風气。”通知中所講的傳播作用这一点，十分值得重視。我們的軍隊和群众的关系密切，軍隊实在是推广普通話的巨大力量。

紧接着是教育部門开始发动。教育部1955年11月17日作出“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級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話的指示”。指示中說：“…用普通話教学，对于提高教学質量将起重大的积极作用。学生学会說普通話，毕业以后从事各項建設工作就有了更好的交际工具，更便于發揮自己的才能。”指示十二大項，要求各学校用普通話教学，使学生学会說普通話。要求学生发音、拼音、朗讀、尽量使用普通話。对教师要求学习普通話，各省、市教育厅、局要負責訓練教师，并指定有关部門編印出版教材、教具，举办广播講座，帮助全国教师学习；并且在北京开办“普通話語音研究班”，为各地培养推广普通話的骨干。指示中还指出“各省、市厅、局應該在党的省、市委宣傳部領導之下，把推广普通話列入工作总計劃之内，并且應該指定專人，負責管理这项工作”。全国各級学校及有关部門根据这个指示随即展开工作。

一个更大的推动力量，就是1956年2月6日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話的指示”。指示中說：

由于历史的原因，汉語的发展現在还没有达到完全统一的地步。…为了我国政治、經濟、文化和国防的进一步发展的利益，必須有效地消除这些現象。

汉語統一的基础已經存在了，这就是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話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作为語法规范的普通話。在文化教育系統中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推广这种普通話，是促进汉語达到完全統一的主要方法。

指示中除着重提出各級学校要学习普通話，加强汉語教学，促进汉語规范化之外，并指示部队、机关、青年团、工会、业余学校、广播电台、电影、戏曲、新聞、出版、铁路、交通、邮电各部門，以及外交翻譯人員，都应该学习普通話，使用普通話。另外，也对調查方言，編輯詞典，編写普通話学习手册，制作留声片、电影片，开办訓練班等作了指示。更重要的是指示各省、市成立領導机构。中央由国务院設立“推广普通話工作委员会”，統一領導全国的推广普通話工作。它的日常工作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那时高教部还没有与教育部合并）、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語言

研究所分工进行。各省、市人民委员会都应该設立同样的委员会，并以各省、市的教育厅、局为日常工作机关。这个指示，十分具体，給普通話的推广工作打开了局面。

同年4月10日，文化部发出“为贯彻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話的指示’的通知”，通知中說：

…文化部門对于这项工作，負有很大的責任，因为，文化工作中的各种工具如出版物、电影、广播、戏剧、歌曲等等所使用的語言是否純洁，健康，語法是否符合规范化的要求，語音是否純正，对于广大群众的語言的使用有着直接的重大的影响。…各級文化部門應該从思想上充分認識到推广普通話的工作的重要性，認真研究国务院的指示，組織所屬各单位的人員共同努力加以貫徹执行。

通知中指出一切口头的和文字的宣傳工作中都应当努力推行普通話，电台广播用普通話进行汉語播音，要保証规范化，方言播音应逐渐减少。用汉語攝制的影片，一定要用普通話。各种文艺創作，一定要用普通話写作；用汉語演出或演唱的話剧、歌剧、歌曲等都要用普通話。并指出要大量出版有关推广普通話的圖書、讀物，报刊、电影、曲艺等要从各方面进行宣傳。文化部門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推广力量。全面发动起来，推广普通話就成了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了。

其后，铁道部、广播事业局、高等教育部、全国总工会、青年团中央、邮电部等机关，和各省、市人民委员会，都陸續向所屬机构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話的通知或指示。

各省、市的“推广普通話工作委员会”陸續成立起来了。多数省、市在教育厅、局設置了普通話推广处（科），未設处、科的也設置了專职干部。从此各地都有了工作领导机构，有了工作规划，推广普通話成为經常性的工作了。

三 为推广普通話开辟了条条道路

（一）制定了汉語拼音方案——語音规范化的新工具 1956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語拼音方案（草案）》。草案“說明”中着重提到拼音方案拼写的是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話。虽然这还不是正式方案，但是同以后的普通話推广工作的成就是分不开的。从此，学习普通話才有了得力的工具。

这个草案，經国务院同意，提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各省、自治区和主要城市的委员会組織各方人士討論。吳玉章主任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會議上作了《关于汉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报告。报告說明方案的主要用处，也談到同推广普通話的关系。在全国範圍内，政协組織討論当中，极

大多数人表示贊同。大家也积极地提出一些帮助修改的意見。

草案經過一年多的教学試驗，吸收了各方面反映的意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再加研究、修改。国务院又組織了“汉语拼音方案审訂委员会”，加以审核修訂。最后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扩大會議，加以申議。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全体會議第60次會議通过了这个修訂过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認為“应用汉语拼音方案为汉字注音来帮助識字和統一讀音，对于改进学校語文教学，推广普通話，扫除文盲，都将起推进作用”。決議提請全国人民代表大會批准。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會議上，周恩来总理把这个草案提出，吳玉章主任作了《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經過會議的詳細討論，最后加以批准。決議認為：

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話的工具，應該首先在师范、中、小学校进行教学，积累教学經驗，同时在出版等方面逐步推行，并且在实践过程中繼續求得方案的进一步完善。

教育部即在1958年3月13日发出“关于在中小学校和各級师范学校教学拼音字母的通知”。通知指出各級学校一般均应从1958年秋季起教学拼音字母，学好普通話語音。小学最迟也要爭取1959年秋季起开始教学。

(二)師資的訓練 从1955年暑假起，各省、市教育厅、局陸續举办了“北京語音講師訓練班”，为县、市的小学語文教师北京語音訓練班培养了講師和輔導員，并举办了中学和师范学校語文教师的“北京語音訓練班”。各县、市也都利用寒暑假或农忙假，陸續举办了小学語文教师北京語音訓練班。到1956年年底，受过訓練的中小学教师已經約計六十万。另外，也訓練了幼儿园教师、业余学校教师、机关干部、部队人員、广播員等。这些師資为大力推广普通話創造了有利条件。

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在北京共同举办了“普通話語音研究班”。任务是帮助各省、市教育厅、局和师范院校以及部分綜合大学培养普通話推广工作的骨干。（第一、二两期还培养了方言調查的人才。）学习科目有“普通話語音”“語音常識及方言概况”等。每期修业期限約四个半月（一学期）。每期由教育部通知各省、市、自治区的教育厅、局，选送學員。（主要抽調教师进修学院、普通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語文教师及教育厅、局教育行政干部，六、七两期也抽調了小学教

师。高等师范院校以及其他机关、單位、部队，也有人要求参加学习。）到現在已經开办了七期，培养學員一千余人。他們学习了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話的方针政策，掌握了汉语拼音方案，学习了普通話語音，学习了語音知識，学习了教学方法。結业后仍回到原地或原崗位工作，这样，就把推广普通話的力量散布到全国各地。一、二两期的學員在全国方言普查工作上起了不小的作用。每期學員都能在宣傳、教学、編写、研究或是推广的行政工作上面做出成績。

全国各地的師資訓練工作，三四年来，一直陸續进行。有的地区还成立了同北京举办的差不多的“普通話語音研究班”，稍稍縮短時間，經常地輪訓教师（如山东省）。也有不少地方把任务交到教师进修学院，經常地輪訓教师，提高教师的普通話教学水平。

(三)广播教学 首先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遵照全国文字改革會議关于推广普通話的決議，并应听众的要求，在1956年2月至4月間試办了“普通話实习講座”。主要教学字母、拼音、四声、变調、輕重音等有关汉语拼音方面的一些知識，并适当地进行了示范朗誦。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自編了教材。教学六周，受到听众的欢迎。

教育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同举办了“普通話語音教学广播講座”。由1956年5月至12月，前半期教学北京語音，使用《汉拼音方案（草案）》为正音工具，教材在《教师报》、《中国青年报》連續刊載。后半期为了更具体地帮助中、小学教师通过語文課教好普通話，每周广播中、小学語文課本的朗讀教学問題，随着中、小学語文課的进程，作示范朗讀，通过广播，帮助教师們备课。这次广播，部分省、市也作了轉播。除組織中、小学教师收听外，群众也由此学习了拼音字母、北京語音。有的省、市还組織了广播輔導課，帮助教师和群众学习。陝西、安徽、上海等省、市教育厅、局，并且結合了方音自編了教材，同当地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普通話語音教学广播講座”。河北省成立了文学朗讀广播小組，定期在該省电台广播。

1957年年底到1958年3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了配合《汉语拼音方案》的批准公布，又举办了“汉语拼音字母教学广播講座”。拼音字母教学和普通話語音教学結合进行。在广播节目报上增刊了全部教材。这个广播的复制录音分送各地方电台，在1958年內都會反复重播。广播教学語音，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广播电台大力支持或是主动举办了这些广播講座，对于教师及一般群众的普通話业余学习，和受过訓練的教师的繼續巩固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教师用普通話教学, 学生學習普通話語音

从1956年起, 各地受过語音訓練的教师, 大部分都开始試用普通話教学。从1956年秋季起, 絕大多数的小学一年級都采用了新教材, 用注音字母教学普通話。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印了汉语課本《語音編》, 用拼音字母(草案)講述北京語音。部分中学和师范学校学习了这个課本, 試用拼音字母(草案)学习普通話。1956年起, 中学文学課本生字注音都采用了拼音字母。生字生詞讀音的规范化提高了一步。教师用普通話教学, 学生容易听懂, 提高了教学質量。学生看老师努力說普通話, 学生学习的劲头也鼓起来了。絕大多数学生都欢迎会說普通話的教师。

1956年一年中, 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組織了人力, 視察了各地普通話教学的情况。起了督促推动作用。

从用普通話教学, 到教学普通話, 这个奋斗过程是相当艰苦的。教师需要彻底地認識(認識推广普通話的重要), 艰苦地学习(改变方音习惯, 掌握北京語音), 大胆地应用(不怕生硬錯誤, 不怕別人笑話), 充分地备课(有的教师把一节课所用的語言都写成講稿, 逐字注音, 事先念熟、念准), 另外还需要有坚定的信心。因为推广普通話还是一件新的工作。尤其在1956年初, 宣傳工作还不太够, 社会上的一部分人还没有什么了解, 教师在教学中有时遇到阻力。或是家長不同意, 或是学生、同事嘲諷。有个别的教师在这种情况下, 竟自中途敗退, 不敢坚持教学普通話。但是大多数教师能严肃地对待这个党交給的任务, 說服了个別的家長、学生, 不顧什么嘲諷, 坚持地教学, 終于作出了成績, 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学校領導的重視, 得到了支持。全国中、小学校普通話教学取得了巨大成績, 是跟教师們的努力分不开的。

虽然有的教师語音不够准确, 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們不能脫离实际, 要求过高。教师語音的准确、純熟程度将随着教学的时间与学生的要求而逐漸提高。

(五)教材教具和参考圖書的編制 中国唱片厂自1955年至今出版了《汉语拼音字母教学留声片》、《普通話、日常会話留声片》、《文学教材朗讀留声片》、《小学語文朗讀片》等, 便于一般人的自学或教师进修。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汉语拼音字母发音教学示意图》(附“图解”)、《拼音字母教学卡片》等; 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了《汉语拼音方案字母表》、《声韵母表》、《繪图声韵母表》、《四体字母表》、《音节表》等大型图表及《剪开用的字母卡片》等; 都是帮助教学的教具。

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注音讀物, 如《注音

本“阿Q正傳”》、《注音本“共产党宣言”》等; 也出版了各种教材、課本, 如《农民用拼音識字課本》、《汉语拼音字母教学广播講座》等; 也出版了有关拼音方案、普通話理論知識的書, 如《汉语拼音方案問答》、《拼音字母基础知识》、《普通話常識》、《普通話語音講話》等, 也出版了有关教学方法的書, 如《怎样教学普通話》、《怎样学习汉语拼音方案》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小学用的《汉语拼音字母課本》、《拼音字母十課》、《汉语拼音字母学习法》、《普通話語音基本知识》等;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普通話日常用詞》、《普通話朗讀材料》、《普通話正音教材》等。中国少年出版社出版了帮助小学低年級学生学习拼音字母、学习語音的《拼音歌》。

各地出版社陸續出版了帮助各地人学习普通話的手册。如《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話》、《福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話》……, 《普通話語音和西北音的对应練習》、《广西人怎样学习汉语拼音方案》, 等等。

几种字典, 如《新华字典》、《同音字典》、《四角号码新詞典》等都改用拼音字母注音。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了《常用汉字拼音表》、《汉语拼音詞汇(初稿)》,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汉字拼音檢字》、《普通話正音字表》。这都是便于檢查、学习北京語音的工具書。

出版界大力协助普通話語音的推广, 出版圖書的数量是很大的, 上面所举仅是举例性質。再有值得注意的是群众自己編印教材的劲头很足, 例如江苏昆山縣自編自印課本八万八千多册, 拼音字母表八万四千多張, 还創造了四十几种教具。广东揭阳县自己編印汉语拼音課本二十万册, 公社編的会話課本印发了二十六万四千多册。再有各种圖書的发行数量也很大。例如只是《汉语拼音字母教学广播講座》这一本小册子, 到現在已印行了五百四十万册。各种有关普通話語音的留声片发行已經超过二百万張了。这些数字反映了全国人民对普通話語音学习的大致情况。

(六)調查方言和审定字音 学习普通話的科学方法是把方言和普通話对比, 指出“对应規律”。全国方言情况复杂, 过去向未作过普查工作。为了更好地推广普通話, 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在1956年3月20日, 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厅、局和各地綜合大学、各高等师范学校发出了“关于汉语方言普查的联合指示”。

指示中除对有关部门提出方言普查工作的要求外, 还提出办法十一条。以市、县人民委员会所在地的方言为調查对象, 着重調查語音(声、韵、調的系統, 音值跟北京語音的对比), 同时也調查一部分詞汇和語法

特点。这次調查还是初步的,詳細深入的調查研究,待以后再作。这次調查工作,主要由各地綜合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的中国語言文学系分区負担;各校可結合“漢語方言学”課程或“科学研究小組”,教师与学生合力进行工作。調查所得材料必須結合实际,应用于本地各級学校的普通話教学,并且把方音和北京語音的对应規律及学习方法編写成書。由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編写《漢語方言調查簡表》、《方言調查字音整理卡片》、《方言調查手冊》等,使調查方法取得一致。各省、市教育厅、局与各地綜合大学、高等师范学校共同組成“方言調查指導組”,制定計劃,指示方法,檢查工作,組織編写,并總結經驗。

在这一工作中許多高等学校的教师很热心努力,發揮了作用;另外,教育部与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共同举办的“普通話語音研究班”的結業學員也作了許多工作。到1958年大多数省、市的方言普查已基本完成,正陸續整理材料,編写學話手冊。各地都能注意調查方言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习普通話,都能在实际中应用。比方广东省除編出海南、客家、潮汕、雷州等地区十余本學話手冊之外,还把59个县市的方音与普通話对应規律印发給有关县、市中、小学作教学的参考資料。

根据“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学术會議”的決議,在1955年底,由中国科学院聘請專家,組成了“普通話审音委员会”。进行研究并确定普通話常用詞汇的語音。从1956年4月起,开始审訂异讀詞的讀音。1957年8月,由审音委员会秘書处根据各位委員最后的审核意見(666条詞)加以整理,編成了《普通話异讀詞审音表(初稿)》。这是第一批。

1956年11月开始审訂了本国地名讀音。审音委员会曾把讀音有疑問的地名一百多个,用通信方式向当地进行了調查,根据这个結果,訂出普通話的讀音。

审音委员会为了广泛征求意见,把这两个詞表先在《中国語文》(1957年10月号)发表。

这个《审音表》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視。一些字典依据《审音表》的字音作了修訂。中、小学語文課本也都依据《审音表》注音。《小学語文朗讀留声片》都依据《审音表》发音。广播电台播音員以及广播剧团的演員們,也逐漸依据《审音表》改正了发音。一些話剧、电影演員,也重視了語音的規範。

1959年6月,审音委员会又审定了第二批异讀詞569条,在《中国語文》1959年7月号发表。

四 普通話推广工作的跃进和檢閱

1957年6月25日到7月3日,教育部和中国文字

改革委员会共同召开了一次“全国普通話推广工作汇报會議”,各省、市和自治区教育厅、局都派代表参加。在會議期間,中共中央宣傳部、科学院語言研究所、高等教育部,都派人出席了會議,听取汇报。

代表們对推广工作都是有信心的,但也反映了一些工作上的困难和問題。为了进一步加强工作,积极貫徹“大力提倡,重点推广,逐步普及”的方針,會議指出:普通話推广工作一定要繼續开展,并要求各有关部門重視和支持这一工作,制訂出切实可行的推广工作計劃;各省、市、教育厅、局和县、市教育科、局以及各級学校,必須把推广普通話作为經常工作,列入計劃,加强领导,健全机构。會議特別強調了必須在中、小学和各級师范学校加强普通話教学。除以語文課为重点外,其他各科也要积极爭取用普通話教学。

會議閉幕时,教育部韋懋副部長作了總結报告,肯定了一年多以来普通話推广工作的巨大成績,表揚了一部分积极领导工作的教育行政人員;并指出:各省、市教育厅、局的推广处、科可以协助机关、部队、团体培养骨干和积极分子,推动各部門的普通話推广工作。在教育系統內,可以采取集中訓練和业余学习相結合的方式,提高教师普通話教学的能力。

1958年,在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各地推广普通話工作也蓬勃开展起来。許多地方的文教部門更加重視这一工作,繼續举办了拼音字母学习班和普通話語音訓練班。教师們也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自己在学习上以苦战精神攻克不能說普通話的堡垒。在教学上,爭取提早教学拼音字母,教学生学习普通話。許多地方訂出了具体的計劃,大力展开社会宣傳活动。如湖南省隆回县为了大力展开推广普通話工作,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发出联合动員令,要求各級各类学校以跃进速度推广普通話。上海市中等、初等学校全体教育工作者向江苏省、浙江省、广州市的中等、初等学校教师发出学习和推广普通話的社会主义竞赛倡議書。他們要以愚公移山的頑强精神,在一年內攻下“学好普通話”堡垒。山东青島順兴路小学召开家長座談会,进行家庭訪問,与街道取得联系,爭取群众支持推广普通話工作。莱阳师范学校召开了全校师生員工的学习普通話誓师大会。每人訂了学习普通話的大跃进計劃。江苏省小学低年級儿童基本上能用普通話朗讀課文,浙江省杭州市在“五四”青年节开展了“大家来講普通話”的宣傳活动。团市委、教育局、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普通話广播大会。湖北省鄖县有计划地进行了工作,成績很大,教师中涌現了不少积极分子。河南省的规划要求全省中、小学校教师在秋季开

学前学会拼音字母,开学后教学。全省学生在1958年内学说普通话。陕西省在5月间开办了为时六个星期的“普通话语音训练班”,培养了优秀的教师。安徽省阜南、凤台等县掀起学习普通话热潮,以广播站、电影队为宣传主力,并利用黑板报、墙头标语、报告会、朗诵比赛会等方式开展全面宣传。广东省广州市在4月间举办了拼音字母教学试点班。四川省眉山初中从1956年开始教学普通话,坚持了三年,因为领导重视,语文教师积极带头,经常地检查评比,取得很大成效。毕业生担任民校教师,能用普通话教学,群众反映很好。黑龙江省为了替各机关、团体培养推广普通话的骨干,在5月中开办了为时一周的講習班。干部们学习后,回到本单位再展开推广工作。河北省各县市先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宣传工作。山西省长治师范学校在文化大跃进中向全省师范学校、中、小学提出“推广普通话大跃进倡议书”,展开了竞赛运动。北京市顺义区、通州区举办了大规模的“小学教师学习班”,学习四天,参加学习的一千五百多人。其他各地方也都掀起宣传、鼓动、学习、竞赛、试验、观摩等活动的热潮。浙江、陕西、河北、山东、福建、湖北、河南、江苏等省都举办了全省的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

各地推广普通话的跃进声中,飘扬起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这一面红旗。“苦战五十昼夜,人人能说普通话”的口号成了事实,创造了惊人的成绩。《红旗》杂志第四期报道了这一件突出的事例。

大田县吴山乡是福建省第一个推广普通话的乡,1958年3月底,当中共福建省委提出六大跃进的号召后,吴山乡乡党委和全乡人民的革命干劲空前高涨,除坚决保证完成1958年增产任务外,在原有扫盲工作的基础上开展了推广普通话运动。五十天后,果然有85%的青少年,60.5%的壮年,能讲普通话。全乡干部都能讲,能听。主要原因是党委重视,负责部门主动,把群众发动起来,同时正因群众需要,明确推广普通话是为生产服务,因而造成了强有力的社会风气。

福建省教育厅的报告说:“从吴山乡一马当先推广普通话,在短时期内取得这样大的成绩,看起来:1)在当前工农生产大跃进和技术革新情况下,推广普通话不仅必要,而且符合农民的迫切要求;2)扫盲和推广普通话相结合,不仅没有妨碍扫盲进度和增加困难,而且能推动扫盲工作。”这些结论给推广普通话开辟了新路。

1958年7月25日到31日,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和教育部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一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这次观摩会是为了表演成绩,交流

经验,促进和加速普通话的推广。^①

吴玉章主任在开幕词中指出:自从1955年下半年起,三年来,各地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央和各省市都训练了大批普通话师资和辅导员。截至1957年年底,全国已有七十万教师学会了普通话。社会上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也有很大开展。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总的说,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发展还不平衡,社会上还有阻力,这个工作仍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政治任务。今后还要加强宣传,继续大力推广,使推广普通话工作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普及,进一步高涨。

这一次观摩会,显示了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深深地启示了我们:1)推广普通话必须与政治密切结合,政治挂帅,才能深入人心。普通话的重要性已逐渐被更多的人了解,因而学习普通话已经成了全民主动的要求。2)推广普通话必须依靠群众,形成社会风气。群众发挥了集体的力量,互相督促帮助,运用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多样方法,发挥革命干劲,普通话才能多、快、好、省地推广。3)拼音字母是学习普通话的最好工具。拼音字母的学习并不困难,如果教学得法,可以很快地掌握。大会上的成绩表演,反驳了那些“拼音方案难学”的想法和说法。4)普通话可以自学成功。如果掌握了拼音字母,当然就更加便利,更容易准确,更容易巩固;但是,另外还需要在生活中多方面地用心学习,大胆应用。5)普通话语音水平的要求,应该考虑条件,斟酌分寸,逐步提高,最后达到完全正确的标准。不能不分阶段,不顾条件,机械地一般要求,影响教师与学生的信心。6)普通话的推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正在突飞猛进。全国人人学会普通话,不再是遙远的希望,这是可以乐观的。自然,并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完全没有问题了,也并不应当说学习普通话是十分容易的事。由这次挺进中的检阅看来,推广工作正在逐渐进步——加速,加广,加深;而教学,学习上的困难,也正随着大家的努力,逐渐克服。

这个期间,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和广播事业局还联合举办了“全国十二城市少年儿童讲普通话的比赛”。十二城市是:上海、南京、杭州、福州、广州、成都、武汉、长沙、西安、兰州、天津、沈阳。先由各地组织各小学少年儿童,积极准备。七月下旬,各地自己评选,每处两名,必须是1956年以来开始学习普通话而有显著成绩的。八月中举行全国总评选,通过各地寄到北京的朗读录音,评定了名次、成绩;然后在中央人

^① 这次大会详情,请参看《中国语文》1958年8月号。

民广播电台的对少年儿童广播节目中广播当选小学生的朗读录音。这次竞赛在少年儿童中起了推动作用。同时也看出了全国各地少年儿童学习的努力。

五 在工农群众中的推广工作

1955年到1958年,在全国各级学校里,教师和学生中间,普通话的教与学固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从推行面的广度来说,还不能使我们满意。“重点推广”之后,应当继之以“逐步普及”。推广的方向,不能仅仅限于学校。当然,学校是一个重要的阵地,但是,广大的工农群众也是需要学习的。福建省大田县以及继大田县而起的浦城、平潭、南安等县,和江苏省的昆山、金坛、武进等县,已经打开了一个缺口,使我们知道方言区的农民也能学习,而且十分需要学习。同样的,工人也可以学习,也需要学习。比方上海新成区饮食业职工学习的成功,就是一例。^①又如江苏新沂县棋盘大营的水利工地上,抬土、挖土、打夯时用普通话唱小调,打号子,群众感到很大兴趣。

1958年下半年,吴玉章主任视察了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江苏、上海九省市。1959年初,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组成一个工作组,视察了广东、福建。——了解了各地推广普通话,推广拼音字母和扫盲的情况。

在视察中看到各地1958年的工作成绩很大。一般学校已开始用普通话教学,更重要的是:普通话已经出了学校的大门,开始向社会推广,而且农村比城市积极,劲头很大。特别自大跃进以来,形势发展一日千里,党在每个阶段的方针任务,需要迅速和群众见面,做到党委一声号召,群众风起云涌。在这种情况下,推广普通话的需要就更加迫切。自1958年下半年起,福建、广东、江苏等省的好些县市,结合生产大跃进,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大力推广普通话。现在这些地区的青壮年中已有很大一部分开始能讲能听普通话。这是1958年在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面出现的一个新形势。^②

向工农群众推广普通话,最好是根据需要。一方面自然要根据生产、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工农学习文化的需要,同学习识字和扫盲结合起来。

吴玉章主任在视察中看到了拼音字母很受群众欢迎;群众学习拼音字母并没有什么困难;拼音字母能够提高语文教学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地方的“注音扫盲”试验总结或报告中都提到在教学拼音字母,认识汉字的同时,实际收到了学习普通话的效果。扫盲和推广普通话的结合教学,已经在山东、河北、江苏、黑龙江、辽宁等省相继展开,这就叫做“注音扫盲”。各地正在争取“大面积丰产”的“注音扫盲”运动,眼看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

最近,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③有十五位工农代表、两位民师代表参加了表演,充分表现了他们对普通话学习的热情、顽强和优异的才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次大会是1958年第一次大会后的再一次总检阅。工农群众的参加,反映了一年多以来在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鼓舞之下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新开展。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十几位工农代表也同参加大会的其余一百多位学生、教师一样,十分熟练地掌握了拼音字母,能迅速而正确地拼读、拼写,利用字母学话、识字。

工农代表的语音水平超出了大家的估计。例如山东民师杨金玉,广东农民陈映菁,山西农民王士俊,江苏工人杨益飞、夏柏扬,他们的朗诵和讲话,不止是接近规范,而几乎是没有什么问题。他们的成绩成为第二次观摩大会的新收获,标志着1959年全国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新胜利。

最后,引述吴玉章主任的几句话,说明今后推广普通话的奋斗方向:^④

“我们要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争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文化革命,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并实现汉语的规范化——在汉族人民中基本普及普通话。因此,在广大群众中大力推行拼音字母,帮助学习文化和统一语言,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① 1958年11月初开始学习,七十多个单位,三千多人,学习两个月,全行业基本上学会了普通话,博得群众好评。详见《文字改革》1959年第2期。

② 详见《文字改革》1959年第6期,吴玉章:《利用拼音字母帮助扫盲和推广普通话》。

③ 这次大会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团中央联合召开,由8月10日至21日,进行了成绩观摩表演和教学经验交流座谈。

④ 见《文字改革》1959年第6期。

記第二次全國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

秋 甫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中央教育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聯合舉行的第二次全國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於1959年8月10日在上海市開幕，到8月21日結束。出席大會的有全國二十七個省、市、自治區的代表共184人，包括12個民族成分。會上採取表演評比方式觀摩成績，參加評比表演的134人，得獎的有96人（名單見407頁）。會議期間還舉行了經驗交流會、普通話和拼音字母推廣工作會。中共中央委員、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在會上作了重要指示（全文見本刊本期第403頁）。此外還舉辦了教學成績展覽會。

一 上海市黨政領導的支持和關懷

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委員會給了這次大會極大的支持，除了抽調幹部協助大會工作以外，還撥給了交通方便、環境安靜、設備完善的錦江飯店讓代表們住宿。代表們深深感到黨和政府的關懷。

大會開幕式由上海市教育局局長、上海市文字改革協會籌委會副主任、上海市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陳琳瑚主持。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章繼致開幕詞（全文見本刊本期第405頁）。

中共上海市委候補書記、上海市文字改革協會籌委會主任石西民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文字改革協會籌委會向大會祝賀，並歡迎到會代表。他首先介紹了上海市自1956年以來推廣普通話的情況，指出推廣普通話工作對生產建設和文教建設的重要性。認為上海市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擔負着相當重要的任務，因此，上海市推廣普通話工作的重要性也就更為顯著。最後，石西民同志號召上海市人民要重視大會的一切活動，認真學習兄弟地區的經驗，使上海市的普通話推廣工作大大提高一步。

中央教育部副部長林礪儒代表教育部向大會祝賀。他分析了當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形勢，指出這種形勢有利於普通話的推廣工作。他強調地說，學校應該更多地擔負起推廣普通話和拼音字母這一任務。並且說，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上海、廣州等地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工具的某些教會學校竟以英語作

為校內的流通語言，我們今天處在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難道還不能在自己的學校里做到人人以講普通話為榮嗎？他認為完全能夠做到，也應該做到。

上海市團委副書記杜淑貞代表共青團中央和上海市團委也講了話。她號召全國廣大青少年在黨的領導下積極發揮帶頭作用，在推廣普通話和拼音字母工作中作出出色的成績。

在大會上講話的還有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主任金仲華，上海市文字改革協會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講話全文見本刊本期第407頁），江蘇省教育廳副廳長王鵬；上海市工會聯合會副主席沈涵，上海市警備區政治部宣傳部長馮鵬，上海鐵路管理局黨委書記林岩，上海市郵電局黨委副書記李長劍等。著名演員白楊也向大會表達了熱烈祝賀的心情。

二 從評比表演看教學成績

8月10日下午起到13日上午，各省市、自治區代表表演了評比節目約140項。筆者同好多位去年參加過第一次大會的同志談起來，大家都共同感覺到這次大會的表演成績比第一次大會有了顯著的提高。這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清楚地看出來：

第一，這次大會出席了約百分之十的工农代表，他們不僅學會了普通話，而且大多數都學會了拼音字母。這是上次大會所沒有的。這不僅反映了普通話和拼音字母的推廣工作在逐步向社會開展，也說明了這一工作向社會開展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這次表演節目內容不僅思想性鮮明，而且包括的範圍也比較廣泛。有反映全國人民對黨和國家領導人衷心愛戴的詩篇，有贊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散文，有描述忠於革命事業而不惜犧牲生命的英雄、模範業迹的小說，也有歌唱大躍進中巨大成就的快板，還有宣傳推廣普通話和拼音字母的相聲，等等。

第三，代表們講普通話的語音水平普遍提高了。上次大會中多數代表在語音的聲韻調方面或多或少有些不準確的地方，今年卻大大不同了；特別是中學、小學、師範學校的教師和學生，無論是節目表演或會外交

談，已經很難發現語音上的缺點。這充分說明觀摩會不僅是檢閱成績的會，也的確是促進成績提高的會。

工农代表的語音同普通話的标准語音还有些距离，这是很自然的。出席这次大会的所有工农代表，大多数是工农业战线上的骨干，生产任务很紧。他們当中一般的文化水平只是扫盲結业程度，最高的也只是高小毕业。有半数的人在参加这次大会以前沒出过或很少出过自己家乡的县区地界。他們的普通話都不是有系統、有計劃地学习的，学习过程中師資缺乏，教材供应也十分困难，更談不上有什么正音設備，而且多数都是在1958年的生产大跃进中开始学的。因此，要拿标准語音来衡量他們的学习成績，那是不切合实际的。相反的，我們應該珍視这些成績。

第四，代表的人数比上次大会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得奖人数也比去年得奖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且学生代表中不少是从1958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以后开始学习的。这一方面标志着教学面的逐步扩大，另方面也显示了教学方法和要求都有所提高。

三 几項精彩的特約表演

大会評比表演期間，除了各省市代表的节目以外，还有几个特約节目。这些节目的表演說明了拼音字母有广闊用途，說明了拼音字母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設各方面的作用，也給代表們懂得許多新鮮的事物。更重要的是这些节目的表演也是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課。

特約节目中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軍部队某艦队的海軍視覚通訊——汉语拼音旗語表演，上海市郵电管理局的“拼音电报”表演，上海市邑庙区聾啞識字班二年級小學生的“拼写与講話”和上海市第一聾啞学校一、二年級学生集体表演的“心儿在歌唱”。

旗語是海軍部队重要的通訊方式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海軍部队，是在接收了国民党几只破軍艦这样的基础上开始了各項軍事业务訓練的。最初从农村、从陸軍部队轉到海軍来的战士，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当时又沒有一套海軍业务的訓練教材，于是通訊技术也只好暫時沿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办法。以后曾改用过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也用過俄語字母来拼音。但这些办法，不仅战士們掌握困难，而且也不能滿足我国国防需要。因此，最近才决定改用汉语拼音方案。这个艦队用汉语拼音方案打旗語还是从今年才开始的，但是从表演的节目看，他們已經掌握得很熟練了。

拼音电报的表演由上海市郵电管理局的职工同志担任。台上的两端，各放了一架收发拼音字母电报的机器，首先由假設的辽宁电台拍发了一封辽宁省教育厅

給云南省教育厅的电报，云南省代表收到电报后立即給辽宁省教育厅一份回电。前后只不过十多分鐘。但是双方收到的电报，刚从电报机上拿下来就能讀出来，完全不需要翻譯。这虽然是一个表演，实际上同真正的拼音电报只不过是距离远近的区别而已。这个表演給人們深深認識到汉语拼音字母确实是十分科学的。

此外，还有兩項聾啞兒童學說普通話和使用拼音字母拼写的表演。其中上海市邑庙区聾啞識字班二年級学生王小黑和赵国芳的拼写和說話緊緊地吸引住了观众。

聾啞兒童从小就丧失了听觉和說話的能力，接受知識和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多么不便！在旧社会，这样的人从来就被認為是殘廢者。“啞吧能說話，聾子能听话”本来是不可想象的奇迹，但是，这奇迹在今天却成了很普通的事情。啞吧不仅会說話，而且会說普通話；聾子虽然还是不能听话，但是可以用眼睛代替耳朵“看”話。王小黑、赵国芳两位聾啞小朋友不仅把上述所謂的奇迹在我們的眼前变成了现实，更令人惊叹不置的是，他們熟練地掌握了拼音字母。他們在黑板上用拼音字母迅速写出了代表們要求写的話句，贏得經久不息的掌声。

上海市第一聾啞学校的老师說，我国有三百多万聾啞人，他們只能用眼睛代替耳朵来看別人說話，这样就要求大家都能說普通話才能便于同聾啞人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如果大家都用方言說話，聾啞人就难于分辨了。

当然，我們学普通話并不是为了一定要同聾啞人在一起生活和工作，但是，学会了普通話更便于聾啞人同我們接触，这不是更好的事情嗎？

四 同几位代表交談

这次大会中年龄最大的是安徽代表陈桂兰同志。她今年五十岁，是安徽歙县岔口人民公社社員。这位老大娘来上海以前一生沒到过家乡二十里以外的地区，一直是在岔口生活。她从来沒有見過火車、輪船，当然更沒想到她会来上海开会。这次能来上海开会，学到很多新的知識。她由衷地說，这是党对她的培养。

陈桂兰老大娘1958年以前說的还是一口难懂的安徽歙县岔口方言，現在虽然普通話說得还不十分准确，但是已經能同来自全国的代表流利地交談了。她还和另一位安徽代表方琴花（公社社員）同志用普通話在会上共同表演了“学习張青和”的對話。

岔口人民公社开展普通話推广工作以后，有的年青社員曾經热了一陣就慢慢冷下去了。可是陈桂兰老

大娘为什么能坚持講普通話呢？她說：“推广普通話是党领导搞的，党领导搞的就只有好处沒有坏处。”她还說，解放以后，她的家乡是一个生产、文化都搞得比較好的地区，常有工作干部和外地的單位来檢查生产或参观。常常因为听不懂話感到很不方便。她們公社掀起学习普通話高潮以后，她的儿子、媳妇都学普通話了，她想，要不学习，連儿子、媳妇的話也会听不懂了，所以下决心大胆地說起来了。

江西农民代表罗社坤，是江西婺源縣秋口人民公社的生产副大队長。他是去年开始学說普通話的，为了坚持說普通話，他还经历过一段小小的波折。

本来学說普通話应该坚持天天說、处处說，才学得好。可是，因为推广工作在当地沒有广泛展开，婺源縣其他乡的一些干部和群众还不知道推广普通話是怎么回事。罗社坤同志和另一个社員有一次到邻乡去买小猪，用普通話同当地群众交談，被認為是有意“出洋相”“摆官架子”，那里的干部很不滿，竟把他們的小猪扣留起来。因为他們还坚持用普通話解釋为什么要說普通話的道理，几乎連他們也被扣留。后来他們跑回来通过党組織才把小猪要回来。因此，他希望推广普通話的工作应该迅速在农村中开展，还应该加强宣傳工作。

江苏省工人代表夏柏楊，是江苏新沂縣新沂鞋厂工人。1958年底，新沂縣展开学习普通話和拼音字母运动以后才开始学的，最初信心不大，觉得普通話和拼音字母都很难学。后来看到教师也是鞋厂的工人，又看到一个五十七岁的老工人武保运同志只利用了两周业余时间就学会了拼讀拼音字母，这才大大鼓起了他的勇气，决心学习。現在夏柏楊同志不仅通过拼音字母学会了說普通話，而且还能用普通話朗誦短篇的文学作品。在工农代表中他是学习成績比較好的一位。

另一位在会上引人注意的是云南省代表楊道源（傣族），他会說傣語，也会說云南汉話。但是从表演中，除了民族服装不同外，我們很难听出他所說的普通話有什么語音上的缺点。楊道源同志是个小学教师，他認為学习普通話不光是汉族人民的事，少数民族的人民也应该学。中国是有几十个民族的国家，几十个民族如果沒有一种交流思想的共同語言，那是不可想象的。他說他学习普通話，一方面是由于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确实由于在生活中、工作中同本民族或兄弟民族的群众或干部接触时，常常因为語音不通而感到十分不便；也由于看到因語言隔閡，使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損失。比如去年生产大跃进的号召剛提出来的时候，乡里的干部到县里去开会，把“大跃进”

听作“大要紧”，沒有很好地領会會議的精神，回来傳達的时候，說1958年是“大要紧”的一年，給坏分子創造了造謠的机会，使得一些思想落后的群众惶惶不安。因此，他覺得在全国範圍內大力推广普通話十分必要。

五 吳山生产大队和陈进四

1958年《紅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福建大田县吳山乡在农民群众中推广普通話的报道以后，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和关切。每一个关心吳山乡推广普通話情况的人也許会問：“現在吳山乡怎样了？”这里就簡單地介紹笔者所了解的一些情况。

参加这次大会的福建代表中，有两位是大田县吳山乡人，一位是陈詩讀同志（农民），一位就是全乡推广普通話的积极分子陈进四同志。据陈进四說，吳山乡已改为屏山人民公社吳山生产大队。現在青壯年社員仍然坚持用普通話交談；全生产队有523名学习过拼音字母，百分之八十的人已經达到会拼、会讀、会写的程度，一般人的普通話語音水平都大大提高了。根据广东省方言普查指導組今年5月参观了福建、广东推广普通話先进地区的总结报告說，吳山乡确实已經做到了“人人說，处处說，懂一句，說一句”。甚至大田县的广播也全部用普通話，早已不用方言重播了。

陈四进是去年参加第一次大会期間学会拼音字母的，她回去立即教給了別人。她沒有辜負吳老对她的期望，已經做到了“拼音字母在吳山乡开花結果”。在这次大会的經驗交流会上，她說她在农村推广拼音字母并不是很順利的。开始时青壯年社員說拼音字母是外国字，不容易学会；老年人說庄稼人学了沒用。总之，大家的看法很分歧，很少有人有信心。乡党委根据这些思想情况立即做了动员报告，先組織了一个五十多人的師資訓練班，由陈进四担任講師。后来推广工作正式展开以后，一些青壯年社員仍然信心不足。因此，陈进四就决定动员她父亲陈五福老大爷学习。起初她父亲怎么也不願意学，經過再三劝說才同意了。有一天晚上陈五福到民校去玩，当他拼讀出了一位教师写在黑板上的 wǔ xīng hóngqí yíng fēng piào（五星紅旗迎風飄）的时候，那位教师非常惊讶，隨即对他有这样良好的学习成績表示欽佩。这位年老的农民馬上十分兴奋地跑回家去向他的女儿报喜。这件事情很快就傳遍了全乡，給正在学习拼音字母的許多青壯年社員很大的鼓舞。

陈进四同志生动地朴实地介紹了上述这段事情以后，立即获得了代表們亲切、热烈的掌声。

談談傳統戏曲中的用詞問題

馬連良

我从事的京剧业务，大多数剧目是非用语言表达不可的，不單是使用語言，而且还要使用艺术性极为强烈的語言。可是，我不是語言学家，同語言学家們的联系也很不够，因此，虽然在舞台实践方面使用了近五十年的艺术語言，虽然承蒙观众的爱护，把我的表演風格（包括語言風格）看做一个流派，然而，惭愧得很，現在讓我談談傳統戏曲里的語言問題，确实有千言万語不知从何說起的感觉。

这里只簡單地談一下有关用詞的一些体会吧！

我是这样体会的：应当肯定地說，自从开国以来，我們的傳統戏曲在使用語言上已有了較前大不相同的变化。可是也应当指出，在这个方面也还存在着不少的問題有待于解决。

所謂使用語言有着較前大不相同的变化，最主要的是演員們在思想上重視了舞台語言，而且一反过去的保守观点，認識到舞台語言也不是不能改变的。这在用詞方面表現得特別鮮明。

首先，我們有意地做了一些“純洁化”的工作。从前我們在舞台上常使用一些低級庸俗的詞儿，甚至有人觉得这样才能刻划人物性格，但是現在我們認識到那是不能使人容忍的对于艺术的污蔑。过去在“玩笑旦”和“小花臉”的嘴里常常說些不三不四的話，“大花臉”也有时信口开河，这些我們差不多都加以改动了。以最近的一个例子來說，我和袁世海、叶盛兰在合演單折戏《借赵云》的时候，我就提出在張飞被典章战败回营的时候，对軍士們所念的“我把你們这些王八×的”改作“你們这些无用的东西”。

“純洁化”的工作是比較容易做的，毒素易于辨識，清除出去，任务就完成了。与此同时，我們也注意到了“正确化”的工作，这就比較困难一些了，因为这项工作需要学識。从前我們在台詞里除了一些低級庸俗的詞儿外，还大量使用生造的詞，不适当地簡化詞儿或者是誤用詞儿。有一些是相沿成为习惯，竟至达到“見怪不怪”的程度。例如大家所熟悉的“馬走战”和“地溜平”之类。有一些是关系到整段台詞的“轍口”，改一句就要牵动全局，不容易“下斧子”。例如《定軍山》里黃忠唱的“将身且坐蓮花宝”一句，就是个最突出的例子。在这方面我們也做了一些大胆的刪动。在我演的《苏武牧羊》里，卫津有一句“人来与爷帶虎豹”就經不住考

驗，到底是虎呢，还是豹呢？大約全不是，干脆改为“人来与爷前引道”。又如：在《审头刺湯》里陆炳有两句散板“大炮一声人头落，为人休犯律肖何”，“律肖何”这种倒装用法实在别扭，为什么不把轍口換一換，改成“大炮一响人头掉，为人休要犯律条”呢？还有在《雪怀园》里莫怀古告訴他的夫人說莫成替死的情况是“他在那薊州堂上替我代劳”。“代劳”用的不恰当达到了可笑的程度，我把它改成“他在那薊州堂上命赴阴曹”，虽然还是“水詞”，可是直截了当，清楚明白。关于这一类的工作，我們也做了不少。

还有一种改动的情形是，由于語言所表現的思想感情对于人物形象有着或多或少的損害，这种改动就超出了前述的語言的規范性質，例如在《三娘教子》里薛保以老家人的身份向三主母說出下面的話就很不当：“恨只恨張刘二氏把心腸改变，一个个反穿裙另嫁夫男。喜的是三主母发下誓願，一心要教子男把名傳。莫不是三主母也把心腸变，要学那張刘二氏另嫁夫男？”我就把后二句改为“莫不是三主母把世厌，要追隨老东人命赴黃泉？倘若是你真个行此短見，撇下我老的老，小的小，挨門乞討，我也要撫养我家小东人啊。”这样一改就更增加了悲剧的气氛，思想感情也符合人物的性格要求。这方面的工作就比“正确化”的工作困难一些。應該坦白地說，我們做的还很不够。

不难看出，在戏曲語言的詞汇使用方面，“純洁化”和“正确化”两个方面的工作是我們尽力为祖国語言的純洁健康而奋斗的具体任务；并且希望能够多少对观众起些影响。在最后提到的一項工作，就不是語法修辭的范围了，但是它的目的是为了提提高戏曲語言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这也是十分重要的。

不过，我們的問題还是不少。傳統戏曲所使用的語言由于历史性的内容和音乐性的形式，事实上在語音和詞汇上都不很容易完全使用普通話，我們在目前做的工作还只是給它鋪平道路，向普通話靠攏。在“純洁化”和“正确化”的工作方面，由于我們的文化水平低，也还不能把戏曲語言的艺术价值一下子就提的很高，在这方面，我們迫切要求文学家和語言学家多多帮助我們。

关于傳統戏曲的語音問題，随后我将在另外一篇小文里談談我的看法。

應該重視電影語言技巧的繼續提高

吳 青

解放后,我国电影無論在內容方面或艺术方面,都获得迅速的不断的提高。这是无需多加解釋的,只要看过解放前和解放后电影的人,在对比的印象中,都可以直接体会到。單就电影里所用的語言說,解放前除了少数影片的演員能叫人滿意之外,許多演員所說的怪腔怪調、不倫不类的“國語”成了今天相声段子里諷刺的对象。解放初期的許多影片里的語言也还殘留着那种所謂“國語”的影响,或者有意使用方言土語,但是随着普通話的推广和漢語规范化的要求,我們的电影語言和話剧語言一样,已經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但是严格要求的話,也还有許多問題需要进一步解决,电影語言的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

我常常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情况:在观众聚精会神地力图抓住影片中每一个細節的同时,却未免交头接耳:“他說什么?”“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这就难怪观众在看完电影以后,有时会感到一些遺憾。我注意到其中一部分遺憾是由于語音不正,口齿不清,重音不准等原因引起的。我們知道,观众进影院虽說为了“看电影”,不是“听电影”,但当銀幕上的形象呈现在观众眼前并吸住了他的視觉之后,“听电影”对于观众來說就成为很重要的事了。所謂“听电影”主要当然是听語言。因为語言是交代影片故事情节、傳达人物思想感情的重要工具。繼續提高电影語言的艺术技巧是当前提高整个电影艺术水平的重要环节之一,是值得重視的。

曲艺演員說:“一字不懂,有如鈍刀杀人”,这絕不是危言聳听。我国民間艺人准确地了解語言技巧的重要性,在吐字发音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經驗。他們要求自己:“清晰的口齿沉重的字,动人的声韵醉人的音”;他們講求五音(唇、舌、齿、牙、喉)、四呼(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十三齣;他們研究每个字的声母发音部位和韵母的发音特点;他們勤學苦練,坚持不懈。比較起来,电影演員在这方面还应该多向他們学习。目前电影演員之中用心研究漢語的声、韵、調、語音結構、北京音系的語音規律等等,并刻苦鍛煉語言技巧的人还是不够多的。

为了促进电影語言的繼續提高,我想就以下几个

問題提出几点意見。

語音問題。近几年来党在語言文字方面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电影語言也在實踐中總結出不少的經驗教訓,电影工作者对語音方面的重視比之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地方語音表現地方色彩,以地方語音突現人物性格的創作方法,除特殊情况外,已經无人采用了。电影語言應該是純正的普通話,这是无需爭辯的意見了。但是有些演員还没有糾正地方語音,也就表明他們还没有足够重視語音問題。有个演員,录音后很遺憾地說:“音录完了他們才告訴我×字讀錯了,阳平說成去声了,早告訴我不就早改啦!”这的确值得遺憾,但是如果他平日重視語音的話,就不会事先忘了檢查一遍。自然,要使語音純正只靠录音前临渴掘井是不够的,要把糾正地方語音当作專門的課題来練習,更准确地說,要有象学习一門外国語一样的决心和毅力才行。

注意語音的純正,不但是演員的責任,也是导演的責任。有的导演还不够重視正音工作,他們以为只要演員与电影剧本所要求的形象、氣質等相合就行了,語言問題往往在考虑之外。《党的女儿》是一部观众喜爱的影片,但是蘆明(玉梅的爱人)說的話帶有許多四川音。观众当然会怀疑:他的口音为什么这样呢,合理的根据显然是很难找到的,只能有一个解釋,那就是演員本人的口音是这样。演員自己不能消除这种地方音,导演又迁就这种地方音,于是就造成了这白璧之瑕。

語音不純,不但不合乎漢語规范化的要求,也能影响观众欣賞艺术的情緒,給人一种生疮長孔的感觉,某些时候也能影响影片思想內容的表达。最近我看了影片《祝福》,就从《祝福》里举个例吧。賀老大为弟弟賀老六娶亲,自己作为中人向楊七老爷借錢。这件事是通过楊七老爷手下的王师爷办理的。影片中賀老大把“王师爷”說成“王四爷”。我們知道,“师爷”和“四爷”虽只差一字之音,在意义上的距离却是很大的。

研究語音科学,研究北京音系的語音規律,不只是为了糾正地方音。已經掌握了普通話的演員,如果沒有語音科学的基本知識作为基础,沒有注意研究語音在表达思想上的規律,在艺术語言的創作中也会常常

出現問題的。

为了要运用語言細致而准确地表达思想，为了掌握这方面的規律，就需要研究語言的結構、邏輯停頓、語詞和邏輯重音，等等。这里我想只提一提关于邏輯重音的問題。我們知道，邏輯重音在表达思想上有很重要的意义，演員必須把每一句話中最重要的字眼加以突出，說得比任何別的字眼都更明显。只有把每一句对白的主次区分清楚，語言才具有鮮明的层次，包含的思想才能明确地表現出来。我們的演員和导演是非常重視影片的思想性的，对每个細節都会进行詳細的分析，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在艺术語言的表現上，根据一些完成的影片看来，研究得显然不够。有时影片中的語言沒有把思想內容表現得很明确，語言的輕重主次处于自流状态。这可能是由于对語言作用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因此重視不够；也可能是，虽然研究了語言的邏輯重音，但是缺乏基本鍛練，缺乏足够的實踐功夫，还不能得心應手地駕馭語言。

在影片《祝福》里，祥林嫂被魯四老爺驅逐后，很激动地自言自語地問：“为什么…連菩薩…都不能救我嗎？”臨終時，她不能不接着追問：“倒底有沒有菩薩？”“倒底有沒有靈魂？”“菩薩”與“靈魂”在她心里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是可以設想得到的。但是，影片中对于“菩薩”這一詞沒有足够的強調，“靈魂”一詞的后半也被吞掉了。演員在影片其他許多場合的許多話都是說得十分动人的，如在深山密林里呼喚阿毛，真是声声凄楚，震撼人心，为什么会在这些詞句上說不清楚呢？根据发音的原理来看，“菩薩”的“菩”字，声母是“p”，是出气音，演員在情緒激动的时候，出气音沒有控制好，出气过多，掩盖了字的母音“u”，字音当然就不清楚了。由于“菩”字出气过多，后面一連串字音也就受到影响而使人感到有点儿音虛了。“倒底有沒有靈魂？”一句，是祥林嫂生命臨終時最後的一句話，氣息是微弱的。演員在氣息控制得不够時，頭一個陽平字“靈”虽然是清清楚楚的，第二個陽平字“魂”却非常微弱，不清楚。其实“靈魂”兩字在普通話里該是“中重”音，“靈”字說輕一點倒不要緊，“魂”字却需要強調。

影片《祝福》里还有这样一段：

七老爺：老六那筆債，越滾越大，你是中人，加上你自己過年借的，一個子兒也不還，這怎麼說得過去呢？

賀老大：七老爺，您再幫幫忙吧，我那兄弟實在病得利害，要不，請王師爺跟我一起去要……

七老爺：去要？簍糠里榨不出油來……

王師爺：老大，看樣子，老六的病不會好了，他死了倒也罷了，你是中人，你可脫不了身哪。”

王師爺的話里“他死了倒也罷了……”影片中強調的是

“他”字。我們知道，從七老爺的話起，所談的都是賀老六的債，事件一直沒變，演員強調“他”字無疑是不必要的。從情理上分析起來，王師爺注意的是賀老六要死，因此在“死了倒也罷了”一語中，重音該在“死了”一詞上。我們可以相信，這一點演員是明了的，那為什麼實際上听起来倒是強調了“他”字呢？我想在这里除了要了解語句的邏輯重音之外，還要解決突出邏輯重音的方法問題。要注意邏輯重音與相鄰字音的關係，根據這來權衡與安排發音輕重、強弱、長短的程度。“他”字是陰平，音高而長，是開口呼，韻母是“a”，同它相鄰的是“死”字，是上聲，音低而短，加上韻母“i”不如“a”音响亮，如果“他死”兩字連在一起，用相同的力氣說出來，“他”字自然要顯得突出。可是這種突出出于字音本身的要求，並不出於影片思想內容的要求。這樣的例子不是絕無僅有的。在影片《飛越天險》里有這樣一段：

團長：……你看這邊伏龍山脈 6500 公尺能飛過去，為什麼這鬼頭山就飛不過去呢？

政委：嗯，鬼頭山的標高不準確。

我們知道，政委的判斷既明確而又肯定。影片在政委那句話里，突出了“標高”兩字，“不準確”三字反而顯得較低較輕。這就影響了政委判斷的明確性。為什麼會這樣呢？從字音上看，“標高”二字是陰平，開口呼，也有象“他”字那樣的性質，“不準確”三字是去聲或上聲，又是合口呼或撮口呼，與“標高”兩字相較就顯得不明朗，遇到這樣的情形，演員如不特別注意，很容易把重音說錯的。

在北京音系里，“一、七、八、不”有着聲調上變化的規律，有些演員還沒有掌握這些規律，在語言表現上就會受到影響。在《飛越天險》影片里有這樣兩句：

政委：……為什麼國民黨的航行記錄，一到鬼頭山就沒有了呢？

參謀甲：是啊！那就證明他們沒有一架飛機飛過鬼頭山。

人民空軍要飛越鬼頭山，碰到一個嚴重的困難，就是沒有航行資料，從政委的話里介紹了國民黨的航行記錄，“一到鬼頭山就沒有了”。因此，“一到”的“一”字是不能輕輕說過的。參謀甲說的“就證明他們沒有一架飛機飛過鬼頭山”中的“一架”也應強調。“一到”“一架”中的“一”字都應是陽平，影片中說的可是陰平，其後果就妨礙了邏輯重音的表達。

根據以上各例來看，僅僅分析了一段戲的思想，僅僅從思想上明確語句中的邏輯重音，而不去解決語音問題，語言的內容仍然無法表達得透徹。要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如果不注重掌握語言的各種內在規律，還是不能得心應手的。

（下轉 430 頁）

土話与普通話

老舍

从前写作，我爱用北京土話。我总以为土話有劲儿。近二三年来，我改了主張，少用土話，多用普通話。

是不是减少了土話，言語就不那么有劲儿了呢？不是的。語言的有力无力，决定于思想是否精辟，感情是否深厚，字句的安排是否得当，而并不專靠一些土話給打气撑腰。

北京的土話可能到天津就不大吃得开，更不用說到更远的地方了。这样，食用土話本为增加表現力，反而适得其反，别处的人看不懂，还有什么表現力可言呢？

由历史上看，土話的生命力并不怎么强。您看，元曲中的，和更晚的《紅樓夢》中的一些土話已多死去，給我們增加了困难，非作一番考証功夫不能穷其究竟。就是我幼年时代的北京土話，到而今也有很多打入了冷宮的。交通越方便，教育越普及，土話的势力似乎就越小。土話势力越小，普通話的势力就越大，这是好事，也是非常自然的。

一个生在某地的作家或演員，极其自然地願意用本地話或一部分本地話去写作或表演，因为容易写的順手，演的順口。用普通話去写作或表演須費更多的事，費了事还不見得写得或說得够味儿。可是，这也就是作家与演員更該努力苦学的地方。我知道，割舍搖笔即来的方言而代之以普通話是不无困难的。可是，我也体会到躲避着局限性很大的方言而代之以多数人能懂的普通話，的确是一种崇高的努力，这种努力不仅在于以牛易羊，換換詞汇，而也是要求語言負起更重大的責任。負起語言精純、語言逐漸統一、語言为越来越多的人服务的責任。

讓曲艺語言在推广普通話中起桥梁作用

白鳳鳴

关于舞台語言的問題，我只想談一点几年来在使用語言上的点滴感受。

开国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蓬勃发展，語言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汉语规范工作正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着。对作为民族共同語的普通話的推广，人們尽了很大的努力，学习普通話已在全国各地形成高潮。这就是开国以来汉语发展方面的显著成就。

人們学普通話的时候，多半都以广播、話剧、电影、北方曲艺为标准，認為这些是最正确的，可以作为他們的示范。但是北方曲艺使用的語言是不是都合乎标准，都沒有問題呢？不是。因为曲艺不同于广播、話剧和电影。曲艺是韵文，既要求它是标准的口头語言，又要有自如的韵律，这样就很难运用，很难掌握。几年来，我們虽然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存在的問題仍不算少。首先是使用語言的曲艺工作者，除少数作家和專業作者外，多半文化水平不高，而且掌握韵律的技巧也不純熟。为了符合曲艺形式的需要，往往勉强去凑韵，例如，象这样的句子：“目見那，国徽挂，天安門上，設立中央。”“标語灯，排两行，气象庄严万丈光芒。”类似的句子并不罕見。尽管他不是“地溜平”“馬能行”，但仍然是糟粕。这非但对語言发展没有什么帮助，反而

破坏了我們日常的口头語言。至于演員，問題就更显得突出。有的演員，有时为了唱腔的需要，往完整的詞句里胡加零碎儿。如京韵大鼓《华容道》，关羽向孔明請令表功的一段，其中，“我在古城南門外拖刀計把蔡阳的首級削”这一句本来就很勉强，不是个上等句子，可是演員竟唱成“我在古城的南門外拖刀計把蔡阳这不他的这个首級削”，使得我們的語言变成那么不通順、不純洁。問題严重的是，直到現在还有人这样唱，这就不能不使我們曲艺工作者有所思考。在推广普通話中，曲艺这个艺术形式要起桥梁作用，因为学习普通話的广大群众，正以我們的語言为标准，难道能讓他們学习这些糟粕嗎！

語言中新詞的不斷出現，也是我們曲艺工作者在使用語言中碰到的困难問題。按照傳統曲艺格律的要求，曲艺的唱詞，最好是三字头、三字尾唱着合適，听起来也舒服。然而現在的唱詞中，有“干劲十足”“社会主义”“經濟建設”“保卫和平”，等等。如何使这些新詞唱起来既有韵律又和諧、流暢、动听，并且符合口語的习惯，这一方面需要我們曲艺工作者下一定的工夫。另一方面也希望研究語言的專家們充分發揮协作精神，帮助曲艺工作者能更有效地解决上述問題。

試論成詞的客觀法則*

鄭林曦

一 漢語的詞和它的特征

全國解放以來，討論什麼是詞，劃分詞和詞組的界限，研究構詞法，基本上都是為了解決一個實際問題——怎樣正確而一致地按詞連寫。

那麼，就已經提出來的詞的定義或是構詞法研究成果來看，是不是足夠適當地解決了這個實際問題呢？真理要用實踐來檢驗。從漢語拼音方案公布以來出版的普通話讀物，語文課本上的拼音課文，按詞連寫的注音讀物，拼音詞匯等等看起來，雖然共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可是遠不能說已經取得一致，事實上分歧的地方還是不少的。就已經發表的一些拼寫規則和討論文章看起來，儘管有幾個問題的意見比較集中，可是不僅還需要從技術上而且還必須從理論上加以解決。以往的討論和研究，都是很有價值的，對於解決這個實際問題有貢獻。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已經取得的一些成果；然而我們也必須繼續努力前進，才能逐步使分歧縮小，認識一致。

據說在詞的定義的討論中，意義單位說逐漸被句中活動說所代替。^①這自然是一個進步。由斯威特(H. Sweet)提出，被劉復等搬用的“最小的獨立意義單位”說，經過批判後，終於沒有什麼人再沿用了。^②把詞叫作“語言單位”，顯然是比較正確的。同時，詞的不可知論或詞無法加以界說的理論傾向，在討論過什麼是詞以後，也不再聽人說起了。這些進步是應當肯定下來並且作為討論的基礎的。

就句中活動單位說方面提出的一些詞的定義來比較，看起來還是為好些位語法研究者所同意，但是在這些定義裡面，也還有高下之分。把詞規定為“最小的、能夠自由運用的語言單位”，^③比起只說“詞是能在句子里自由運用的最小單位”^④要好一點。因為“語言單位”總是指的一定語音形式和一定意義的完整的統一體；而單說“最小單位”，卻沒有說明它是一個什麼單位。“單位”含有計量的意義，計量必須要有實體。“語言單位”是說出了所計量的實體“語言”的。不明確地說詞是“語言單位”而只說“單位”，有時候會容許把一些非語言的東西混進語言的分析中。例如《漢

語的構詞法》在構詞研究中大量應用了一種叫做“字”的單位。既然說“沒有肯定某一個成分是詞不是之前，一概叫做字”，又把“字”和“詞素”等同起來。我同意王力先生的意見，“字”在活語言的語法分析研究中是沒地位的。^⑤要么是作為“語言單位”的詞，要么是構成詞的“詞素”，不能確定前無妨叫語言片段或成分。即使文字形式用到構詞中，它仍然得有一定的語音形式（例如“八字步”[bāzibù]，“X光”[èksguāng]），它也仍然是詞素。另一方面，那些沒有被用固定的文字形式寫下來的口語的詞或者詞素，也好叫作“字”么？也非要用考古的方法給寫出一個“字”來才去研究么？至於把兩個音節以上的詞素（象“糊塗蟲”中的“糊塗”）也叫作“字”，那顯然是同漢人通常對於“字”的了解不適應的。對現代漢語中“詞”這種東西的研究，是以有聲語言為對象的。人們既然不贊成“拼音文字里經常連寫在一起的一組字母”這一類界說詞的辦法，那麼把作為書寫符號單位的“字”攪進語言單位的“詞”的研究中，恐怕也不能算是妥當的。

其次，我認為值得特別說清楚的，就是“最小的”這個限定語。提出這個限制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劃分詞和詞組的界限。可惜的是在漢語的特殊情況下，是否“最小的”，往往難於完全區別詞和詞組的界限。特別是對於那些由兩個以上現代漢語中還可以自由運用的詞作為詞素構成的合成詞來說，更其如此（例如“羊肉”“火車”“最後”“鋼鐵”，還有“頭痛”跟“肚子痛”相

*本文系《試論成詞的客觀法則和按詞連寫問題》全文的上篇，下篇《按詞連寫問題》將在本刊下期發表。請讀者同時參考作者發表在1959年15、16期《文字改革》半月刊上的《拼寫法上現存的分歧和問題》一文。——編者。

① 參看周有光《分詞連寫法問題》，見《中國語文》1959年7月號。

② 關於對斯威特定義的批判，可參看鄭林曦《關於漢語的詞和漢語單音節說》，見《中國語文》1955年5月號。

③ 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語法和語法教學》，10頁。

④ 陸志韋等：《漢語的構詞法》，5頁。

⑤ 王力：《詞和仿語的界限問題》，見《中國語文》1953年9月號。

比)。此外，“最小的”还有一种副作用，它容易引导人们把词拆碎成“字”。那么，我们不說“最小的”而說“基本的”，怎么样呢？不是同样有区分词和词组的作用（词组是拿比它更基本的单位——词构成的），而又可以减少流弊么？要加“最小的”或“基本的”这些限定語，最好在“語言單位”前加上一个“构造句子的”的限制。拿“头痛”来说，虽然从中可以分析出“能够自由运用的”两个成分“头”和“痛”；但是在“他很头痛”和“他肚子很痛”两句话中，却可以分别出“头痛”是一个“构造句子的語言單位”，而“肚子痛”是两个“构造句子的語言單位”（“肚子”和“痛”）。“最小的”的本来含义也是造句法上分析到无可再分析的一种限度，是不能适用到构词法的分析上去的。提出“构造句子的”这个限制来，就可能避免任何从构词法上再加以分析的誤解和尝试。词这种語言單位的特点，就在于它可以从語言中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語言材料的單位，搬来搬去自由运用来构造句子（包括短語）。在具体运用中词在語法支配之下可以发生形态变化（例如重叠、加詞尾以至詞素偶尔分离、顛倒），但仍然不失其为同一个词。加上“构造句子的”这种限制，比用“語言里”或者“句子中間的”加在“能够自由运用（活动）的語言單位”前面，也似乎界說得更加明确一些。

此外，这个定义还会引起一种誤解，認為词只是一种語言形式，一种結構單位，可以不考虑词的意义或語法作用（也有人称为“語法意义”的^①），可以离开内容專談形式，或者專从形式上鉴定词。在討論什么是词的时候，就曾发生过是否可以專从語法角度給词下定义的爭論。^②最近《学术月刊》上进行的要不要把词分为“詞汇中的词”和“語法中的词”，也是同词义在形成词、鉴定词上的作用大小問題有关的。^③在研究词或編詞汇的过程中，的确也有專从形式上着手分析（例如“同形替代法”），結果把常用詞素和詞根鉴定为單音詞的。陆志韦先生已經公开檢查了这种方法上的錯誤和受美国“結構派”語言学的影响。^④我們也的确很容易在批判了“最小意义單位”說之后根本撇开词的意义来研究词。其实在应用“語言單位”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們本来就应该首先明白確認它是語音形式和詞汇意义还有語法作用的完整的統一體。一个词是語言的内容和形式相互矛盾、对立而又統一的基本單位。词的語音的和結構的形式，是由于进行社会交际时候有了表达一定新的内容（例如产生了新事物需要新名称）的需要的时候，才利用原有語言手段（資料）来构成新的形式，形成新的词和新的构词法的。只談形式，不問内容，不管社会习惯，認為純从形式上可以鉴定一个語言

片段是词不是词，这显然是同内容决定形式而形式反过来影响内容的唯物辯証法观点不相符的。

就客观上存在的汉语的词来研究，絕大部分是包含着一个具体意义的实詞。实詞的意义多半同邏輯上、心理上的概念相符，虽然并非一对一的关系。有些概念是用詞組表达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既然承認它是詞組而不是合成詞，那就得承認构成詞組的每一个词仍然是表达了一个概念（就是說“中华”“人民”“共和国”各表达一定的概念）。不承認词这种語言形式的产生主要是为了表达概念（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关系在人类头脑中的概括的反映），并且有了词才能够恰当地表达概念，那也是沒有正确地認識到词这个社会历史产物的实質的。汉语的虛詞是在实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被用来表明詞和詞間語法关系或者表达一定的語气。詞和詞間的关系，难道不也正是客观事物間較普遍的关系的反映么？感叹詞、語气詞不也正是表达人对事物的观感和人与人間关系所需要的嗎？汉语的詞汇既然包括实詞、虛詞（其中有些是專表感叹或語气的声音的），那么在說明汉语的词是什么的时候，是不是要先把词的这种性質和作用加以概括呢？

还有，汉语的词的語音形式，到底有什么特点呢？我們来看，拿它同詞組或句子比起来，簡短不正是词的一个特点么？据統計，在《汉语拼音詞汇》J部1492个詞中，双音节詞約占89.4%，單音节詞占7.6%，三音节詞占2.9%，而四个音节以上的詞所占的比例是很少的（仅仅0.1%）。^⑤对于别的民族語言的词来说，簡短是不是词的一个特点，我們可以不管；但是就汉语来说，不把词的形式是一个簡短的語音組合这个特点指出来，是不重視客观事实因而会令人惋惜的。我們还可以看到，形成汉语词的过程，往往同时也就是語音

① 孙常叙：《汉语詞汇》。

② 参史存直等的意見，見《語法論集》第一集，中华書局出版。

③ 《学术月刊》1959年7月号上《評“論語言中的词”》后附录的周斌武先生的信，就曾說他的文章是針對着近代西方資產階級語言学中比較流行的观点：“以‘形式分析代替語法分析’，不承認語言的語义研究对于語法結構分析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④ 陆志韦：《北京話單音詞詞汇》重印声明。

⑤ 据《汉语拼音詞汇》1958年12月第一版統計。全部两万多词的音节数比例的統計，有人正在作。所統計詞的个数越多，双音节詞的优势越会大起来。

組合縮短的過程(例如: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個成語縮短到雙音節的詞“矛盾”)。詞和詞組的分別,也往往在於它有一個比詞組更簡短的形式(例如:拿“工農”這個詞和“工人和農民”這個詞組比較)。這樣說,把語音形式簡短作為詞的一個特征指出來,也應當認為是有必要的。

綜合上面所說的一切,我覺得可以把漢語的詞界說成這個樣子:

漢語的詞是由一個簡短的語音組合表達一個單一完整的意義或者起一定的語法作用的,能夠自由運用來構造句子的基本語言單位。

這不是一個一般的詞的定義,因為它一開頭就專指漢語的詞。作者也不期望用這個來代替一般的詞的定義,而只是希望扼要地指出漢語的詞的特征。因為我覺得指明漢語詞的特征,對於下面我們將要討論的幾個問題(成詞和不成詞,是詞和不是詞,劃分詞的界限和按詞連寫的方法等)是必要的。而專從形式方面或語法方面來研究這些問題,則是不容易得到圓滿的解決的。

二 試論成詞或不成詞

詞,漢語的詞,到底是一個客觀的存在,還是某種構詞法研究所“規定”的或者某種按詞連寫條例連寫的結果?這個問題也還可以換一個方式來問:詞,漢語的詞,是不是在漢人長期使用漢語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哪些語言片段(主要指詞組或者句子形式)在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成為詞,哪些沒有成為詞,成詞或者不成詞有沒有客觀的法則可尋?成詞的客觀法則是什麼?

關於漢語中詞的存在的客觀性,的確有人發生過懷疑。有些反對漢字改革的人,認為每個漢字就是一個最小語言單位,可以直接用以構造句子,而且比任何拼音文字的詞都更加靈活。因此認為按詞連寫是主張拼音文字的人們搞出來的,怎樣是詞,永遠沒有一個客觀的界限。這種看法,本來就是從一種主觀成見出發,並非對現代漢語進行科學研究的結果,我們可以不必多加理會,只要注意到他們是反對漢語的詞的客觀性這一點就夠了。在贊成漢字改革以至於自己積極擬制文字方案的人們中,也有人不承認漢語詞(特別是合成詞)的客觀性。例如唐蘭先生就曾經說:

中國語言有難以想象的豐富的詞匯,如何確定詞兒既沒有科學的標準,即使驟然制定了幾萬到幾十萬的詞兒,也无法教人去一一學習與應用,那末要創造以詞兒為單位的文字,只能是某些人的空想,是經不起考驗的,是无法實踐的。^①

表面上唐先生好像也承認漢語有詞而且“詞匯豐富”。其實統觀他的全篇文章,他所說的“詞匯”不過是幾千個漢字臨時結合的“語匯”或成群的詞組跟合成詞混雜在一起的總表。他明白地否定了“確定詞兒”的“科學的標準”,認為拼音文字是由人們主觀地“驟然制定”出來的。那麼這種詞還有什麼客觀性可說呢?唐先生這種看法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不少習慣於使用漢字而又未深究漢語詞匯的客觀法則的人,是容易夸大漢字的這種所謂靈活構詞的特點,否定漢語的詞是一種客觀存在的。因此在唐蘭先生們看來,“詞兒沒有連寫,也沒有很大的不便”。^②漢語的詞果然沒有科學的(也就是客觀的)標準可以確定下來么?既然如此,唐先生為什麼又列出“豬肉”“羊肉”“牛肉”……“肉骨頭”“肉麻”等二三十個,並一律把它們稱為復音節的詞,而不把“豬的肉”“羊的肉”“牛的肉”“帶肉的骨頭”“肉發麻”……也列為詞呢?那不是更能證明“肉”字的靈活性嗎?可見,詞還是有其區別於非詞的一些特點的。象“肉麻”這樣的詞,能說是由誰“驟然制定”出來的嗎?唐先生能再舉出幾十個、幾百個“肉”加任何一種感覺的結構,都說它們是詞么?可見,成詞或不成詞的科學的標準原來是有的,不過唐先生以及別的先們不喜歡談分詞連寫,不高興努力去尋求罷了。如果將來的拼音文字果然按詞連寫出許多詞來,那也必然是進行科學的研究並在拼寫實踐中長期考驗的結果,決不是由什麼人主觀“驟然制定”出來的。

還有些贊成文字改革的同志,的確得承認是在努力尋求劃分詞的客觀的標準的。但是他們的有些說法和作法,很容易使人誤解為不承認詞的客觀存在。比如陸志韋先生在編《北京話單音詞詞匯》的時候,主要利用一種叫作“同形代替”的方法來鑑定什麼是一個單音詞。1955年4月陸先生進行了自我批評,^③認為用“同形代替”方法分析出來的一部分單音詞,差不多全不能算詞,只是常用的詞素。1957年陸先生和別的同志編寫的《漢語的構詞法》,又用“擴展法”代替“同形代替法”,主要從語句結構的形式方面來鑑定什麼是詞,什麼不是詞。可是這樣專用一種方法確定下來的詞,有一些又是違背一般人的“語感”或常識的(例如:認為“駝肉”是詞,而“羊肉”是詞組),因此就給人一種印

① 唐蘭:《論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文字改革基本問題》,見《中國語文》1956年1月號。着重點是由引用者加的。

② 同上文。

③ 陸志韋:《對於單音詞的一種錯誤見解》,見《中國語文》1955年4月號。

象，好象漢語的詞是按照某種方法分析而得的結果，而這種方法的可靠性又是常改變或有爭論的，因此詞到底是不是一種客觀存在也就頗為可疑了。當然，陸先生和其他同志用各種方法對漢語的詞進行較深入的研究的這種嘗試精神是值得贊揚的。這總比一口否定有可以確定詞的科學的標準強得多。但是，為了強調一種方法的作用，就認為在用這種方法分析以前，我們所能認識的只是語言片段，或者說“詞是從句子里摘出來的，不是先有了‘先天的’詞，超脫了句子的現成的詞，然後用來造句的”。^①這就未免把詞的客觀存在和可以獨立運用的性質給弄模糊了。

事實如何呢？應當承認絕大多數的詞是漢人明確知道的。“太陽”“人”“桌子”“老虎”……，難道一般人都不知道它們是詞嗎？難道必須先經過“從句子里摘出來”的手續或所謂“提選”過程，才知道它們是詞嗎？難道脫離開句子，它們就不可以單說或者集合起來排列在詞匯中嗎？我和一些同志近年來研究了漢語普通話的常用詞匯，從實踐中了解到，絕大部分詞都是為一般人所理解、所常用並且能斷定是詞的。只有一小部分到底是詞或是詞組或者只是詞素，才是需要加以討論、研究的。А. И. 斯米爾尼茲基的《關於詞的問題》曾經為《漢語的構詞法》的編者所重視，可是他也不明白地說俄語中有些“經典”的詞，它們清楚的不同於詞的部分，也不同於詞的組合（例如俄語的 дом [家]，стол [桌子]，теперь [現在] 等）嗎？^②為什麼到了研究中國漢語的詞，就把許多具有顯明的確定的可提選性和高度的完整性、堅穩性的詞給看得模稜兩可起來了呢？只是為了研究上的慎重么？恐怕不盡然。基本上還是對詞的客觀性認識不夠肯定和明確；沒有首先確認：漢語的詞是長期社會發展和漢語發展的歷史的產物，而並不是什麼人主觀“制定”或者純從語言形式分析“鑑定”出來的。一個語言片段在漢語的發展中成詞還是不成詞，是由社會決定的，不是主觀任意的。多數原來的詞組以至句子形式，在發展中成為詞以後，在語音形式或語法結合能力上自然相應地產生了一些特點，足以使我們較容易地斷定它是詞。可是，即使有一部分還沒有產生較穩固的語音形式上的特點，兩個以上的構詞成分有時候還分別可以單獨作為詞在別的語句中自由運用；只要它具有了一種主要的特徵，就是具有了“自由運用來構造句子”這種基本語言單位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已經為社會所普遍承認，已經“約定俗成”或“群眾通用”了，它就獲得了詞的資格，可以作為基本的語言單位來使用。象“火車”“鐵路”“羊肉”“雞蛋”“船”等的成為詞，首先是由社會發展對漢語的需

要來決定的，不是由構詞方式或拼音連寫規則決定的。相反地，只有在它們成了詞之後，才有可能研究它們內部結構的方式，才能說漢語中有沒有某種構詞格式。用漢語拼音字母把它們連寫起來，固然使人更加方便地看出它們都是詞；就是象目前書報雜誌上這樣用漢字一個個地印着，也沒法否認它們都是詞。主張按詞連寫的人們，只是因為漢語中已經客觀地大量地存在着詞（特別是多音節詞），才主張在拼寫形式上使詞的面目清楚；決不是主觀地把一種形式硬加在不存在的語言實際身上。我們目前對如何按詞連寫法還有分歧和爭論。這只因為人們的認識對客觀的事物還有若干不盡相同的反映，我們的語法知識和按詞連寫的理論還有不夠完善、一致的地方。但是決不能因此說漢語中的詞並不是客觀的存在，或者根本否認客觀的詞是可以認識，可以按詞連寫的。

《漢語的構詞法》一書認識詞的方法是：“主要的是憑它的內部結構，拿它來跟同一類型的造句結構互相比較，在每一個類型上找出某種具體的條件來，說明所研究的語言片段已經不是造句的結構而是構詞的結構了。”^③從這幾句話里我們可以看出，這種方法不是“歷史的”，只着重在詞的內部結構形式和造句結構形式這一平面上的比較，而不研究一種和某種造句結構類似的語言形式如何從不是詞變成了詞。如果單從是否運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一方面來看，作者覺得孫常叙先生的關於“造詞法”的研究^④在認識詞的方法上更加容易求得客觀的結果。從漢語的歷史資料來說明某種同造句結構類似的形式在某個時代已經作為不可再拆開的基本語言單位在自由運用，並怎樣在現代漢語中一直沿用下來，似乎比單從類型對比中求出某些具體條件（象是否已具有引伸的意義或不可擴展等）來說明一個詞的客觀性，具有更大的說服力。其次，我們還可以問一下，為什麼不可以把在各種類型比較中舉出的那些不同的具體條件概括一下，找出一些成詞或不成詞的共同條件呢？例如，好幾種類型比較中都可以看到，結構中有一個成分（詞素）在現代漢語中已經不能獨立應用的，基本上應該是詞（例如“寒暑表”，“寒”“暑”或“寒暑”在現代漢語中都不獨立）。這能不能算作成詞或者不成詞的一個條件呢？如果從語言結構的形式這個角落里鑽出來，把語言的社會的、歷史的發展跟語音和語法結構形式當作一個運動過程的總體來看待，從發展中去尋求成詞不成詞的條件和準則，我想總有些

①②③ 陸志韋等：《漢語的構詞法》序言，附錄及3頁。

④ 孫常叙：《漢語詞匯》第三編。

共同的东西可以找出来的。

这篇文章只打算作一些原则性的讨论,不可能罗列大量材料来说明成词或者不成词的共同条件或准则。但是就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分析归纳,有些主要点是可以提出来讨论的。

(1)成词或不成词的主要准则或界限是:当社会把一种语言片段(无论它是词组、成语还是句子形式)当作一个构造句子的基本语言单位,经常地、大量地在活的语言(口头的或书面的)中独立运用,并且使它在意义上、语法上,往往也在语音形式上具有了词的特征(象上文所说的),逐步在群众间通用,那么它就成了一个词。没有达到这种条件的,就不能成为词。

(2)词是否已经形成并得到广泛应用,是可以从书面的(包括历史的)和口头的许多语言事实中得到验证的。要知道一个语言片段是否已经成为词,在现代普通话中是否还能作词用,最可靠的办法是:“造造句子看”。此外还应该看看它的常用性。出现的数量(常用频率)对于是否成词没有绝对的决定作用,但是常用性大的总比没有常用性的更容易成为词。为什么说“假若以为‘鸭蛋’是‘复音词’,‘鸡蛋’是词组,任何人都不会接受”^①呢?就因为常用性几乎相等在这里起了作用。如果把“犀鸟/蛋”当作词组,我想人们除了觉得有点不合类推原则以外,是不会拒绝接受的。

(3)意义上是否有了什么改变,对于成词、不成词也是有作用的。也可以说正因为社会上有了表达一个单一的、完整的概念的需要,人们才来用词根构造新词或把词组、成语、句子形式等变做词。“心疼”原来表达一个判断,在“他心疼”的句子中是一个主谓结构的谓语。这时“心疼”就从句子变成了所谓“句子形式”。当社会上有了不是告诉一个判断,而只是告诉一个关于身体情况的概念的需要时候,“心疼”这个句子形式就被当作词表达单一的、完整的、表明怜惜或舍不得的概念,并且用来象其他词一样尽造句的功能。这样就逐渐产生出语法结构上的特点(例如可以象其他形容词一样在整个结构前面加副词“很”“最”“非常”等;又可以象其他动词一样后面加宾语“他心疼你”)和语音形式上的特点(例如作动词表“怜爱”意思的时候,“疼”变成轻声读成 xinteng)。此外,意义有了新的引伸,词组也常常变成词,象“饭碗”(旧社会对职业的一种形象说法)、“狗尾巴”(一种草)。

(4)语音上出现了新的形式,结构上出现了前所不能具有的形态(构词的或者构形的),这当然更足以证实一个新的词已经形成。汉语中表明词组或其他语言片段已经成为词的语音形式变化,大致是:音节间的不能

能停顿、音节的省略和缩短、重音变轻声、声调的改变、儿化、前后音节中音素的同化或异化,等等。形态的变化,大致是:能否具有重叠或新的重叠方式,有一部分是否变为或增加了词头、词尾,是否可以带辅助成分(“着、了、的”等),是否变了词类等。例子无须多举,只要看看“买卖”的成词过程就行了。据说“买”或“卖”古代只是一个词,^②统指一次以钱易物的交易。后来分化成“买”(mǎi)和“卖”(mài)两个词,声调就有所不同。后来又有了更通俗地表明“交易”这种概念的必要,于是两个词构成的词组逐渐发展成为词“买卖”(mǎimài),语音不再有间断停顿。在近代和现代汉语中,跟一般双音节词相似,后一音节变成轻声,说成“mǎimai”。意义也有了发展,不仅是表交易的动词,而且成了表商业的名词。象一般名词一样,在表示微小的时候可以儿化,象“xiǎo mǎimair”(小买卖儿)。意义更可引伸为一次有利或无利可图的事情、行动。

(5)从结构成分上看,如果有一个成分已经变得在现代汉语中不能独立作词用了,那自然用不着再怀疑这整个结构是否已经成词(例如:甘草、老翁)。然而,就算所有结构成分都还能在现代活语言中作词用(例如“火车”“铁路”中的“火”“铁”“车”“路”),只要它全部地或基本上合乎上述准则,取得了“构造句子的基本语言单位”的资格,拆开来会失掉它作为词的意义和语法作用,它就仍然是词而不是词组。能不能扩展,只是观察这类结构已经成词没有的一种方法,而并不是全部的或唯一的方法。至于有些词被不规范地、不合逻辑地拆开说(例如把“小心”拆开说成“小点儿心”),这不仅不能用来证明它不是一个词,反倒证明它是一个词。因为“小点儿心”这种格式的用法是在“小心”这类词成词之后才产生的,决不出现于它成词以前的实际语言中。

(6)我们应当承认汉语中有正在形成过程中的词。这种东西具有临时自由结合和作为“构造句子的基本语言单位”使用的两重性质。比如说政治术语中有一个“思想意识”,这到底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构成的一个词组呢?在语言学界中曾经有人讨论过。它有时好象就是“思想”的同义语,^③但是显然又比“思想”说的多一点。^④它的结构和“思想”或者“意识”是一类,都是

① 《汉语的构词法》,23页,注①。

② 孙常叙:《汉语词汇》,135页。

③ 例如“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就是党的利益亦即共产主义的利益、全人类解放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谈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湖北人民出版社)

④ 例如“每个党员在思想意识中,应当坚强的树立这个观念”(同上书)。就不是单指“思想”中。

并列结构,中間沒有“和”的連結,完全有成为詞的資格。但是到底最后能不能成为一个詞,还有待于社会和語言的发展来决定。还有些略語,象“扫除/文盲→扫盲”;“土地/改革→土改”,也可以說是处在从詞組到形成詞的过程中,甚至有些可以肯定說已經成了詞了。象在“扫盲/运动”这一詞組中的“扫盲”。

为了更具体地說明这些准則在詞的形成中的客观意义,我們可以举出“語文”这个詞的形成作为例証。在《辞源》《辞海》《标准語大詞典》《國語詞典》中是查不到这个詞的。①这个詞开始大量应用在1934年开始的討論大众語和新文字的“新語文运动”中,过去本来“語言”是語言,“文字”是文字,分开說的,有必要并举的时候說“語言文字”这个詞組。可是在这次运动中,因为要提倡“大众語”和大众的文字——拼音的新文字,“語言文字”一块說的社会需要就大为增加,于是就开始了“詞化”的过程,把“語言”省略为“語”,把“文字”省略为“文”,四个音节縮短为两个音节,“語文”这个詞就应运而生了。到底是哪一位开头先用的,已經无法考据也无須考据了。鲁迅在那一年八月二日《答曹聚仁先生的信》中已經很自然地使用了“語文”这个詞。②八月中写的《門外文談》,更多次使用“語文”一詞。③十月写《中国語文的新生》,更用到文章题目上了。当时用語中,除开一部分“大众語文”是指用“大众語”写的文章外,“語文”的确是并指語言和文字的。那时候的“新語文运动”和“語文”月刊名称中的“語文”,也都指的是語言和文字。“語文”,在那时新文字刊物上还常拼作“y-wen”。1943年編的《國語拼音詞汇》已經收进了这个詞,拼作“yuwen”。④詞的穩固性已經反映到拼写形式上来了。在解放区的学校中,早就有了“語文”課和“語文”課本。1949年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更明确地把小学“國語”課改称为“語文”課。“語文”的成詞,可以說在政治上也得到確認了。可是这时候有些大学把“語言文学系”簡称为“語文系”,于是“語文”产生了歧义,《中国語文》月刊1952年8月、9月两期上刊载了姜仲民等的《“語文”質疑》等三篇短文,就是企图澄清它的含义的。其中有人主張不用“語文”这一名詞,恢复全称“語言和文字”。⑤然而,作得到嗎?消灭一个已經形成慣用的詞,比創造和推广一个新造的詞还难。語文的发展也是有它的客观发展法則的。现在大家还是把“語文”主要当作“語言和文字”的总称来用。会逐渐消灭的恐怕倒是哪些当作“語言和文章”“語言和文学”講的歧义。从这个例証,我們可以充分認識到,詞的成为詞完全是社会和語言客观发展的結果,有客观的法則可寻,并且是可以科学的标准去認識它的。要作好按詞連写的工作,拟出較能取得一致的按詞連写規則,要紧的事情是先在這些客观法則的認識上逐步达到一致,建立起共同的科学的理論来。

① 《國語詞典》中有个“語文学”,是“語言学”“文字学”的合称或“語言文字之学”的詞化,但是沒有“語文”一条。

② 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6卷58頁)中說:“但,在交通繁盛,言語混杂的地方,又有一种語文,是比較普通的东西……”,“語文”前加“一种”,同句中另有“言語”一詞,可見“語文”已經成詞。

③ 例如《門外文談》(《鲁迅全集》6卷80頁)上說:“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語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語文的大众化”。

④ 林迭肯主編:《國語拼音詞汇》,世界書局出版。

⑤ 高楚:《关于“語文”这个名称》,見《中国語文》1952年9月号。

編者的話

在反右傾、鼓干劲、轟轟烈烈地开展增产節約的群众运动中,我們偉大的国庆十周年的节日即将来临。回顧这十年来我們語言学界,正如本期社論所指出,虽然做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可是同国家各項建設事业飞跃前进的形势比較起来,还是很不够的。在編完这一期以后,編者深深感到,我們大家必須坚决响应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积极推动語言科学的更大发展。

本期除了集中地报道了第二次全国普通話教学成績觀摩会的情况以外,还发表了几篇关于舞台語言問題的文章。我們希望这个問題能够展开討論,請关心舞台語言发展的同志踊跃来稿。本期还有一篇文章值得向讀者推荐的是苏联科学院文学与語言学部普通語言学委员会的委員們所提出的《語言学中一些理論問題》的《导論》。

下期本刊將繼續发表为庆祝国庆十周年而写的关于十年来汉语語法的研究、少数民族語文工作、机器翻譯的研究、新聞語言的发展等方面的論文,另外还有本刊編者所輯的“建国以来語言学界大事紀要”。

为了使本刊能够不断地提高質量,我們誠懇地希望讀者随时提出寶貴的意見。

汉语拼音文字的正字法問題*

周有光

这篇文稿簡單討論汉语拼音的正字法应当包含哪些問題,以及今天为什么要研究它。意見是不成熟的,敬請讀者指正。

正字法就是文字的書写規範。任何一种文字都不能沒有正字法。汉字有正字法,例如“汉字简化方案”就是汉字的一种新正字法。汉语拼音字母如果要发展成为文字,也不能沒有正字法。^①

我們知道,推广汉语拼音教育,利用汉语拼音字母,这是汉字改革的当前任务之一;至于把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文字运用,还不是今天的事情。那么,正字法問題的研究是今天应当做的工作嗎?我們認為:汉语拼音文字的形成虽然是明天的事情,可是正字法問題的研究今天就应当进行。为什么呢?因为:

第一,为了提高現在的汉语語文教育,今天就要用到正字法。例如,“詞”的概念是語文教育的基础;学习語文、語法、普通話,都不能不以“詞”为出发点。正字法当中的分詞連写研究,目的就在具体地解决“詞”的問題。汉字注音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字分写(初級方式),另一种是按詞連写(高級方式)。普通話拼音更有必要按詞連写。今天要想做好汉字注音讀物和普通話拼音讀物的編輯出版工作,就不能不先研究正字法問題。

第二,为了科学技术上应用汉语拼音,今天就要用到正字法。科学技术有好些方面急迫地需要利用汉语拼音,帮助完成汉字所不能胜任的工作。如果不解决某些正字法問題,这些工作就难于获得圓滿的效果。例如,汉语拼音电报的推行,要求研究同音詞分化法問題;世界历史、世界地理中的人名、地名以及各种外来科学术语的譯写,要求研究外来詞拼写法問題,等等。

第三,为了建設明天的汉语拼音文字,今天应当研究正字法問題。汉语拼音方案要加上正字法規則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全部設計。这种設計通过教育和实用成为群众的閱讀和書写习惯就是现实的汉语拼音文字。今天如果不研究正字法,明天也就永远沒有拼音文字。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在提出的时候就說明它的用途之一是“研究和实验汉语拼音文字”。^②

把汉语拼音方案的内容研究一下,可以知道,它本

身已經給正字法准备好了基本条件。方案的内容可以分成五点:(1)字母表:字母的图形、順序、名称及其汉语音值。(2)輔音和元音的拼写法:輔音双字母写法(zh, ch, sh, ng),复元音写法和省略法(iu, ui, un),特殊元音写法([ɿ], [ʅ], er)。(3)加符法:元音字母附加符号(ê, ü)及其省略法(ju, qu, xu, ie, üe)。(4)标調法。(5)隔音法:字母隔音(y, w)和符号隔音。以上除第一点是关于字母表的規定以外,其余四点都是关于正字法的規定。这四点正字法規定給今后进一步研究設計正字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正字法所包含的問題是由語言特点和文字傳統所决定的。不同的拼音文字有不同的正字法問題。一般地說,拼音文字的正字法包含字母拼写法和符号(包括字体)使用法两大部分。

汉语的特点和我們的文字傳統要求汉语拼音文字的正字法研究如下的問題。

1 分詞連写法 分詞連写法研究怎样划定詞的界限,怎样把詞的各个部分連起来写。^③ 汉字既不分詞,又不連写。汉语一般缺乏詞的起訖的鮮明标志。过去語法書上所說的“詞”往往是含糊的(例如“数量詞”不知是一个詞还是两个詞),几乎完全不考虑拼音文字的連写要求。分詞連写法是汉语拼音文字正字法的最重要而最复杂的問題。

2 同音詞分化法 同音詞分化法研究如何减少同音詞,如何使一些同音詞在書写形式上区别开来。

* 本文系作者在本刊連續发表的三篇有关汉语拼音文字正字法問題文章的序論部分,現在一并刊載,以供讀者参考——編者。

① 拼音文字的正字法又称“拼写法”或者“写法”,英文 orthography, 俄文 орфография。

② 參看 1956 年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說明。

③ 分詞連写法又有“詞儿分写法”、“詞儿連写法”、“按詞連写法”等說法。有人說,“詞儿分写”可能誤会成把一个詞分为几段,“詞儿連写法”可能誤会成把几个詞連写在一起。又有人說,似乎要“分詞”問題解决以后才能說“按詞連写”。这里我們用“分詞連写”的說法,一方面照顧“分詞”,另一方面照顧“連写”。

同音詞是任何語言都有的；但是，漢語由於長期以來用漢字造詞，只考慮字形，不考慮詞音，字形分化特別細，詞音混淆特別多。這個文字歷史上的特殊傳統，叫我們不能不在漢語拼音文字的正字法中間對同音詞分化法進行特殊的研究。^①

3 外來詞拼写法 外來詞拼写法研究怎樣用拼音字母音譯轉寫外來詞，包括外國人名、地名和外來的科學術語，等等。用漢字音譯外來詞，譯音不能準確，甚至錯誤到十分離奇的程度。這對科學語言的發展是一個不利因素。用拼音字母音譯轉寫外來詞，可以彌補漢字譯音的缺點，便利科學語言的輸入和發展，促進文化交流。

以上三個問題是漢語拼音文字正字法的主要問題。這三個問題如果研究設計完成，正字法就可以說是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此外，漢語拼音文字正字法還有如下幾個次要問題。

4 文言成分處理法 文言成分處理法研究白話文中間文言成分的分詞連寫法，以及運用符號或者字體表明文言成分的方法。白話文中間的文言成分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1) 文言引語；2) 文言成語(或詞組)；3) 文言單詞。文言引語應當用引號(“ ”)表明，並且按照文言的特點來分詞連寫。文言成語(或詞組)多半是“四言成語”，此外還有文言格式的新造的警句、格言、標語，等等(例如“按勞分配”，“以鋼為綱”)。文言成語也要按照文言的特點分詞連寫，但是有些文言成語(例如“豈有此理”)已經改變性質，“詞化”成為白話詞，這就要求對連寫形式作出特別的規定。雖然文言成語有難於了解的缺點，但它簡短而概括，所以在白話文裡面還是一種沒有失去生命力的表达方式。應當研究把通用的文言成語(和詞組)按照結構加以分類的方法，從而解決分詞連寫技術，以及應否和如何運用符號使它跟白話詞和詞組在書寫形式上區別開來。文言單詞指的是白話文可能吸收同化的文言詞以外的成分，也就是那些在白話中間有說起來更清楚、聽起來更明白的同義詞可以代替的成分。(例如文言單詞“時”可以用白話詞“時候”代替。)這樣的文言單詞是白話文可以不必需要的成分，可是寫文章的人們大都還擺脫不了文言影響，甚至錯誤地認為夾用文言單詞可以使文章增加簡潔之美。事實上這樣的文言單詞只會引起同音混淆，使白話文章變成半文半白，不文不白。在漢語拼音中間如何更真實地書寫口頭的文學語言，如何減少不合語體文的文言單詞，以及如何在書寫上使無法避免的文言單詞標明出來，是正字法應當研究的問題。機械地依照半文半白、不文不白的文章加以注音，

不是有利於拼音文字發展的办法。

5 略語表示法和縮写法 略語表示法研究什麼是略語，略語跟正規的詞或者詞組的區別，如何在書寫形式上給略語規定特殊的標記。所謂略語，指的是多音節詞的單音節化(例如“華”代表“中華”)，以及幾個單音節化略語的結合(例如“文改”代替“文字改革”)。略語又可以稱為音節略語。它不是正規的詞或者詞組，但是應用頻繁成為眾所周知以後，也能“詞化”成詞(例如“土改”)。略語跟文言詞的界限有時也難於區別。研究略語的特點，以及應否和如何用符號使它標明，避免略語跟正規的詞和詞組混淆成“假同音詞”，這是正字法的一種任務。

縮写法研究如何用字母代表詞或詞組。縮寫又可以稱為字母縮寫。縮寫跟略語是不同的東西。漢字只有音節略語，沒有字母縮寫。漢語有縮寫是拼音字母的產物。(例如 ZRG 代表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字母縮寫不會跟詞或者詞組發生混淆。應當做的工作只是把一般用詞和專門用詞的一些常用縮寫法統一規定下來。

6) 標調法 漢語拼音方案規定了標調符號。現在只要補充研究調號的某些用法問題，例如調號的省略法，用字母代替調號的办法(在電報等不運用符號的場合應用)等。

7) 大寫字母用法 大寫字母用法可以看作是一種廣義的標點方法。它的作用是使詞、詞組或者語句“特殊化”。(例如把專有名詞特殊化，別於普通名詞。)漢語拼音文字正字法應當研究如何利用大寫字母，使它充分發揮特殊化的作用，從而減少“同形詞”，提高閱讀的明確性。

8) 標點用法和移行法 漢語拼音文字里有兩種不同性質的標點：1) 同詞的拼写法有關的標點(半連寫短橫和隔音符號等)；2) 同句法有關的標點(普通標點符號)。標點用法一般專指後者，但是也可以廣義地兼指前者。漢語拼音文字的標點用法跟漢字文章中的標點用法沒有多大差別。只是漢字文章往往省略一些應有的標點，漢語拼音文字應當注意補充。漢字用的標點里有“頓號”，這是一般拼音文字的標點所沒有的。應否和如何補充“頓號”，可以研究。移行法(斷詞移行法)是指如何把一個詞分成兩段，分別書寫或者排

^① 格沃茲杰夫在他的《俄語拼写法基礎》(吳紹本等譯，時代出版社，1956)中說：“在書面上能區分那些在口語中不能分清的話是很重要的，因為在書面語言中沒有口語所具有的那些生動的表達手段。”(中譯本第12頁)

印在两行的末尾和开头。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但是也是广义的正字法所不可缺少的内容。

以上八项问题构成汉语拼音文字正字法的内容。

稍稍参考一下外国拼音文字正字法的形成和演变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对汉语拼音文字正字法问题的性质增加认识。在历史上,一种拼音文字正字法的约定俗成,往往是悠长岁月的积累。以俄文做例子:俄文的正字法是“许多时代的产物”,①“是在数百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词的分写法的产生过程也是如此,分写法是逐步被确定的,其范围也是逐渐扩大的,起先是实词,然后才是虚词”。② 俄文创始于十至十一世纪,③ 经过大约五百年的时间,才开始有分词连写制度。“十六世纪以前,俄语手稿里还没有词的分写;写字的人把词一个接着一个地写,中间不留空隙;只有一群词分隔开来,有时多些,有时少些。这样的文字一直延续到俄国印刷术的出现为止”。④ 印刷事业的发展是历史上促使正字法发展定形的决定条件。俄文在十六世纪的语法里出现了“间隔”的专门学问,所谓“间隔”就是“合理地把词与词拆开写”,主要是“实词”的分写。⑤ 在十八世纪,经过语文学大师们对正字法的精心研究,经过对语音学原则和形态学原则的辩论,经过正字法教育在语文教育中逐渐受到重视,正字法的理论和具体规则终于建立起来了。但是到十九世纪,俄文的书写规范还包含着不少分歧。“普希金的手稿里也有很大的不一致”。⑥ 这时候,正字法问题成为人们重视的一种语言学研究对象。⑦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俄文正字法简化运动逐渐发展,最后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实现了正字法的简化改革。⑧ 在今天,俄文中还存在着一些较小的书写分歧,语言学者正在不断加以研究和解决。

从俄文以及其他拼音文字正字法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体会:

(上接 420 页)

电影语言和舞台语言,同样要求有高度的艺术技巧。电影中以视觉形象表达内容的可能性较在舞台上要广泛得多,这是电影的优越条件;但是电影语言较舞台语言更精炼,要求准确的程度也就更严格。再加上电影语言不是由演员的声音直接传到观众的耳朵,而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物理、化学变化,这一机械过程,固然可能给影片的声音带来某些好处,但变调、失真也是常见的现象。这就更需要演员在开始时对语言的精确

1) 正字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比拼音方案要复杂得多。正字法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时间过程可以通过有计划的研究和教育而缩短,但是不能废除时间过程。二十世纪末期的汉语拼音跟十六世纪以前的俄文相比,历史条件已经大不相同。古代的五百年,现代可以缩短为不太长的若干年,如果我们重视正字法的研究和教育。

2) 正字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一方面要约定俗成,另一方面又必然会不断演变。不要希望规定下来就没有变化,同时也不要因为还会变化而否定现在订规则的必要。正字法又很难做到绝对一致,特别是一种新的拼音文字,只能逐步增加书写规范的一致性,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完全一致。不要夸大难于避免的分歧一面,不要因为还存在分歧而否定一致性逐步增加的成就。

3) 正字法的“约定”主要依靠语文工作者的努力,正字法的“俗成”主要依靠正字法教育的普及。研究、设计和教学应用要结合起来,理论和实践要结合起来。在语文研究者、读物编辑者、语文教师和其他语文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相信,汉语拼音文字的正字法问题在不太长久的未来就可能基本上得到解决。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可能就是汉语拼音文字正字法开始建立的时期。

① 格沃兹杰夫:《俄语拼写法基础》(吴绍本等译,时代出版社,1956),11页。

② 同上书,15页。

③ 沙比罗:《俄语书写规则》(高静、杜松寿译,时代出版社,1958),117页。

④ 同上书,185页。

⑤ 同上书,185页。

⑥ 同上书,198页。

⑦ 同上书,202页。

⑧ 同上书,207页及其后。

性作出保证。

我希望电影演员和导演在创作影片的过程中,更多地研究艺术语言的表现问题,更熟练地掌握我国语言的科学规律,使这些知识能够更好地为提高电影技术水平服务。我希望电影演员能够加强语言技巧的本锻炼。我更希望演员能把自己创作艺术语言的心得及锻炼语言技巧的经验写成文章,介绍给伙伴们。

我对艺术语言是门外汉,上面提的问题,一定有多不正确的地方,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指正。

論划分連詞的几个問題

黃盛璋

連詞划界同四方面的問題有糾紛：一是副詞，二是介詞（次動詞），三是動詞，四是插語。關於副詞跟連詞划分的問題將另有專文討論，本文專討論其余三個問題。

一 連詞同介詞的划分

西洋語法中連詞、介詞的分別是：連詞連接句也連詞；介詞就只介紹動詞跟別的詞的關係，它不連接句。因此，連詞跟介詞的交界只可能在聯系詞與詞的關係時發生，連詞聯系詞與詞，其關係是並列的，介詞就不是並列而是有主從。中國的語法學者划分連詞跟介詞，兩派意見：一派完全按照西洋語法連詞、介詞的区分，這可舉黎錦熙先生的《新著國語文法》為代表；另一派是主張連詞、介詞以連句跟連詞為区分原則，《馬氏文通》已微露其意，他把“與、之”都列在介字，“與”字不連字，這是跟後來大多數語法書意見不同的，但他的主張並不徹底，如“怒而飛”，“仁則榮”，介在動詞跟動詞或動詞跟形容詞之間的“而、則”等仍屬連字，大概是因為這些動詞、形容詞都用做謂語，把它看成句子而不看做詞的緣故。到了王力先生的《漢語的詞類》，意見更明顯、堅決，王先生主張將一般所謂副動詞（或介詞）分別成立副動詞與介詞兩類，介詞與連詞的划界就是按照它的功用連“句”或連“詞”來處理，他給介詞與連詞的定義是：

有一種詞是表示實詞與實詞之間的關係的，叫做介詞。

連詞是表示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關係。^①

按照第一派意見完全按照西洋語法的辦法來處理漢語連詞、介詞，困難是很多的。以《新著國語文法》為例，好詞既屬介詞，又屬連詞。一詞兩屬是划分詞類時所不能避免的，我們並不反對；但是，必須有個划分原則，而且一類中兩屬之詞不能過多。黎先生所謂兩屬并無原則可循，同樣一些詞放在介詞里就是介詞，放在連詞里就是連詞，唯一的區別只是名稱的改變。例如“介詞細目”里有原因介詞一類（“因、為”等），這些詞到了“連詞細目”里就一變而為因果連詞。“介詞細目”里黎先生曾舉“當”字為例，說它是“介出時間”，然而“連詞細

目”里也有“當、趁、趕”等，黎先生又說它是“介所在的介詞的引申用法”，實際上“當”字的用法完全沒有變。“除（除…外）、除非”等，黎先生把它列在“介詞細目”里，說它們是“介所除”，然而“連詞細目”里也同樣出現，卻又說它們是“介所除的介詞之引申用法”。其間區別全無標準。

我們原則上主張採取王力先生分副動詞又分介詞的辦法。關於介詞與連詞的划分也同意他的以連“句”或連“詞”為区分的標準，這麼一來，“和（跟、與、同、及等）、之、而、于、則、以”等，連詞與介詞沒有什麼糾紛，可以不論。發生糾紛的全屬所謂次動詞那一類，底下為它們划界訂立三項標準：

1) 連詞連句，兩小句中間可以停頓；凡是中間不能停頓的，一定是次動詞而不是連詞。

2) 連詞所連接的兩小句，前後可以挪動；凡是中間雖可停頓，但不能前後挪動的仍然是次動詞而不是連詞。

3) 連詞不能有施事主語，所以在一句之內它可以在主語前後挪動（即可以在主語前頭，也可以在主語後頭）。次動詞就恰恰相反，要是一句之內不能在主語前後挪動，那它就是次動詞而不是連詞。

根據這三項標準，我們可以具體來處理上舉黎先生既列為介詞又列為連詞的那三小類，連詞同次動詞的糾紛主要也就是這三小類。

（一）“當、趁、趕”等是次動詞而不是連詞。“當”等有两种用法：一是“當面說清楚”，“趁熱打鐵”，“趕明兒送來”之類，中間不能有停頓，這一類只能求屬次動詞。二是中間可以有停頓，如“當他沒有來，大伙兒就散開了”；“趁他不在意，就給他一拳”。除了翻譯句，歐化程度特別深的以外，按照漢語習慣，這類的句子“當”等只能用在前面一句，不能挪到後面，所以應該屬次動詞。再就意義上說，次動詞是動詞的一種，用這些詞的時候動作意義并未消失，又可以有施事主語，例如：“我每當更深入靜，总要出外巡邏。”從形式與意思兩方面考慮，都應屬次動詞而不應該屬連詞。

① 見《漢語的詞類問題》，中華書局，1955年7月，12頁。

(二)“由于、因、为、因为”这几个詞情形就不一样,要分別处理。“由于”是連詞,用“由于”必須有两个子句,單独一句站不住。“因”和“为”是次動詞,單独一句能站得住,中間不能有停頓。中間有停頓分为两句的那种“因”,現在口語只說“因为”,單用一个“因”字的大多是書面語。“由于”和“因”“为”的划分都沒有問題。“因为”的情形比較复杂,它的隶属問題还須进一步研究。我們可以从几方面来考察“因为”的用例:1)凡用“因为”的單独一句一般都站不住;要是用在上一句,其后必有所承,要是用在下一句,其前必有所启。2)用“因为”的句子有时候前后可以挪动,如“他今天不能来,因为要开会”;也可以倒为“因为要开会,他今天不能来”。从这两点看“因为”确是接近連詞;可是从另外的特点看,性質就同次動詞接近,而同連詞性質不一样:第一,無論用在上一句或下一句,“因为”后头可以跟体詞或体詞結構;不管形式上或者意思上它都跟動詞、次動詞后帶賓語沒有什麼差別,如“你怎么因为这点小事,連飯都不想吃了”;“他成天想心思,还不是因为这个”。在这里,“因为”只能是動詞或次動詞,不能是連詞。第二,在一句之中“因为”的主語可以前后挪动,但是一挪动两者意思就不一样,如“他因为送客忘了交代,我們會也沒有开成”。第一句主語是“他”,要是改为“因为他送客忘了交代,我們會也沒有开成”,主語就变成“我們”,意思当然也就变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因为”可以有施事主語,它也只能属于次動詞,同連詞性質有所不同。

(三)“除、除了、除掉、除…(以、之)外、除非”这几个詞也應該分別处理:1)严格說来,“除、除了、除掉”都是動詞,“除…(以、之)外”是句子結構,其中“除”也是動詞,証据是“除了”“除掉”中有“了”和“掉”,“除”和“除…(以、之)外”的“除”字后头也可以跟上“了”或“掉”,意思不变,有时还可以跟上“去”,意思也一样。这說明它們确是動詞,用在句子里头頂多是弱化而已。将来動詞里头可以設弱化動詞一类,“除”等应隶属其中。黎先生把句子結構的“除…(以、之)外”也列入連詞,实在是講不通的。2)“除非”可以屬連詞,因为前后句可以挪动,它也可以在主語前后挪动,意思并不改变。这两点都符合我們所訂的連詞条件,而同次動詞性質不同。

二 連詞同動詞的划分

動詞可以用做謂語中主要成分,可以有施事主語;連詞是連接句子的,不可能做謂語中主要成分,更不可能有施事主語。就一般論,動詞同連詞的界限應該是

很清楚的,可是就意义論,有些詞好象是動詞,而它們时可以有施事主語,單独一句又站不住。象下面这些詞,有些語法書上就把它們列入連詞。

(一)不論,無論;不管,別管;不問,別問;不拘,不拘:

不論抗戰路程上有多少困难,中国人民总是要胜利的。
(毛澤东)

便不管四叔的豔眉,將她留下了。(魯迅)

不問貴賤,一定要买。

你不拘是誰的,拿一条就是。

(二)別看,別說,慢說:

別看他一字不識,現在也是个官儿。(老舍)

連我也不放心,別說他呀!(紅樓夢)

慢說我没有这样的家当,便有,我也不肯这样的作。
(儿女英雄傳)

(三)即使,縱使,尽管:

白先生,即使方大哥作了公会会长,即使他独断独行

你为什么不动告他,不矯正他呢?(老舍)

你有坏主意,尽管使去,我等着你的。(老舍)

(四)以致(致使):

自私自利,目光短小,只顧目前的个人利益,又不肯
別人合作,以致迷失方向,以敌为友。

(五)至于,甚至,甚至于,甚而至于:

小二黑发瘡疾是真的,不是装病;至于跟別人恋爱,
是犯法的事。(趙樹理)

好嗎,我在袁世凱的时候,曹錕的时候,甚至于日本
子在这儿的时候,都沒有見過这样邪門的事。(老舍)
要举几个作者来,那就是高尔基、卢那卡爾斯基、裴
法捷耶夫、綏拉斐維支、辛克萊,甚而至于梅迪林
梭罗古勃、斯而林培克。(魯迅)

(六)不料,不想(那想),想不到(那想到、誰想到)

去年种了一株桃花,不料今年竟也开起来。
鞋湿透了,晚上脱下擱在火边烘,想不到第二天就
成灰了。

(七)可見(可知),可想而知:

这是一个平时不大看見的特別劳苦的肩販,存着的
料多得很,可見他并无生意。(魯迅)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見是一个詭
(魯迅)

(八)宁願,宁可:

宁願餓飯,也不能伸手向他要錢。

我不繳租,宁可跑去吃官司。

(九)說到(提到),說起(提起),再說:

說到操作,那你應該拜他为师,一点也不能含糊。
这是人家自己的事,我們没法干涉,再說人家这么
也没有什么不是。

連詞和動詞各有自己的特点,利用它們的特点,不妨

为下列四項，作为它們划分的标准：

1) 動詞能作謂語或謂語中主要成分，連詞不能。要是能用做謂語或謂語中主要成分，那就是動詞不是連詞。

2) 動詞可以有施事主語，連詞不能有施事主語；要是能有施事主語，那就是動詞不是連詞。

3) 連詞單獨一句站不住，要是單獨一句站得住，那就是動詞不是連詞。

4) 在一句之中連詞可以在主語前后挪動，動詞一都是在主語的后头(如有主語的話)，一移于主語之前，意思就有所不同，主語也有所改變；要是能够在主語前后挪動意思并不改變的，那就是連詞，否則就是動詞。

根据这四項标准，底下就对上列那些詞具体地归分析：

(一)“即使、縱使、至于、甚至、甚至于”等都是連詞。“至于”前头不能有主語(“不至于”或“至于”之否定，当別論)。“即使、縱使、甚至”等可以放在主語前，也可以放在主語后头，意思并不改變。

(二)“不料、不想、想不到”等是動詞，理由是：1) 它們前头都可以有施事主語，可以有“誰料、誰想、誰想”等的說法；2) 倘有主語，它們只能位于主語之后，如，“我不料这件事发生这么快”。“不料”不能倒在主語前头；3) 有时單獨一句就站得住，如“不料这一激激翻了”。

(三)“不管、不問、不拘”等都可以用做謂語中主要成分，單獨一句就站得住，當它們这么用，当然就是純動詞。“不管”等若用于上下两句互有連系不能独立在时，意思上同用做謂語中主要成分时差別不大，動之意仍然存在，只是弱化而已，所以應該認為是弱化詞。“不論”“別論”同“不管”等意思相同，它們都屬動詞不屬連詞，因为“不管”等都可以有施事主語，句中如果有主語，“不管”等只能在主語后，一移到主前，意思就不一样，主語也改变了。

(四)“可見、可知(可想而知)”等是承上之詞，“可見、可知”等不能有主語，跟一般動詞不同，但跟連詞也一样。有两点理由我們認為仍当屬動詞不屬連詞：

“可見、可知”位置是一定的，“可見”“可知”等可以必有主語，是因对普遍而說，这个普遍性主語一般不必明确地指出，所以就不用，跟連詞根本不能用無情况不同；2)“可見、可知”等有时也可以用做謂語中主要成分，意思同用做判斷之詞并无多大差异，这說明用做判斷之詞实际是一种弱化動詞。它可以不屬虛詞，是因它動性仍然很强，它下面所跟的成分同

一般動詞帶賓語差异不大。同“可見、可知”情形相仿佛的还有“別說、別看、慢說”，“別說、別看”可以有主語，“慢說”主語較少見，有主語时它們位置都一定不能挪到主語前头，而且動性也强，应同“可見”等同样处理。

(五)“說到(提到)、說起(提起)、再說”是表更端之詞，都不能有主語；它們虽由動詞“說”或“提”字組成，但組成后早变成一个虛詞，它們所以不能有主語，并不是因主語是普遍性，如“可見、可知”等那样情形，而是因它們是一个虛詞，用不到主語。这一組應該認為是連詞。

(六)“宁願、宁可”等是動詞，因為它們可以有施事主語，如“我宁願不去，也不能去求他”；“我宁可牺牲一顿早餐，也不能迟到”。“宁願、宁可”有时候單獨一句就站得住，如“你怎么决定呢？——我宁願迟一点走”。

有一点需要說明，漢語動詞是多种多样的，上面所举那些不屬連詞的動詞，情况并不是完全相同，有些詞就是一般動詞，如“不料、不想”等，有些應該屬助動詞，如“宁願、宁可”等。

三 連詞同插語的划分

有些語法書把插語也收入連詞。插語有两种，一种是有動詞的，如“总之(总而言之)、反之、反过來說、換句話說、这就是說、老实說、可以說、比如、比方、例如、除此以外”；一种是没有動詞的，如“一方面…(另)一方面、一則…再(二)則…、一来…二来”。

《馬氏文通》把動詞之有連接作用的，都归入連詞，又叫做無屬動詞。馬建忠說：“有連字假用動字而无起詞者，亦可謂無屬動字。”又說“总之、至于、推而远之、推而大之、要其归、推此志”都是連字，“假令、假設、浸假諸動字，假以为推宕連字者，亦此志也”(見《馬氏文通校注》卷四，242頁。)他把本文第二节中的“假設、至于”那一类以及本节的第一类“总之”等都归入連詞。至于本节一、二两种插語，《新著國語文法》都归入連詞。

第一种“总之、反之、換句話說”等都有主要動詞构成小句插入句子里，严格說來是句子的結構，不是一个詞；当然不能归詞类中处理，无从說是連詞不連詞。

第二种同第一种情形不一样：1) 里面沒有動詞，不是句子結構；2) 大都要成套应用，前后互为呼应，不能單獨用一个，有連接作用就在这里。第二种是否当做一个詞来处理，也有待討論，即使当做一个詞，也不一定非拿到連詞里头来处理不可；凡互为呼应之詞都有連詞，但不一定都是連詞，副詞中就有很多是互为呼

应之詞，如“一…就…”，“越…越…”，“一面…一面…”，我們不應該把有連接作用的都拿到連詞中處理。

四 結語

(一)現代漢語中的連詞具備幾個特點：1)單獨一句站不住；2)可以在主語前後移動，意思不變；3)有時候前後兩句可以互相挪動。根據這幾個特點，可以把連詞跟其他有關詞類劃分開來。

(二)連詞是連句子的，我們主張現代漢語中連詞跟介詞的分工，一是連“句”，一是連“詞”。

(三)連詞同某些動詞有糾紛，劃分的標準是：1)連詞不能有施事主語，不能用做謂語中主要成分；2)可以在主語前後移動，不合這些條件，就不是連詞。

(四)有由動詞組成的插語，不應當拿到連詞中處理，沒有動詞但必須前後互為呼应的插語，也不必拿到連詞中處理。

关于“划分連詞的幾個問題”的討論

——答黃盛璋同志

黎錦熙

一 連詞跟介詞的划分 查《新著國語文法》，介連兩屬的詞是有“原則”有“標準”可言的，就是：

介詞是表示實詞(動詞；形述——即形容詞作述說詞用的)與‘實詞’(名、代，名物化的語句)間的關係；

連詞是表示句子(等立分句，對偏句的正句)與句子(等立分句，對正句的偏句)間的關係。

這裡就以原因介詞(今本改作“因緣”介詞)和原因連詞為例。

“介詞細目”中的例是(206頁)：

他為什麼‘(代)不來’？(“為什麼”這個介詞結構又用作合成的副詞。)

他一定是因‘病’(名)不能來。

因‘此’(代)我也就要走了。(“因此”這個介詞結構又用作合成的連詞。)

有信心的人，不因為‘他人的反對’(主謂中間插“的”字的子句，名詞化)隨便改變宗旨。

以上是介原因；下邊是介目的的例：

科學為‘人民’(名)服務。

他們為了自己和人類的‘幸福’(名)付出了重大的代價。

“連詞細目”中的例是(288頁)：

因‘他廟里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個渾名。(偏句在前的)

我今天因為‘天氣不好’，沒有出門。(偏句在中間的)

他差不多要成個專家了，因為‘他是肯鑽研的’。(偏句在後的)

下邊是“主(正)從(偏)各有連詞相應”的例(290頁)：

只因‘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從背後透過來。

所以把你進個案首，‘也是為此’。(原注：此種句法，意思是在解釋理由，故主句定須在前；“所以”用在

起下，不在承上。今按：這個看法是不對的，在前述並不是個主句，是個“據果以探因”的子句，在《漢語語法教材》第二編給糾正了。附帶說明于此。)

以上“因”“為”兩詞的介詞兩屬的例，現就原書舉出，說明《新著國語文法》並不是“任意給它們命名”的。此外表時地的“當、趁、趕”等(198、200頁，284頁)，表除開的“除、除…外、除非”等(209頁，295頁)，都請以此審查，不舉例多占篇幅了。

可是這個介連劃分的標準，僅僅是就黃盛璋同志所根據的“王力先生《漢語的詞類》的意見”兩條(如上所述)，來說明《新著國語文法》在這一點原則上是一致的；若要把這兩條作為“介詞與連詞的定義”，就還有所不夠。簡單說，介詞“表示實詞與實詞間的關係”是主從(偏正結構)的關係，而連詞“表示句子與句子的關係”則兼着等立(聯合結構)的關係。介詞介來的是名、代，介給的是動、形(形述)，兩造都是詞，那麼就只能在單式句中起作用，所以我們最後改擬的定義是：“介詞是在單式句(內部)的主從結構中起介紹作用的詞”；連詞則不然，不能限制它所連的都是句，因為一般公認的定義是“連詞是連接詞和詞、語句和語句以表示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的”。但這個定義很寬泛，介詞也適用，憑這定義，可以說，介詞就是從連詞划分出獨立為類的；若不獨立，就是一家。因此，近年有“介合併論”，而《馬氏文通》要扣死哪些詞屬“介字”就不屬“連字”(如“與”字等)，終於弄得“並不徹底”，這正由于二者定義的不鮮明。如果要鮮明地下好介連兩類定義，我的意見是：先要認清漢語虛詞本來的實際的語法作用；主觀地限制某些虛詞只連結詞和詞，某些虛詞只連結句和句是不現實的。“連詞”，就讓它寬泛地

說“差一點”^①

朱德熙

“差一點打破了”和“差一點沒打破”意思一樣，都是說沒打破；“差一點及格了”和“差一點沒及格”意思不一樣，前者是說沒及格，後者是說及格了。概括起來說，“差一點打破了”和“差一點沒打破”形式上一肯定（沒有否定詞），一否定（有否定詞），但意思都是否定的，都是說沒打破；“差一點及格了”和“差一點沒及格”形式上也是一肯定，一否定，但是意思不一樣：肯定的形式表示否定的意思，否定的形式表示肯定的意思。我們把“差一點打破了”“差一點沒打破”叫作A類，把“差一點及格了”“差一點沒及格”叫作B類。下面就這兩類再舉幾個例子：

- A類：差一點打破了（沒打破） = 差一點沒打破（沒打破）
差一點輸了（沒輸） = 差一點沒輸（沒輸）
差一點死了（沒死） = 差一點沒死了（沒死）
差一點摔了一交（沒摔） = 差一點沒摔一交（沒摔）
差一點離婚（沒離） = 差一點沒離婚（沒離）
- B類：差一點買着了（沒買着） ≠ 差一點沒買着（買着了）
差一點及格了（沒及格） ≠ 差一點沒及格（及格了）
差一點趕上了（沒趕上） ≠ 差一點沒趕上（趕上了）
差一點中獎了（沒中） ≠ 差一點沒中（中了）
差一點修好了（沒修好） ≠ 差一點沒修好（修好了）

AB兩類形式上完全一樣，但是所說的事情的性質不同。A類“打破、輸、死、摔交、離婚”，就一般情形說，都是說話的人不希望實現的事情；B類“買着、及格、趕上、中獎、修好”，就一般情形說，則是說話的人希望實現的事情。可見“差一點怎麼樣”“差一點沒怎麼樣”兩個格式到底是什麼意思，要看所說的事情是說話的人所企望的，還是他不企望的。不過肯定格式和否定格式情形又不一樣。肯定格式無論是A類還

是B類，意思都是否定的；否定格式是什麼意思，光從形式上是看不出來的。

企望不企望不是固定不變的，一件事情往往因為具體的條件和環境不同，有時希望它實現，有時不希望它實現。譬如久旱不雨，我們就盼望下雨；可是雨下得太多了，又希望它不要再下。所以“差一點下了”和“差一點沒下”有時是A類，有時是B類。

此外，企望不企望也往往因人而異。甲乙兩方賽足球，球射入甲方球門這件事是乙方所企望實現的，但站在甲方的立場上，卻不希望它實現。因此甲方說“差一點射進去了”“差一點沒射進去”的時候，是A類，兩句話意思一樣，都是說沒有射進去；同樣兩句說由乙方來說，則是B類，這時兩句話意思不一樣，“差一點射進去了”是說沒有射進去，“差一點沒射進去”倒是說射進去了。下面這句話的說法不對：

球傳到中鋒，抬腳把球向球門踢去，真可惜，球差一點沒有射進門去。

既然說“真可惜”，可見作者站在對方的立場上，希望球射進去，可是結果並沒射進去，那麼應該採用B類說法：“真可惜，球差一點就射進去了”。

在B類語法里，“差一點”之後可以加上“就”字，例如“差一點就買着了”“差一點就沒買着”。其中肯定格式加“就”字的趨勢尤其顯著。A類肯定格式也能加“就”字，例如“差一點就打破了”“差一點就輸了”，但是否定格式一般不加“就”字，例如不說“差一點就沒打破”“差一點就沒輸”。

① “差一點”口語里說“差一點兒”或“差點兒”，本文一律寫作“差一點”。

表着凡表示一切詞句之間語法關係的虛詞（所謂“關係詞”）；而割取其“詞與詞的偏正關係”這一部分獨立為“介詞”，以便接納句法上次要動詞（即“散動三”）的虛化。這樣介連分家，把兩類的定義下的鮮明而合實際，除兩類各有幾個經常專用的詞之外，其餘的可以客觀地反映漢語虛詞很經濟的活用規律，介連兩屬，“分家而不分爨”。

二 連詞跟動詞等的划分 我也同意黃盛璋同志那樣地划分一下。划分清楚之後，我們在“連詞”部門

中還是要容納它們的，不過加以聲明，這些都不是正規的連詞，可也表現了連詞的作用。本來連詞（和介詞）只是在語言中表示語法關係的虛詞，專用的、固定的實在只有少數的幾個，在語言實際上就依靠各方面——就算“一是副詞、二是介詞、三是動詞、四是插語”這四方面吧——來供給它豐富而活潑的工具，這一直是尋常的事情，一般在連詞部門中早就管它們叫做“關聯詞語”。關聯詞語儘管大量地分配在連詞的各種用法里，但一概混稱為“連詞”也是不妥當的。

漢語詞匯史隨筆 (四)

鄭 奠

漢語里，有不少的單音節詞，但是複音節詞更多。複音節詞中，又以雙音節詞居多，三音節以上的詞比較少。這些雙音節詞，除原始是雙音者外，其餘都是怎麼構成的呢？一般以為是由於兩個單音節詞的結合而成，這種想法是很自然的，而且也很正確。不過，如以為詞匯的發生與發展只是唯一的或單純的依照着“一生二，二生三”這個公式逐步進行，則未必盡然。我們單就中國近代（大約1840年之後）以來，對於外來新事物、新概念的譯義造詞的種種情況，就可以看到，在這些新詞的構成過程（從開始到鞏固階段）中間，經常出現幾種不同的詞匯變化現象。就是：第一，新詞的初期原來是一個三音節的，使用了一段時期之後，簡省成為雙音節詞而固定下來。第二，這個新詞同時有了一個雙音節的，又有一個三音節的（它們發生的確實先後，一時還不能十分弄清楚），使用一段時期之後，有的三音的作為定型之詞，這對雙音的來說，是加字了。此外還有兩式并用的，情況十分錯綜複雜，這裡不能深究。

我們現在想着重地說明前面所指的第一種情況，就是詞匯演變的一種簡化現象。從三音節簡成雙音，不出三個方式：1) 省去詞的開始音節（第一字）；2) 省去詞的中間音節（第二字）；3) 省去詞的末了音節（第三字）。本篇主要說明一、二兩類，下面分別舉例為証。

天空氣——空氣

“空氣”這個名詞，在漢語中發生得很晚（以前只稱“氣”或“大氣”），現在簡單地說一說它的由來。從前北京同文館時期，譯有《萬國公法》一書（1862），其卷二有云：“誠以大海本萬國公用，與天氣、日光理同，無人可私據之。”這裡指稱的“天氣”就是現在所說的“空氣”。上海江南製造局譯著時期（1870—1907）華蘅芳筆述的《金石識別》（1872）卷三有云：“天空氣即空中之氣，人物所賴以呼吸者也。”卷二有云：“養氣與輕氣合則為水，與硝氣合則為天空氣。”都作“天空氣”。在《金石中西名目表》里（即英漢對照表）譯 atmosphere 也作“天空氣”（其實更早期的《海國圖志》〔1842—1852〕里也已用了“天空氣”）。在《化學材料中西名目表》中把 air 和 atmosphere 都譯作“空氣”。在《格致啟蒙》中也譯

作“空氣”，其卷一有云：“今先舉人所共曉者四物：曰火，曰空氣，曰水，曰土。”（其實《金石識別》卷九中也用了“空氣”這名稱。）至於《汽機中西名目表》（1889）譯 air 作“風”或“氣”，沿用舊詞，那是偶然的現象。以上各種名稱，除了“風”“氣”“天氣”以外，“天空氣”和“空氣”這兩個詞的先後關係，說是省去了“天空氣”的第一字而成為“空氣”，應該說是合理的。

火輪船——輪船

“輪船”是大家都熟習的，“火輪船”（也稱汽輪船或汽船）這名稱也不斷地有人使用。當這個新事物 steamer 輸入的時候，大概先就稱作“火輪船”，後來從“火輪船”這個詞省去第一字，成為“輪船”，省去第二字成為“火船”，省去第三字，成為“火輪”。這三種省略的方式，在不同的年代里，不同的地域里，也還同時使用。這裡想依據近代文獻的一些記錄，作為印証。

《海錄》（楊炳南，1820）作“火船”。

《海國圖志》（魏源，1842—1852）作“火船”。

《瀛寰志略》（徐繼畲，1848）作“火輪船”。

《航海述奇》（張德明，1867）作“火船”，亦作“火輪”，亦作“輪船”。

《海客日譚》（王芝，1872）作“火船”亦作“輪船”。

《東行初錄》（馬建忠，1882）作“火輪”。

但僅僅根據上列幾種書的記載，材料還不夠充分，不容易就下結論，這裡暫且存疑。

遠鏡——望遠鏡

“遠鏡——望遠鏡”這個例子，同上面所舉的兩個例子正相反，上兩例是省去字，這一例是增加字。現日常所稱的“望遠鏡”原來叫做“遠鏡”，在明代譯著就有了《遠鏡說》（1626），以後象《海客日譚》、馬建忠《東行初錄》還都作“遠鏡”。望遠鏡的名稱起得比較晚，它的異名有作“遠視鏡”“視遠鏡”或“窺遠神鏡”的。又不大，這裡就不詳細說了。

火輪車——火車

“火輪車——火車”與前面所舉的例子（省去“火

“船”的第一字为“輪船”)一样,也有省去“火輪車”的第一字而称为“輪車”的(見《航海述奇》),但是大家所习用的却是“火車”(“火輪車”見洪仁玕《資政新編》[1859],曾紀澤《出使日記》[1878]作“火車”)所省去的,是詞的第二个音节(字)。这个方式在簡化現象中,比較多見,下面談到的“鐵路”这个詞的定型,就是同样的例子。

鉄車路——鐵路

“鐵路”(railway) 这个詞,从前在《海国图志》(1842—52)作“鉄車路”,《瀛寰志略》(1848)作“鉄鑪鑪”,《汽机中西名目表》(1889)作“鉄軌路”,《海客日譚》(1872)作“鉄路”。

电气綫——电綫

现在似乎沒有人会称“电气綫”的,但从前用得很多,而且,凡是同“电气”联称的詞,十之八九这“气”字都可以省去。例如:

电气綫(見《格致启蒙》,1870)——电綫(薛福成《出使日記》續)

电气报(王之春《談瀛录》,1879)——电报。

电气灯(《文明小史》,1903)——电灯(薛福成《出使日記》,1890)

电气車(見薛福成《出使日記》續)——电車(見《新民汇编》)1903)

电气机(《航海述奇》,1867)——电机(《民报》,1907)

电气信(《航海述奇》1867)——电信(《申报》,1874)

电气鈴(《文明小史》,1903)——电鈴(《新民汇编》1903)

此外还有省去第二个字而成为新詞的例子:

温和带(格致启蒙)——温带。

西洋医(林则徐譯:华事夷言)——西医。

冰結点(汽机中西名目表)——冰点。

沸騰点(汽机中西名目表)——沸点。

脑气筋(譚嗣同:仁学)——脑筋。

反行动(汽机中西名目表)——反动。

以此类推,无煩多举了。

古代有一种东西叫“璧流离”(見《說文解字》“珣”下云石之有光者)“古人省言之,曰‘璧珣’,(亦省作‘流离’),“今人省言之曰流离,改其字为‘瑠璃’”(本說文段注)。据此,則三音节詞的省去末了的音节,史有前例。但在近代文籍中不很习見,这是值得研究的。

翻譯官——翻譯

宋代《諸蕃志》(赵汝适[音guā], 1207—1225)称做翻譯工作的人叫“譯者”,清代的《海客日譚》叫作“通譯”,《海南杂著》叫作“通言”,《航海述奇》里說是“翻譯官”,直到現在,一般通行的都是这个名动兼用的“翻譯”,但不能說它是翻譯官的簡称。

(上接 442 頁)

不能認為,在 1950 年的討論后的最初几年里沒有試过这种实事求是的研究。这种嘗試毫無疑問存在,并且在理論的发展上作出了某些貢獻,但是,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是极端片面地发展着的。

这首先造成了下面这种結果:在接受語言的社会去,語言的发展同社会发展有关(在一定範圍内有賴于社会发展)、語言的交际功能的主导作用等絕對正确的观点时,沒有明确指出:要精确地闡明(在理論分析方面)語言不同于其他社会現象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它的符号性性質是什么,① 要弄清它和其他符号系統的关系,要闡明語言形式的特殊性,要弄清形式和意义的互关系,等等。闡述詞和概念、句子和判断、語法形式和邏輯形式的那些著作写得很籠統,有时不正确地簡單化地搬用了哲学中关于这些問題的提法。在这著作里时常表现出害怕提語言的符号性这个問題,將語言的符号性性質,象对待一种同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符号理論”有时只了解为索緒耳的那形式的符号理論,因而,它常被完全否定。結果,阻

碍了对語言結構的性質这一基本問題进行理論研究,从而,也阻碍了对語言表达形式的特殊性这一問題进行理論研究。由于所有这些問題在現代国外語言学中一再受到热烈討論,所以一开始談到的那种情况也就是很自然的了:得到某些老輩語言学家支持的年輕的苏联語言学家,沒有深入地思索从国外輸入进来的一些語言学論点是否同馬克思主义理論相容,就决定把这些論点应用在苏联語言学中,并使它們发展。

所有这一切提出了这样一种要求,必須給今后語言学理論問題的研究規定一个更明确的方向:即必須使苏联語言学家的工作轉向深刻批判修正主义和那些盛行在西方的唯心主义流派,并根据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在我国建設共产主义的任务,在高度的理論水平上研究那些應該描繪出苏联語言学的面目的問題。

(白水譯自《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語言部分〕》1959年第3期)

① 关于这个問題參看本報告書的第四章。

也談“不當家花拉的”

吳曉鈴

讀了俞平伯先生在1959年6月25日《北京晚報》的“五色土”上寫的《不當家花拉的》(附本刊本期封四)有一些感想,也來談一談這個詞兒,借以請教。

首先是,除了俞先生所引的《紅樓夢》第二十八回和第八十回上兩見這個詞兒之外,在第二十五回上也有這個詞兒,這可能是它的第一次出現吧:

馬道婆又道:“還有一件;若是為父母尊親長上的,多舍些不妨;若是象老祖宗如今為寶玉舍多了,倒不好。還怕哥兒禁不起,倒折了福。也不當家花花的,要舍,大則七斤,小則五斤,也就是了。”

正如俞先生所提到的版本上的問題,在較早的本子上,這個詞兒都作“不當家花花的”,沒有作“不當家花拉的”,因此,我認為應該首先肯定在曹雪芹生活的時代里,這個詞兒的形式是“不當家花花的”,大約到了文康寫《兒女英雄傳》的時候就在口語里變成了“不當家花拉的”了。聽說在五六十年前的北京口語里這個詞兒還存在,讀成“不當家忽拉的”。就這個詞尾由“花花的”變成“花拉的”再變成“忽拉的”的現象,在語音方面都很容易解釋,前一個是為了區別同音相鄰而變化,後一個是省略了元音A,讀着更加簡易就是了。我個人覺得這個詞尾有加重程度的意義,猶如現代口語里就還把“非常油膩”說成“油滓花花的”,和把“很髒”說成“髒不唧唧的”相似。

很清楚,“不當家”的本字大約還是劉侗在《帝京景物略》上所寫的“不當价”比較合乎頭寸。它的本來意

義很可能就是“值不得”的意思,以上舉《紅樓夢》第十五回的例子來說,“值不得”就很合式。但是,漢語義的彈性很大,這正是漢語豐富而具有強烈表現能力的優點,所以不能拿一種解釋去往時間、地點和條件不同的做為交流思想的語言上硬套,例如《紅樓夢》第十八回有一句:“阿彌陀佛,沒當家花花的,就是墳里這個,人家死了几百年,這會子翻尸盜骨的,作了藥不靈。”我覺得“沒當家花花的”雖然有“值不得”的意思,可是却更和現代北京話里的“得了吧”和“算了吧”相近。第八十回的“不當家花花的,膏藥从不拿進星來的”,就不能夠用“值不得”來解釋了,“算了吧”有幾分譜,如果說它相當於現代北京話里的“沒聽說過”或“沒那麼回事”就更恰當。那麼,這個詞兒的意義很可能越變越廣泛,正如俞平老所舉出的紀昀所說的“罪過”,然而,我覺得“罪過”還是含義過於狹窄了,不如就說是一個嘆詞。它有時可能絲毫沒有具體的含義,只表示“好家伙”、“我的天”之類的感慨而已。

一個詞兒的問題終究不大,仔細研究應該是語言學家的行當。我一方面從這個詞兒覺得曹雪芹在使語言上真有两手兒,真是“不當家花花的”,另一方面覺得對於《紅樓夢》的語言進行全面而精到的研究是樁很有意義,然而也是異常艱難的工作。多麼希望有一天能夠讀到一部象《普希金辭典》那樣的《曹雪芹辭典》呀!

關於《經詞衍釋》的最初刊本

余明象

《中國語文》1957年1月号47頁,鄭梅同志評介《經詞衍釋》說:“該書最初刊行的年代也待查考。上海古書流通處曾經刊印,但也沒注明年月。這書刊本不多見,現中華書局排版重印,是很有益的。”

我見到此書木刻本兩冊,書前有“光緒丁丑春日鐫得一齋吳氏藏板”字樣;第二冊末頁有“廣東省西湖街富文齋承刊印”字樣。光緒丁丑是1877年,按何廷謙

同治十二年立夏前三日寫的序文說:“今春科試肇慶適生來粵,客其鄉人劉伯明府幕中,出所著《經傳釋詞廣義》以質于余。”從這段話看來,《經傳釋詞廣義》《經詞衍釋》,“今春”是1873年(同治十二年)。是此書當成於此年春天,此木刻本為1877年春日鐫,當是書最初的刻本了。“得一齋吳氏藏板”的“得一齋”,定是著者吳昌瑩的齋名。

語言學中的一些理論問題

導論^①

蘇聯語言學經歷了這樣一條發展道路：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論和根據生活本身向科學提出的文化建設的實際任務，不斷進行創造性的探索並力求解決語言學理論中的根本問題。

在這條道路上有過挫折，在解決那些同了解作為社會現象的語言的特點、理解和制定語言研究方法有關的重要問題上，也有過嚴重的方法學上的錯誤。然而，從整個來說，必須承認：儘管在我們語言學理論的發展上有過錯誤，有時還是相當嚴重的；但是，畢竟在語言學和它的個別部門的理論原則的研究上有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而這就是蘇聯科學家的創造性的探索結果。

把語言的實質理解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說的社會現象，這是蘇聯語言學家提出語言學理論中一些根本問題的基础。根據我們科學中的這一根本原則，通過對大量語言材料的研究，象不同社會發展時期的全民語在其與方言對比關係中的發展規律這樣重要的問題才得到了正確的解決，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語發展觀才得以建立。屬於這一方面的還有這樣一些理論問題的研究，如不同歷史條件下的方言的相互影響問題，社會方言問題，不同語言的相互影響問題，等等。以上這些問題從這個世紀的二十年代末就已經為蘇聯語言學家所注意。

蘇聯各社會主義民族共和國文化建設的多方面實踐，完全証實了這個在理論上極其重要的課題的現實意義。

理論方面的無可爭辯的成就還由這樣一些蘇聯語言學家獲得，他們在研究音位學問題時是繼承和發揚了俄國革命前的科學傳統。蘇聯這一領域內的大多數著作不同於國外許多音位學流派的，其特點是與極端豐富和多樣的語言材料有不可分的聯繫——這種聯繫，又是現實生活中的需要提示的，例如給過去無文的語言創制文字的任务，改進拼寫規則的任务，或對語言和方言進行科學描寫的任务都提示了這種聯繫。

蘇聯語言學家根據各種各樣語言材料在解決語法問題方面所進行的探索，也應該獲得同樣好評。由於

研究和對比對象是體系很不相同的一些語言，因而，蘇聯語言學全部發展時期內所進行的大量的語法描寫工作為提出語法類型學問題和解決語法理論中的關鍵問題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研究這類問題是我們的語言科學的特點。這裡觀察到的意見分歧和不停的爭論，例如在語法範疇問題、各個語法部門的相互關係問題、語法和詞匯的相互關係、詞類理論等方面所觀察到的，絕不是弱點，相反地說明在這些問題（它們的現實性無論在什麼條件下也不容置疑）的研究中有一種永不遏止的創造性的高漲。

蘇聯語言學家在詞的問題的研究上也獲得了很多有意思的結果，無論是在研究詞的結構特征方面，或是在確定詞與概念的關係方面都是這樣。

然而，儘管如此，蘇聯普通語言學的現狀仍然還帶有一些足以說明它近年來的落後現象的特點。

* * *

在分析蘇聯語言學理論問題研究的現狀和遠景時，不能不注意到，在最近十五至二十年期間世界語言學經歷着一個嚴重的危機。十九世紀各個學派和流派以共同的創造力量所擬定的那些歷史語言學的方法原則遭到了深刻的重新審查，並且在目前被西歐和美國頗多的語言學家（人民民主國家和蘇聯也有一部分人）

① 以討論方式發表的這篇東西是蘇聯科學院文學與語言學部普通語言學委員會的委員們在維諾格拉多夫院士領導下所編寫的提出問題的報告書（проблемная записка）的第一章。整個報告書由下列章節組成：1）導論，2）語言的功能和發展，3）語言和思維，4）語言系統和它的結構特點，5）同時性的語言的描寫分析原則和方法，6）語言和方言的歷史發展規律，7）語言的歷史比較和類型比較研究，8）語言地理學和“地域”語言學，9）書面語和標準語及其風格，10）詞匯學和語義學，11）語言學在科學系統中的地位及其中利用其他科學的方法問題，12）應用語言學在現代發展中所提出的一些理論問題。

現在發表的這一章是由布達哥夫（Р. А. Будагов）、維諾格拉多夫、高爾農（Б. В. Горнунг）、古赫曼（М. М. Гухман）、捷斯尼茨卡婭（А. В. Десницкая）和謝列勃連尼柯夫（Б. А.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編寫的。

認為是陈旧了的，是落后于其他科学（首先是精密科学）的方法論和理論的發展的。把語言學變成“精密科学”——这是西方的战斗口号，这个口号在很多年青的苏联語言學家当中得到了积极的响应。这些年青人的科学观点早在傳統語言學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就已开始形成，他們亲眼看到，苏联的傳統語言學无力（甚至在M. H. 帕克洛夫斯基的反历史“学派”被击潰之后）使語言學中的历史主义原則的真正論證对抗“語言新學說”的伪馬克思主义的詞句。1950年語言學討論后，苏联語言學脱离了馬尔理論，但时常有一种偏向伴随而来，即公然恢复无批判地接受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比較語言學派的一般理論观点。为反对馬尔門徒所特有的那种对待科学遺產的虛无主义精神而进行的斗争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时又导致毫无根据地把十九世紀末的学者（特别是本国学者）的一般观点，甚至其具体历史的論点奉为典范（首先應該提出，从历史上講，无根据地夸大了弗尔图納托夫的作用）。

西方語言學理論思想方面那种表面上很沸騰的現象，在1950年的討論之后的五六年間，对苏联一部分老輩的語言學家來說，还未成为有深刻兴趣的对象，或只是引起了他們的宣言式的譴責。这种譴責沒有做到批判地分析科学著作的內容。同时，人們很長時間沒理睬国外對我們进行不友好的批評的那些信号，这种批評說，1950年馬尔主义在苏联的崩潰导致簡單地修复革命前俄国科学和西欧“青年語法學派”的經驗主义和實証主义的傳統。因此，沒有看到我們严肃的語言理論工作的萌芽的那一部分年青人的眼光便趋向于西方，他們把我国語言學理論的現狀有些輕視地評價为“不开通的落后”——遺憾得很，这是有一些理由的。同时，在1950年的討論后，在个人崇拜的情况下，某些苏联的語言學家很久沒有能够下决心从斯大林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學問題》一書所涉及的有限問題的圈子中走出来，他們不顧作者的声明（他不是語言學領域中的專家）极力（毫无足够根据地）“发展”这个著作的每一个具体的、甚至是沒有方法學意义的論点。

同时，很大一部分西欧和美国的語言學理論家（繼之又有我們的某些个年青人）宣布了語言科学中的“新时代”已經来临这样一种口号。他們曾經宣称，并且繼續宣称，根据語言學的基本理論問題可以用“新方法解决”来看，根据发现了描写和分析“同时性”方面（这种同时性方面可以潜在地轉为“泛时性”或“无时性”方面）的語言的新（“結構主义的”）方法来看，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前三分之一的“傳統語言學”應該成为科学历史上的东西了。按照一些最极端的現代美国語言學流

派（語言單位論，描写語言學）的首領的意見以及一些學家的言論來說，傳統語言學對於“結構主义”数理語言學來說，已处于科学發展的“前科学时期”的地位，如同十六至十八世紀語言學当年在有了博普（Bopp）、拉斯克（Rask）、格利姆（Grimm）、瓦斯托柯夫（Восток）和波特（Pott）等人的发现和制定了比較語言學方法之后所处的那种地位一样。他們还宣称，語言只是現在才可以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学，因为它采用数学、数理統計學、邏輯斯提（логистика），“信息論”控制論的方法，正在變成一種“精密”科学。

現代应用語言學的成就造成了一種危險的錯覺。很多科学家开始認為，語言學應該屬於自然科学，而屬於社会科学。信息論、代碼論、語言和電話學及語言和統計學等邊緣問題研究——这类概念在語言學中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語言結構本身越来越多的形式化，所謂数理語言學这个特殊部門的發展，这一切都在促進那种把語言看成是一種自然現象的新觀點的傳播。以上这种观点通常还没有非常絕對地表达出来，看来因为还没有忘記上一世紀60年代施萊黑爾在达尔文主义初步成就的影响下曾經想把語言學列为自然科学而沒有成功这一事实。然而，这一观点在国外語言學的某些派別中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傳播。

在这方面，法国語言學家本溫尼斯特（E. Benveniste）不久以前对英美研究者瓦特摩（Wharmour）的一本書（闡述語言的一般問題的）所写的評論是很意味的。按照本溫尼斯特的意見，瓦特摩这本名為《語言，現代的綜合》（Language, A modern synthesis, London, 1956）一書的內容會使讀者得出結論，語言“与其說屬於人文科学，不如說屬於自然科学”。^①令人奇怪的是，作为梅耶的学生和历史比較法的拥护者，本溫尼斯特沒有明确地表示他对这类結論的否定态度。他倒是号召學者們研究这个他認為是复杂的問題。

但是，在馬克思主义語言學中，語言是一個特殊的社会現象，因此，語言學是一門社会历史科学，这个題是不容置疑的。不但如此，对于馬克思主义語言學來說，这个論点是公理性的。应用語言學的成就，不大，所以不能动摇这个論点，正是由于它的公理性。語言是人們在社会上的交际工具，表达思想和感情的工具。因此，关于語言——这个完全社会性的現象——的科学，不可能不是社会科学。在这方面，不能

①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巴黎語言學學會通報), 1958, 53卷, 第2期, 19頁

起列宁的話(這段話是五十年以前說的,但至今仍保持着全部意义):“反动的意向是科学的进步本身所產生的。自然科学的輝煌成就,它向那些运动規律可以用数学来处理的同类的單純的物質要素的接近,使数学家遺忘了物質。‘物質消失了’,只剩下一些方程。”①在国外現代的語言学中有类似这样的危机,这种危机也是由于它本身的成就而产生的。但是,正如自然科学的成就不能引起“物質灭亡”(尽管有时造成这种“灭亡”的皮相)一样,語言学的成就,尽管引起了一种錯誤的印象,即語言中似乎只有“一些关系”(对应于数学中的“一些方程”),毕竟不能引起具有多种社会功能、与思维有多样联系、在构成思想上有多种作用的现实語言的灭亡。

机器翻譯这一思想的广泛流行(机器翻譯的技术利用了某些“结构主义”分析的结果和利用了語言中这些或那些“结构”成分的使用頻率,以及它們的“分配情况”的某些統計研究成果),时常引起或多或少有些絕望的言論,說什麼必須根据应用語言学的要求改造語言学的全部理論。提出了类似这样的論据:既然“傳統語言学”的方法对于机器翻譯技术的发展不能提供什么東西,既然現代“结构主义的”語言分析方法只能部分滿足这种技术的需要,那么就有必要按照机器翻譯提出的要求改造語言学的全部理論,改造語言分析的全部方法;既然“信息論”,以及把語言当作某种可以建立“信息”的“代碼”来研究的方法,对于机器翻譯是有用的,那么,这就是分析語言的唯一正确的途徑,因此,这些方法应该应用于語言学的各个部門。

国外对語言学对象和任务有一种新理解(这种理解起源于索緒耳1916年所写的《普通語言学教程》一书中的某些說法),即只是对語言結構进行內在的分析,与这种看法不同,在苏联有一种试图簡單化地把这种新理解与作为改造理論的进步动力的“实践标准”这一馬克思主义原則联系起来的現象。②除此而外,我們这里有一些人有时机械地把馬克思主义文献对自然科学部門二十世紀的某些思想和理論(例如,相对論、量論、場論)所給予的那些評價应用到語言学上,企图在结构主义者和語言單位論者的語言学理論中找到自发的辯証法”的成分,并使它和作为似乎是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傳統語言学对立起来。③

从以上所列举的种种事实来看,应当承認,我們根馬克思主义理論研究普通語言学問題的情况远不能令人滿意。

以下几个因素妨碍語言的一般理論的順利研究:

(1)有部分的老輩語言学家及其指导下的青年对

理論問題估計不足,他們力求把理論問題最大限度地簡單化,他們天真地相信,新理論本身可以从純实际的研究中产生。我們青年中的这种信仰由于崇敬过去那些著名的俄国講究实践的語言学家而不断加深。然而,类似李阿普諾夫(Б. М. Ляпунов)或卡尔斯基(Е. Ф. Карский)等优秀的俄国語言学家的那些有益的、寶貴的和充滿大量实际材料的历史描写著作,不仅沒有使俄国科学接近普通語言学問題的提法,而且無論怎样也沒有反映在某一本革命前的普通語言学教程中。从另一方面說,我們知道,我国最大的語言学理論家:波鉄布尼亞(А. А. Потебня)、博端·德·庫尔特內(И. А. Бодуэн-де-Куртене)、謝尔巴(Л. В. Щерба)等人(弗尔图納托夫也多多少少)曾研究过一般的理論問題,独特地提出和解决这些問題,并且建立了他們的觀念,同时完全沒有等待彻底收集材料以解决所有的个别問題。他們时常根据已有的和已研究的材料,以新的方式提出某些問題。正是他們的理論(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还是有爭論的)而不是历史描写的專著推动了語言学思想的前进。

(2)这一部分語言学家不妥协地对待所有力求在科学已掌握的材料範圍内通过已知事实的新解釋对某一問題加以新闡明的企图。

(3)把一切试图批判地对待过去祖国科学遺產的現象看成是试图恢复“語言新學說”門徒們所特有的那种对待科学遺產的虛无主义精神;对現代国外語言学理論和語言学实践的批判表面化,并因此而对許多派別(例如“新語言学”)繼續着一种极端教条式的指責,把它們說成是同苏联語言学完全不相容的,然而,却同那种迷恋于其他流派(各种不同形式的結構主义,М. 斯沃戴施的“語言統計学”,等等)的傾向相安无事,似乎它們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不妨碍获得光輝的实际成就。

(4)对公开审查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一著作中某些論点有所节制。尽管在討論后几年里有很多人试图把这些論点应用到具体的研究著作上,但这些論点仍然未得到証实(只根据語义标准分立“基本詞汇”;把語法抽象的理解簡單化;关于“氏族語”的

① 《列宁全集》,第14集,人民出版社版,325頁。

② 与此同时,我們这里有一种毫无顧忌的言論为奠基在邏輯斯提原則上的“內在語言学”辯护。見邵勉(С. К. Илларионов)的《結構語言学是一种內在的語言学理論》,莫斯科,1958年。

③ 見邵勉的《論結構語言学的本質》,原載《語言學問題》杂志1956年第6期,38—54頁;中譯文見《語言學論文選譯》第六輯。

假說，几乎完全否定了語言相互影响的作用，以及过高估計了語法結構的穩固性和不可滲透性；把社会方言只看作是“同行語”(жаргон)，以及其他一些問題)。

同时，有时有人宣称，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特点尚未明确。他們在发表这种意見时沒有意識到，这是同上面提到的那些對我們極不友好的外国科学界人士同唱一調。后者只是在“語言新學說”中看到了这个特点，不惜恭維四十年代苏联語言学的阶段-类型研究的“一般精神”和傾向，^①而在馬尔主义完全崩潰之后又开始說，苏联語言学家完全恢复了革命前俄国科学的思想 and 傳統。

今后研究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理論基础，应当从精确地树立那些对所有(或絕大多数)苏联語言学家毫无疑义的基本論点开始，然而，这些論点尽管是无可爭辯的，但是在理論上依然是沒研究透彻，甚至时常在邏輯上不精确，首先是在这些論点彼此之間的关系上不精确。这些不容爭辯的論点(語言的社会本質，它的特殊符号性質，历史主义是語言学的基础，語言历史和人民历史的关系，語言系統的自我发展，等等)經常宣言式地以一种籠統的模糊不清的形式重复着，結果：

第一，表达方式不精确有时导致一个論点和另一个論点显然矛盾；

第二，一系列宣言式的論点無論如何也沒有反映在“按老規矩”写出的那些具体著作中，这些論点只是在这些著作的導論中写着。

因此，目前的任务不是編写《普通教程》，也不是編写《語言学中的基本問題》，而是應該綜合各种族系和各种类型的大量語言材料来編写足以确切和深化各別問題的提法的專題理論著作。

語言的社会性以及語言与社会发展有密切联系的論点在1950年以前是“語言新學說”拥护者的論点，同样也是它的反对者和居于折衷主义地位并在“印欧語言学”(这个詞应按那时的歪曲理解来講)^②和馬尔主义之間找“桥梁”的那些語言学家的論点。但是，“語言新學說”不是單純地接受了这个不容置疑的一般論点，而是給它作了一定的訂正，認為語言是“思想意識”的一种形式(虽然同时承認在它之中有“工程技术”的成分)，即“上层建筑”，因而把它看成为階級現象(在階級社会中)。这些特殊的訂正后来在“語言新學說”的門徒的範圍以外广泛地流傳开来，有时也同它(“語言新學說”)的影响沒有直接联系了，而起源于那种对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更一般的庸俗理解，特別是起源于波

克洛夫斯基“历史学派”对語言发展的观点。

1950年討論的結論为所有的苏联語言学家一致公認，不管他們在此之前的立場如何。通过了斯大林提出或強調的一系列一般社会学的和部分历史語言学的論点，例如：

1) 語言不是上层建筑，不因社会經濟基础的变更而发生根本变化；

2) 語言(全民的)不是階級性的，尽管社会分裂为階級；

3) 新語言的創立不是通过过去存在的語言之間发生融合的方式；

4) 基本詞汇在許多世紀的过程中不发生重大变化；

5) 語言构造不应看作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

6) 在語言的发展中找不到任何“飞跃”或“爆发”；

7) 不应该濫用語义学，不应该把語言的全部本質和所有它的发展归結为語义学；

8) 不能把思維和語言分裂开来；

9) 概念不能离开它們的語言外壳在人的头脑中产生；

10) 研究历史变化中的語言結構对認識“語言发展的內部規律”非常重要。

斯大林的这些(和某些其他的)論点是以一般形式表达的，其正确性是无可爭辯的，这些論点在1950年討論后的最初几年被全体苏联語言学家大大地发展了，并由各个时代的各种語言的生命中的大量例証加以說明；这种詳細的叙述往往同时說明了，与这些論点相矛盾的某些“語言新學說”的論点是如何同語言生命的事实相矛盾。所有这一切會是完全必要的和十分有益的。無論如何不应低估这一阶段的重要性，也不應該說这一阶段是“毫无成果”(現在，有时有人正是犯了这个毛病)。但是，这个阶段过于拖長了。在徹底恢复那些被遺忘的或被踐踏的十九世紀的“基本真理”的权利之前，就应该以这些基本真理的正确性和它們对解决今天的任务还有很多欠缺之处为出发点，根据馬克思主义理論开始研究一套解决普通語言学基本問題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只有这种研究才会保証不发生这样的危險：馬尔主义的崩潰导致恢复馬尔主义以前的那种不仅沒有根据馬克思主义理論而且甚至沒考虑到它的語言学。

(下轉437頁)

① 参看 Lingua, Cahiers F. de Saussure 等杂志的言論。

② 應該提醒，在40年代，这个術語的意思不是印欧的研究，而是非起源于馬尔思想的任何語言学觀念。

书刊评论

《欧洲语言学說簡述》

杰格捷列娃著,《俄文教学》编辑部编,商务印书馆出版,1958年,定价0.24元。

杰格捷列娃《欧洲语言学說簡述》(19世纪至20世纪)的譯文曾在1957年的《俄文教学》上連載过,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單行本。本書虽然篇幅不多,却一篇很有科学价值的論文。作者扼要地介绍了19—20世纪欧洲语言学的各个学派,指出了它們的成就和实际,也追溯了欧洲语言学发展的道路。本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論述历史比較語言学的产生和发展,后一部分評論現代語言学中的結構主义。重点在前一部分。

作者把历史語言学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对各个时期的各学派(如自然主义学派、新語法学派、社会功能主义学派等)及其代表人物和重要著作——自索緒耳到本溫尼斯特都作了精辟的論述。作者严正地指出了他們的唯心主义的語言学观点,也肯定了他們在語言研究的成果。例如作者指出,拉斯克和格林的语言轉移規律对于确定日耳曼語族的划分标准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比較語言学各时期的学者在細致地分析各語言的語音和語法結構的細節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在結構主义方面,作者簡要地介绍了布拉格学派和本哈根学派。語言学中的結構主义是索緒耳、鮑德·庫尔特內学說的繼續和发展。索緒耳提出語言結構的静态描写的原則,而結構主义語言学則表現語言的細致的結構描写研究。結構主义者也研究一些語言中个别的、局部的、有条件的規律,可是把这些規律視為“不变的、絕对的、不依赖于具体材料的、永世長存的和依赖于社会的東西”(原書4頁。以下引用原作时只加引号,不再加注)。这就使他們在方法論上陷进了形而上学的泥坑。

现在再来看看作者对历史比較法的評價。作者指出只有有了这种方法才有可能对語言事实的特性和作严格的科学解釋和正确的分类。“只有借助于历史比較法才能够正确地、有科学根据地解讀古老的、死亡的語言…只有借助于历史比較法才有可能建

立个别語言和語群的科学历史”。因此,作者強調指出:“历史比較法的出現,对于語言学这門独立的科学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語言学史上一个新的、极其重要的阶段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可見,历史比較法的出現是語言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斯大林也曾指出:“历史比較法虽然有其严重的缺点,还是比馬尔的真正唯心主义的四种要素的分析法要好些,因为前者还推动着研究語言的工作…”(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23頁)。历史比較法之所以值得重視,正是因为它“推动着研究語言的工作”。

作者在評述历史比較語言学中的各个学派时,对它們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作了严厉的批判,而对它們在語言学上的研究成果却并不采取一律否定的态度。例如作者指出新語法学派学者对于語言本質的唯心观点的同时,也肯定了他們在研究具体語言事实方面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他們在印欧語历史語音学方面的成績特別显著,因为它們“成功地确定每一組同族語的内部語音变化的規律性”。作者对俄国学者波鉄布尼亞也作了公正的評定,認為他虽然站在錯誤的方法論的立場上,但是“大量收集并細致地分析了語言事实,作出了一些有趣的局部的概括,从而丰富了語言科学”。这种批評态度是正确的。苏联《語言学問題》杂志在1956年第4期的社論中曾經指出,在批判語言学上唯心主义的理論时,“應該分別地对待語言学方面的專門成就和对語言学中的新发现底錯誤的、唯心主义的解釋,因为这些成就苏联語言学家也可以加以利用”(《当前苏联語言学界几項迫切的任务》,見《語言学論文选譯》第六輯,4頁)。关于历史比較語言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批判杜林的教育观点时写道:“杜林先生对于旧語言学的憎恶使他竟至把它的最坏的产品当作‘真正有教育的語言研究的核心’。显然的,我們所遇到的这位語言学者,从来沒有听见过六十年来这样巨大地这样成功地发展着的历史比較語言学,所以他不是从波柏(Bopp,1791—1867),格立姆(Grimm,兄Jakob 1785—1863;弟Wilhelm 1786—1859)及田芝(Diez 1794—1876)而是从久已去世的海夷士(Heyse, 1764—1829)及培克尔(Beeker, 1775—1859)去寻求‘最近

代的教育要素”(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338頁)。可見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對歷史比較語言學是非常重視的。作者說,近年蘇聯在歷史比較語言學方面的发展是較慢的,這是由於1950年以前“馬爾(Н. Я. Марр)學派在蘇聯語言學界占統治地位,而這個學派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歷史比較語言學在蘇聯的发展”。因此,作者認為,蘇聯語言學家必須研究印歐諸語言或其他語系諸語言歷史比較語法的重大問題,並且做出偉大的貢獻來。

作者在評述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代表人物時,也介紹了俄羅斯的偉大學者如沃斯托柯夫、波鐵布尼亞、福爾圖拿托夫等人對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偉大貢獻。這些學者在西方的語言學史著作中不是輕輕帶過就是一筆勾銷。例如丹麥裴特生的《十九世紀歐洲語言學史》就沒有提到他們。這是十分不公正的。

本書也有一些缺陷。近年蘇聯語言學界曾對結構主義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可惜本書沒有把這次討論的結果反映出來。在這次討論中,蘇聯語言學家們的意見雖然還沒有趨於一致,但是其中有一個原則是大家都同意的,就是:“結構主義是現代語言學的一種觀點的形式、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哲學學派”(安塔爾·拉斯羅:《論結構主義》,見《中國語文》1958年10月號,491頁)。因此,“評價各種結構主義方法的唯一正確的办法,是要看它們在什麼樣的程度上推動了我們關於語言的普遍的認識,從而豐富了具體的語言研究工作的方法”(同上引文)。這個意見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總的說來,這是一本理論性很強的著作,可以當作普通語言學的參考讀物。一般地說,我們中國年輕一代的語文工作者對於普通語言學和語言學史的知識是比較貧乏的;他們迫切需要這方面的知識。因此,這本書應該受到中國讀者的熱烈歡迎。(梁振)

《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

梁東漢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2月,定價0.78元。

這部著作是梁東漢先生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字學所用的講稿,經過幾次修訂和補充,現在公開出版了。本書詳實地論述了漢字的結構和演變,深入淺出,是一部平平實實介紹漢字知識的著作,值得歡迎。

全書共分五章。第一章“文字和語言”,第二章“文字的起源”。這兩章是本書的綱領,論述文字的性質、文字和語言的關係、漢字和漢語的關係、漢字的起源等問題,字里行間充分反映了作者的學術觀點。漢字有沒有階級性,語文工作者曾經有過不同的看法。本書

明確指出:“語言和文字都沒有階級性,它們都是為社會的成員服務的。”對於主張文字有階級性的說法作了分析和批判。文字和語言的關係,文字必須在語言的基礎上產生,沒有語言作它的基礎,文字實際是不存在的。漢字不是拼音文字,是表意文字,因過去有些人認為漢字可以直接用“形”來表示“義”。書批判了這種幼稚的看法。文字是從圖畫發展來,逐漸失去繪畫的性質,逐漸發展符號的性質的過程是文字產生的過程。漢字的來源也是這樣。本書對前種種歪曲漢字起源的說法逐一批駁。

第三章“漢字的發展”,筆者認為這是本書最扼要的一章。這一章分三節,第一節“從圖畫文字到形聲文字”,論述漢字字形結構,從甲骨文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公布的簡體字,介紹漢字三千多年來的发展概況。第二節“漢字發展過程中簡化繁化兩種趨勢”,第三節“漢字發展的內因和外因”,論述漢字變化的趨勢和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

第四章“漢字的性質和結構”,這是占本書一半篇幅的一章,詳細論述漢字的體系和構造。“六書分析”一節特別詳細,系統地列舉了豐富的例子,甲骨文、金文、篆文、隸書、楷書,對於理解漢字歷史發展有很大幫助。讀者念了本書第三章和這一節,對漢字身的結構系統可以有一個基本的了解。

第五章“漢字的新陳代謝及其規律”,論述漢字發展的規律,結合漢字簡化和文字根本改革,具有現實意義。

《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是一部有益的參考書,讀者念完以後受益不淺。同時在閱讀中也發生了一些問題,現在提出幾點來求教。

1)“詞的語音組織變化了,但文字卻沒有立即反映這種變化,這種情形在任何民族的文字里都是普遍存在的。特別是在表意方塊漢字體系里尤其顯著。如從‘林’得聲的字如‘霖’‘淋’‘琳’‘淋’‘淋’‘淋’,尾由閉口音[-m]變成[-n],但文字沒有反映這種變化”(8頁)。按“林、琳、淋、霖、霖(力尋切),榔(五切)”在《切韻》侵韻,侵韻字古音有[-m]韻尾,現在有一些方言保持[-m]韻尾的。普通話“林、霖”等讀lín,“榔”念chēn,都是有規律的音變。“林”字的形既不標注[-m],也不標注[-n],它在廣州話里[-m],在普通話里收[-n]。文字趕不上語音的變化,拼音文字很顯著。象漢字這樣的表意文字,不是拼音的,只有從形聲字中觀察到一點消息。上的例子不能說明“林”或“霖”沒有反映韻尾[-m]變[-n]這個問題。

2) “我們主張文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可以直接表
思維,而不必通过語音(有声語言的語音組織),那就
主張文字不是在語言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主張
引导出这样的結論: 文字可以超語言而存在。这
結論是彻头彻尾反馬列主义的。”这一段話是完
全理解的。文字是一个体系,在語言的基础上产生
不通过語言的任何符号就不是文字。同时作者又
“如果說, 文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 即直接表达思
维, 那就等于說, 思维可以通过任何符号而不必通过語
音来表达, 或者說, 沒有語言思维也同样可以表达”
(頁)。这些話似乎講到題外去了, 思维活动、思想的
产生, 是否可以不在語言材料的基础上产生, 这是另外
一个问题, 不是語言学范围以內的问题。

3) 殷周銅器上



类图形, 有很多学者研究过, 結論很不相同。有人說
是文字画, 有人說是图騰, 有人說是文字。这些图形是
是文字, 对本书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它反映我們对文
字的看法。作者肯定“它們不是作器者的名字或是他
封邑的名字, 就是鑄工的簽署。它們一定是文字, 不
我們現在不認識而已”(27 頁)。按文字是書面語言
符号, 不是別的符号; 文字是有系統的書面語言符
号, 不是个别的零星的符号。汉字从图画发展出来,
画和文字的界限在于它是否和語言的表达系統相
合, 甲骨文金文虽然有不少个近似图画的象形字, 但
可以肯定它是有系統的文字。它記錄語詞的音节,
語言表达形式的符号, 不是語言內容的符号。很明
白, 句子中有許多只表示語法意义的虛詞, 还有許多假
借字, 它必須通过語音才能傳達語义。这些文字和語
音的配合是有系統的, 所以甲骨刻辞和銅器銘
是可以理解的殷周时候的書面語言。甲骨文金文中
少数几个合文, 如𠂔(三千)𠂔(父乙)等, 这类合文都
以在辞句的中間出現。上面那些銅器上的图形形体
相当复杂, 只有在辞句的开头或末了出現, 很特別。肯
定这些图形是有意义的, 但是是否表示語言的表达形
式, 值得商榷。

4) “簡化形声字的音符或义符造成新的簡体形声
字。例如…‘藩’簡化成‘沈’, 从‘水’, ‘尢’声”(41 頁)。
者以为“藩”簡化成“沈”是同音替代, 不是新的簡体
字。

5) “羊字由𦍋簡化为𦍋(甲骨文)羊(小篆)羊

(隶)羊(楷)”(45 頁)。按𦍋和𦍋在甲骨刻辞中用法不
全相同。𦍋是羊字; 𦍋郭沫若先生釋为瞿, 他在《殷契
粹編考釋》中說: 𦍋字旧釋为羊, 揆以文义, 无一可通。
案此当是瞿若瞿之古文, 象鷹瞿視之形。此二辞以
‘勿𦍋酒𦍋’及‘乎言酒𦍋’为对貞。細审其意, 盖𦍋与
言均当为虛辞, 𦍋用为遽, 言讀为爰也”(第四十七条)。
𦍋是不是𦍋的繁体, 可以再核对資料。

6) “形声字的音符所代表的是詞的語音, 它和詞义
並沒有必然的关系。《說文》里所謂‘某亦声’的字即所
謂‘义兼声’…它的音符实际上并不包含自己本来的意
义, 因此, ‘义兼声’的說法是靠不住的。例如…‘價’字
解釋为: ‘物直也。从人賈’, ‘賈’亦声。…許慎的
錯誤就在于他不明确文字和語言的关系, 不知道音符
只是一个純粹表音的符号, 因而把音符誤認為义符, 又
进而得出义符同时又是音符这个錯誤的結論”(139
頁)。作者的意見和右文說似乎是兩极端。六書是后人
从文字結構中归納出来的条例, 是容許有跨类現象的。
只要事实上存在义兼声的現象, “某亦声”指出这种現
象, 并不能算是錯誤。

7) “氍毹是氍毹傳入中国以后所造的新字”(163
頁)。按“氍毹”是藏語 ཐུགས་ཀྱི་མེ་ལོ་མོ་, 也叫做 ཐུགས་ཀྱི་མེ་ལོ་མོ་。
《新华字典》和《同音字典》都解釋“氍毹是西藏出产的
一种厚毛織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是外国。这
类疏誤很容易引起附会, 亟应糾正。

文字学是語言学当中的一个重要部門, 我国有研
究文字的傳統, 建国以来, 文字改革工作已經大力开
展, 文字学應該配合文字改革工作大大发展。今天文
字学这門学科远远落在时代的后头。文字改革必須掌
握文字的发展規律, 这方面的工作是做得不够的; 历代
用汉字印刻的書籍浩繁, 这是我們祖國的財富, 要充分
了解这些書籍的內容, 必須借助于文字史的进一步研
究。文字学旧称小学, 包括字形、字音、字义。近几十
年来有各自分列的趋向, 文字学只管形体結構。笔者
認為, 文字学有两个方面: 文字是書面語的表达形式,
語音是口語的表达形式, 文字学首先應該研究这两种
語言形式之間的相互关系。当然, 文字本身的結構也
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汉字的結構及其流变》是一部
論述文字結構的平平实实的著作。(管燮初)

更正: 本刊 1959 年 6 月号封四第 18 行“暑
假, 将在”应为“暑假后将在”; 7 月号 342 頁左
栏下倒 3 行, 自“如果…”起应另行, 不是引文; 8
月号 371 頁左栏上第一行应删, 387 頁倒 10 行
末“可以应改为”应为“可以改为”。

语言学名词解释 (十二)

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編

181 舌面音

发音时舌面和硬腭接触,气流受节制而发出的辅音,叫作舌面音;部位偏前的叫作舌面前音,部位偏后的叫作舌面中音。又因气流受节制的方法不同,舌面音可以是塞音、塞擦音、鼻音或边音。汉语的j q x[tɕ tɕ' ɕ](“基溪希”和“居区虚”的声母)是舌面塞擦音和擦音。这三个声母在胶东方言(青岛、蓬莱)却读作舌面塞音和擦音,部位略微偏后(如[c e'ç])。半元音[j]也是一种舌面擦音。(舌根音[k k' ŋ x]也有人叫作舌面后音的。)(袁)

182 舌叶音

舌叶音也叫作混合叶音,舌前边缘同上齿龈接触,舌面前部向硬腭抬起,因气流受节制的方法不同又可以分为塞擦音(如[tʃ][tʃ'] [dʒ])和擦音(如[ʃ][ʒ])。汉语广州方言“知痴诗”的声母,英语church[tʃə:tʃ], judge[dʒʌdʒ], year[jiə]等的辅音,都是舌叶音;但是广州这类音的舌尖作用较为显著。(袁)

183 鼻化元音

鼻化元音是对口元音而说的。发元音时,气流从口腔和鼻腔同时流出,引起口腔和鼻腔的共鸣,便构成鼻化元音。汉语方言里这类鼻化元音是很丰富的,如厦门话的“箇”[ã]、“嬰”[ẽ]、“英”[ĩ]、“毛”[mõ]。法语里也有一套鼻化元音,如cent[sã](百), bon[bõ](好), bien[bjẽ](好), un[œ̃](一个)。(袁)

184 复辅音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辅音结合在一起的叫复辅音。它必须在同一音级之内,处在同一增强的紧张上或同一减弱的紧张上。如俄语的 второй 中的“вт”,就是复辅音。

复辅音的组成有各种形式。如汉语的“猪”,西安话说[c pʰu]的[pʰ]和北京话说[c tɕu]的[tɕ],也可以说是复辅音的一种形式。其他如俄语中的 много 的“mn”是由一个塞音加上一个塞音组成的; свой 中的“св”是由一个擦音和另一个擦音组成的,等等。至于三个以上的辅音结合在一起的复辅音,如俄语“страна”中的“стр”。(何)

185 音级(音节)

把词的声音分成音素,是语音学分析的结果,而不是听觉的直接

感应。我们说话是以句子做单位的,句子又是由一个个词组成的,词在声音方面又包含着若干音级(也是个词就是一个音级的)。音级就是由一个或几个音组成的最小的语音结构的单位。

语言学上对于音级及音级的划分有各种不同的解。古希腊人关于音级的最早定义是“包含一个元音或一个元音跟别的辅音结合而成的发音单位”。一世纪以后,又有种种说法,如呼气说、响度说,等等。是它们都不能概括音级的全部组成现象,因而片面。根据实验的结果,应该以发音时喉头的紧张(或减弱的)作为确定音级的标准。每一音级都是一个紧张增强的音素开始,以一个紧张减弱的音素结束。音级的分界就在前一音素的紧张减弱和后一紧张增强的中间。根据这点,我们可以说一个音是一音素或多音素的增强紧张加上一音素或多音素减弱紧张。(何)

186 开音级

在音级结构里,凡是以元音收尾就叫做开音级。如“爸”[pa]、[p'au],等等。汉语音韵学上所谓“阴声韵”,实际是以元音收尾的韵母。(何)

187 闭音级

在音级结构里,凡是以辅音收尾的叫闭音级。如北京话的“安”[an]、“当”[taŋ]等。北京话只有[-n]和[-ŋ]两种闭音级。州话和客家话的闭音级比较丰富,除[-m] [-n]外,还有[-p] [-t] [-k]。如客家话的“三”[sɿ]、“山”[ɕsan]、“行”[ɕhaŋ]、“合”[hapɿ]、“达”[t'ak]、“客”[k'akɿ]。

汉语音韵学上所谓阳声韵,就是以[-m] [-ŋ]收尾的韵母。所谓入声韵就是以[-p] [-t] [-k]收尾的韵母。(何)

188 次重音

有的语言,多音级的词有程度不同的重音。我们把念得特别重的叫重音。念得次于重音的叫次重音。如英语 conversation [kən'veɪ'seɪʃn] (会话),第三个音级[seɪ]是重音,用“i”号放在音级左上角来表示;第一个音级[kən]次重音,我们用“i”号放在音级的左下角来表示。

文字是語言的書寫符號，是人類最重要的輔助性的交際工具。語言有一定的

限性，一離嘴就化為烏有，遠處的人聽不見，後來的當然更聽不見。文字能補語言的不足，把語言記錄下來，傳於遠方，傳於後世。文字從屬於語言，但是有了文字，有了書面語言，又可以反過來促使語言（口語）健康地往前發展。文字的產生對人類文化的發展起巨大的作用。恩格斯曾經說過：“（人類）從鐵礦的熔煉開始，並因文字的發明與它應用於文獻記錄而轉入文明時代。”有了文字人類就可以廣泛地交流生產鬥爭階級鬥爭的經驗，並且把這些經驗大量地、有系統地，一代一代地累積起來。

文字和語言一樣也是沒有階級性的；但是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里，勞動人民一般沒有識字受教育的機會；到了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為了使工人懂得一點技術，能夠進行大規模的機器生產，也給勞動人民一些教育的機會，然而文盲仍然不少。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勞動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每個人才能夠充分享受識字受教育的權利。

文字的發展可分三個階段，即表形期、表意期、表音期。現在世界上重要的文字多是表音期的文字。凡沒有發展到表音期的文字，遲早都要改為表音文字，這是文字發展的規律。我國的方塊漢字，基本上屬於表意期，難認、難學、難寫，使用很不方便；我們正準備過一個不太長的時期，把它改革為表音文字。（賈）

190 文字學

以文字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叫做文字學。文字學研究文字的性質、字形和字義間的關係、正字法、文字的起源和發展、個別字的演變情況等。文字學中又有古文字學，專門研究古代的文字。

文字學的知識可以指導我們改進文字，改革文字，少數民族創立文字等。另外，由於語言是一發即逝現象，要想研究古代的語言，往往需要借助於對古文的研究。同樣，要想讀懂古書，要想知道巴比倫、亞述的文化（當時用的是楔形文字），要想知道殷商的文明（當時用的是甲骨文），不研究古代文字也是不行的。

由於我國的歷史悠久，由於幾千年來我們使用的文字是一種很繁雜的表意文字，所以我國的文字學是發達的，特別發達的時期是漢朝和清朝。不過我國的文字學研究的範圍很廣，有些語言學的問題它也要研究；再則，過去的文字學是厚古薄今的，忽視（甚至迴避）現實生活中提出的問題。解放後，黨和政府致力於解決各項現實的文字方面的問題，如漢字改革，為少數民族創制文字等等，這就為我們文字學的研究指出

了新的方向。（賈）

191 字母

字母是拼音文字中最小的拼寫單位，拼音文字的字就是由字母拼成的。每種拼音文字都有一定數目的字母，這些字母按照一定的順序排列起來，構成該文字的字母表。

字母和音標不同。理想的音標（例如國際音標）是表音素的，一個音標只表一個音素，一個音素只由一個音標來表示。字母是在音位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個音位的不同變體，用音標標寫時，各不相同，用字母標寫時，可能沒有區別。有時一個字母可以代表兩個音素，例如俄文的“я”[ja]，有時兩個字母代表一個音素，例如英文的“th”[θ]，也有的字母只作符號用，本身不表音，例如現代俄文的“ъ，ь”，等等。字母和音標所以有這些區別，是因為它們的用途不同，音標需要把讀音準確地標寫出來，而字母則要便於使用。

字母不等於文字，不同的文字可以用同一種字母拼寫，就好像不同的語言可以使用同一種音標一樣。現在世界上使用的字母種類繁多，但是運用的範圍最廣的只有三種，即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和阿拉伯字母。我們現在推廣的拼音方案就是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賈）

192 表形文字

人們提到最原始的文字，往往要提到圖畫文字，其實所謂圖畫文字只是能起一些交際作用（或幫助記憶）的圖畫，算不得真正的文字，真正的最初階段的文字應該是表形文字。表形文字已經代表語言中的詞，有一定的讀音，寫法也逐漸固定。表形文字的造字原則就是表事物的形，例如畫個人代表“人”這個詞，畫座山代表“山”這個詞。在我國的甲骨文里有不少表形字，如“日”（日）、“月”（月）、“角”（角）、“鼎”（鼎）都是。在古埃及文字和巴比倫的楔形文字中，也可以看到許多表形的成分。表形文字的缺點很大，一方面是形体複雜，很難寫，也很難認，另一方面是有許多詞無法直接表它的形，所以文字不能長期停留在表形階段，必須繼續發展。（賈）

193 表意文字

一般地說，文字的發展要經過表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三個階段。表意字不是直接把客觀事物畫出來，而是畫一些圖形或是符號，讓人去領會其中的意思。例如甲骨文中的“上”（上）、“下”（下）、“休”（休——人在樹旁意味著休息）等都是表意字。古埃及文字中畫只蜜蜂代表“工作”這個詞，畫卷草紙代表“智慧”這個詞，也是表意文字。

表意文字比表形文字前進了一大步，許多比較抽象詞的沒有辦法表它的形，却有辦法表它的意（象上面

举的那些例子)。但是表意文字仍然存在着很多缺点:

第一,有很多詞,甚至是很普通的詞,很难表它的意思,例如:“紅、油、去年”,等等。

第二,表意字要表意,但常常并不能把意思准确地表示出来,例如甲骨文的“休”是人在树旁,其实人在树旁不一定是休息,人休息也不一定在树旁。

第三,表意文字要运用許許多多的符号和图形,因此在記憶上、書写上都是很很不方便的。

由于有許多詞不能用表意字来表示,所以許多表意期的文字总是还保留着一些表形成分,而且出現了很多表音的成分,中国的汉字、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文字都是这样。

表意文字的缺点很大,文字不可能長久地停留在表意阶段,而要向着表音的方向发展。(賈)

194 楔形文字

楔形文字又称釘头文字。它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亞的苏末人(Sumerians)創造的,創造的确实年代已不可考,但是可以断定远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就存在了,也就是說它比我国已經发现的甲骨文还早两千年。楔形文字是用草莖、木头等制成的笔刀刻在泥板上的,因为書写工具的緣故,笔划呈楔形,如𠂇而三,楔形文字或釘头文字的名称便由此而来。公元前楔形文字在西亞細亞一带广泛流行,巴比倫人、亞述人都是使用楔形文字的,波斯人也使用过这种文字。在巴比倫时代,楔形文字还是一种形声字,到了亞述人的手里已經发展成音节文字,后来波斯人又把它改造成表音素的文字。楔形文字曾經为人们服务了几千年,到了公元以后,就沒有人再使用它了。(賈)

195 音素文字

音素文字也就是我們平时說的拼音文字,它是表音文字的一种,是所有类型的文字中最科学、最便于使用的一种。音素文字的每一个字是由若干字母拼成的,不同的字母代表不同的音素(实际上是代表音位,請參看“字母”条)。例如俄文的“лес”(森林)就是由三个字母拼成的。每种音素文字的字母都有限(拉丁字母只有二十六个),字母的形体多很簡單,一般都可以連写。合理的音素文字,听到一个詞就可以写出来,看到一个字就可以念出来,扫除文盲也很方便。目前世界上很多文字都是音素文字,例如俄文、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等。一些文字过去不是音素文字,后来也改成了音素文字。我們目前使用的汉字还处在表意阶段,我們也将要逐步地把它改成音素文字。(賈)

196 描写語言学

描写語言学一般指的是对語言作靜态的描写,也就是說对某一

时期的語言的結構进行分析研究,从中找出它的規律和定律,如現代汉语、現代俄語的研究就属于这一圈。在語言研究的过程中,分出这样一个方面是必要的。語言的靜态描写对語言的教学和語言間的翻譯着实用的价值。

描写語言学有时也專指現代語言学中結構主义一个流派——美国的描写語言学(參看“美国描写語言学学派”条)。这一学派的始祖布龙菲尔德在他所著《語言》中曾經这样說:“为了描写一种語言,可以不任何历史知識;事实上,假使描写者讓历史知識影响的描写,将必然歪曲他的論据的事实。”这种絕然割断历史的理論是錯誤的。因为把語言的研究分为历史和靜态两个方面是一回事,而把二者絕對割裂又是另一回事。語言的历史知識將使我們更好地描写語言的情况。美国描写語言学的反历史主义是不合乎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原則的。

根据对語言的不同組成部分进行描写研究,我们还可以分出:描写語音学、描写詞汇学、描写語法学、描写方言学等。(赵)

197 历史語言学

历史語言学是对語言进行历史的研究。如汉语史和法语史的研究就属于这一范围。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要能了解‘本国文的材料和形式’,就只得追溯它的生及其逐步的发展。”可見历史語言学在語言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对一种語言不仅要知道它現在是怎样的,而且要知道它过去是怎样以及現在为什么是这样,进一步从中找出它的发展規律,这就是历史語言学的任务。

一般人也往往把历史比較語言学簡称为历史語言学。所謂历史比較語言学是将某种語言的历史发展与其他一种或几种語言进行比較研究,因此它也是历史語言学中的一种。历史語言学的范围比它更为广泛,因为我們可以只对某一种語言的历史发展进行研究,而不涉及其他語言的历史比較。不过,我們在對某一語言的历史进行研究时,常常会要使用历史比較法,以这二者之間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根据对語言的不同組成部分进行历史研究,我们还可以分出:历史語音学、历史詞汇学、历史語法学、历史方言学、詞源学等。

傳統的“历史語法学”也就是历史語言学。(赵)

198 正音法

“正音法”又称“讀音法”,它是文字讀音規則的总和。各种文学語言都有自己的正音法。

正音法的任务是树立讀音的标准,并在已經

的几种歧异的讀音中选择一种作为规范。所以正音法是語音规范化的最主要的手段。

正音法通常以基础方言(或其中某一中心地点)的音系統作为根据,但必須抛弃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和俗語色彩的讀音,并且从其他的方言和傳統的讀音中吸取一部分流傳广泛的、有助于改进現有讀音体系的某些讀音标准。正音法既經形成以后,便比較稳定地作为讀音的标准,不过它也随着語音的演变而改进,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出現一些新的讀音标准,消失一些旧的讀音标准。在各种語言里,正音法的成果通常全面地反映在詞典,特别是正音詞典中。

現代漢語(普通話)的正音法是在北京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普通話里語音結合和語音变化的規則早从十三世紀起就开始形成。目前亟待解决的,是一部分詞的歧异讀音的統一問題。例如“波”有[pō]和[p'ō]两种讀法,“械”有[xiè]和[txiè]两种讀法,需要选择一种作为规范。在这方面,“普通話审音委员会”近年来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在1957年10月公布了《普通話异讀詞审音表》、《本国地名审音表(初稿)》,1959年7月公布《普通話异讀詞审音表續稿》,征求广大人民的意見。异讀問題的解决,对于普通話語音的规范将来拼音文字的推行都有重大的意义。(叶)

199 正字法

正字法就是文字的書写規則,文字的规范。正字法要求文字有一种正确的、合乎规范的写法。正字法包括字的正确的写法、标点符号的使用法、拼音文字中字母大写的規則和移行規則,等等。

方块汉字正字法的内容主要是糾正写錯字(把字规划写錯了,如把“虐”写为“虐”)、別字(应该写这个字写了另外一个字,如把“刻苦”写成“克苦”),反对濫用簡字(如把“資產階級”写为“資”)——如果写了只为记看,那是另外一回事)。方块汉字虽然缺点很多,但在还未改革以前,我們仍須注意正字法的問題,否則会造成文字的混乱,影响交际。

拼音文字的正字法又叫做拼写法,拼写法有以下三个原則:

1) 語音学原則:这个原則要求我們根据詞的讀音写字,怎样讀就怎样写。例如俄文的 стол, лес, армия 的 pen, help 等的写法是同讀音一致的,違背讀音也就違背了正字法。語音学的原則对于新創立拼音文字很适用,但是,如果一种拼音文字历史很長,写法和讀法的距离已經比較显著,完全按照这条原則正字就会打乱原有的文字体系,在使用上造成困难。

2) 形态学原則:这个原則要求我們写字时注意到

詞的形态,同样的詞素無論在什么地方,無論其讀音是否有了改变,写法仍然不变。例如俄文的 над-, под-, пред-, 在任何詞里都这样写,虽然-д-有时讀作-т-。

这个原則對我們了解詞源、詞意有好处,但是同語音学原則有矛盾。

3) 历史原則:这个原則要求根据傳統的写法写字,例如英文的 enough (实际上已讀作 [ɪnʌf]), knight (k, gh 都已不发音)的写法便是这样。根据这个原則有利于区别同音詞、閱讀古書,但是却会使文字和語言的距离越来越大。

每种拼音文字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以一种原則作为正字法的主要原則,例如俄文就以形态学的原則为自己的主要原則。汉字实行改革以后,也要根据上述原則确立新的正字法。(賈)

200 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是書面語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口語中,句子在哪里停顿,在哪里結束,是叙述、发問还是驚訝的語气…都可以用語調表达出来。書面語則不能这样,它主要靠标点符号来补救(虽然标点符号不能解决全部問題)。比如,“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書面語中如果不用标点符号,上面三組話就不能区别。古人写文章往往不用标点符号,使人讀起来很費勁,有的时候还造成不同的理解。后来我国有了句“。”和讀(念[tou²])“、”两种标点符号,但远不如現在我們使用的标点符号完备。各种語言的結構不一样,使用符号的习惯也不尽同,但是現代各种語言的标点符号使用法是經過互相参考而制訂下来的,所以它們大同小异。漢語用的标点符号有:“。”句号,表示句子終了;“,”逗号,表示句中一般的停顿;“、”頓号,表示句子很短的停顿,往往用在短的并列成分之間;“;”分号,表示句中較長的停顿,往往用在較复杂的并列成分之間,或者用在可以成句但是实际上全句又未終了的地方;“:”冒号,表示它前面的話是总提,或者它后面的話是总结;“?”問号,表示疑問語气;“!”叹号,表示感叹語气。此外,还有“”引号、“()”括号、“——”破折号、“……”刪节号、“《 》”書名号,等等。出版总署1951年曾經公布了《标点符号用法》,对于怎样使用标点符号作了詳尽的明确的規定。每一个讀書写文章的人,都应当認識标点符号,并且养成正确地使用标点符号的习惯。(石)

本期因为稿件拥挤、版面不够,“語文短評”一栏暫停。

“不当家花拉的”

俞平伯

“不当家花拉的”这句话两见于红楼梦。一在第二十八回上：

王夫人听了道：“阿弥陀佛！不当家花拉的！就是坟里有，人家死了几百年，这会子翻尸倒骨的，作了药也不灵啊。”（作家出版社本，下同。）

又一在第八十回上：

王一点笑道：“不当家花拉的，膏药从不拿进屋里来的。”我一向不大懂得，模模糊糊地认为大概近乎南方话的“罪过”的意思。问之老北京，说现在已似乎没有这样的说法了。

作家出版社本在第二十八回却有一条注：

“不当家花拉的——不当家就是无职守，引申为不了解情况、不负责。花拉的是个词尾，也说花拉拉，花拉子。”

做这注的很熟悉北京的情况，我当时相信他的说法。不过却有一层：拿这注解来看红楼梦的本文，似乎还不大合头寸，也不大好讲。因为我对京语知识浅薄，提不出什么积极的证据和看法来，对从前主观上模糊的解释，也就不敢自信。

在“儿女英雄传”三见这样的话：

1. 那老婆儿也是拉着两只袖子，拜呀拜的拜个不住，口里说道：阿弥陀佛！不当家花拉的。（第八回）
2. 咱这里只一举心，那西天老佛爷早知道了。使不的，咱儿着？不当家花拉的。（第二十一回）
3. 张姑娘道：“不当家花拉的，也有个白眉赤眼儿的，就这

么开斋的！”（第二十七回）

这些若翻成南方话，都应该是“罪过”，第一例尤清楚。若用作家社本注释，就都不合式。这就引起我的怀疑来了，“儿女英雄传”的写作，距离红楼梦很近，稍晚一些。可见这句话从前是常常说的。

近闻刘侗“帝京景物略”，知道明代北京也有同的俗语。卷二春场条：

夜不以小儿女衣置星月下，曰：“女怕花星照，儿怕贼照。”

亦不置洗滌余水，为夜游神饮马也，曰“不当价”。

“不当价”就是“不当家”。“花拉”的词尾被省了。红楼梦的注对“花拉”的解释还是正确的。这里意义太明白了。不但如此，清代的纪昀还加上一条：“如吴语之罪过。”纪晓岚是乾隆时人，与红楼梦作者略同时，他的说法在这里当比较可信；我过去的猜想然得到了证明，或者他日可补入红楼梦注中罢。

还有一个版本上的小问题：脂砚斋庚辰本在这十八、八十两回，均作“没当家花花的”。“花花的”和“拉拉的”，“没当家”和“不当家”之异，当是口语的变化，法上稍不同，在意义上没有什么进出的。

承友人见告，苏州土话中于“罪过”“作孽”等字，附加词尾，如“罪过不勒”“作孽里拉”；这样，和“不当家花拉”“没当家花花”等语，情形更加相象了。

（本文原载1959年6月25日《北京晚报》）

中国语文

月刊

1959年9月号

总第87期

1959年9月22日出版

编辑者 中国语文编辑委员会
北京西城端王府夹道7号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印刷者 北京京华印书局
北京虎坊桥

总发行处 北京市邮局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

代订零售处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每册定价人民币0.24元（订阅刊费预付，按期整订）

1—19,080册 代号2—44